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

蔡天新 著



我们绚丽多姿的生命
是由一次又一次
奇妙的旅行组成的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

作者:蔡天新

ISBN:978750868756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数字与玫瑰

毕达哥拉斯在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上

弹拨乐曲，一边苦苦地构想着

那座水晶般透明的有理数迷宫

他的故乡在爱琴海的萨摩斯岛

从小就没有想要做水手，也没有被

萨洛尼卡城里的漂亮姑娘诱惑

数字成为他心中最珍重的玫瑰

那些绯红、橙黄或洁白的花朵

巧妙地装饰着无与伦比的头脑

佛罗伦萨的莱昂纳多曾设法凑近

把妩媚的小美人吉勒芙拉撂在一旁

终于因为体格的缘故半途而废

麦德林

2000年春天

序言

大约10多年前，上海一所大学学生会邀请我去做讲座，同学们为我指定的题目就是“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据说，事先他们在校内的论坛上做了民意调查，包括讲座嘉宾和主题的选择。从那以后，它便成为我最喜欢使用的演讲主题之一。

之所以给这本书取名为“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是为了还原书中的真实内容。本书除了谈论数学、诗歌和绘画等以外，还有相当多的篇幅与旅行、历史、地理有关。换句话说，书名中的三个关键词囊括了我的所爱。只是，“数学”也好，“诗歌”也罢，均属于冷门，但“旅行”在任何国度都是最热的词汇，三者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张力。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这个书名。

有许多次，我在回答读者或记者提问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您有许多种身份，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对此，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旅行者。如同一句广告词所说的，人生就像一场旅行。对我而言，旅行与数学、诗歌、随笔、摄影关系密切。古希腊哲人有“环地中海之游”，古代的中国诗人也有一次或数次“壮游”。

青年时代，我读到过匈牙利出生的美国数学家保尔·哈尔莫斯的自传《我要做一个数学家》，书中内容早已忘记，但我还记得作者大致的旅行范围，书中有一整章讲述他访学的乌拉圭。这说明，地理的概念不易让人忘怀。我更记得书中的一句话：“学数学的人就是要走遍世界。”我把它抄录下来，成为人生的警句。事实上，数学虽然抽象和复杂，但它的外语表达却是最容易的。

本书的初版名为《数字和玫瑰》，于2003年新春由三联书店制作，陆智昌设计。这是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我因此被《新周刊》列入年度新锐榜候选名单，即所谓的“飘一代”代言人，另外两位入选人是当红歌星周杰伦和孙燕姿。次年，该书的繁体字版在台湾地区问世，易名《数字与玫瑰》，由高谈文化公司出版。同年，韩文版由汉城（现名首尔）书之路出版社推出。与此同时，书中的部分篇目相继被翻译成英文等7种语言。

一晃15年过去了，在此期间这本书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重印过。此番修订，相较初版更新了一半多的内容，还增加了不少中国元素，除了表现华夏之美的《西湖，或梦想的五个瞬间》，还有体现中国智慧的《吴文俊：数学是笨人学的》。至于《“你将是杜甫，我是白居易”》一文，写的并不是中国诗人，而是新近逝世的美国诗人约翰·阿什贝利。

此外，旧版有些文章虽被保留，但却已做了润色，例如《数学家与政治家》、《神秘的岛屿》和《哈瓦那朗诵记》。前两篇增加了我了解到的更多东西方的历史和有关岛屿的秘密，后一篇的更新是因为主人公蕾伊娜·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几年前获得了古巴全国文学奖和“聂鲁达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她成了古巴最负盛名的诗人。《纳什，两个世界里的爱》描写的则是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翁。

《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更具有拉丁风情，书中除了谈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外，还有专文谈及意大利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都能将理性和浪漫进行完美的结合。说到理性发达的国度，大多分布在北大西洋两岸，它们对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贡献。不过，我也没有忽视那些未知的领域：从马来半岛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

最后，我由衷地祝福各位：每年都有一两次奇妙的旅行，都能读到一两本好书。

蔡天新

2018年初春，杭州西溪

旅行者说



旅行者的午餐 作者摄于圣迭戈

1. 孩时的旅行

上大学之前，温州一直是我见识过的最大的都市。这座如今以小型工商业闻名的城市，离我那盛产蜜橘的故乡仅100多千米。那时候的浙东南有许多盘山公路，途中还需两次汽车轮渡，因此虽然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乘客和司机中途仍要在一座名为白象的小镇用午餐，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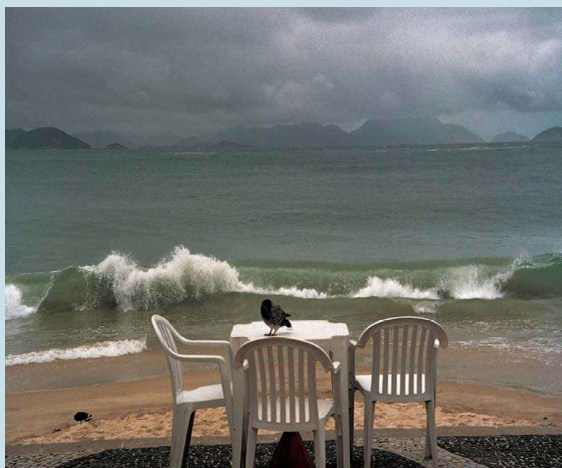
个地名连同那美味的海虾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去温州是为了看望小姨妈，她在瓯江的码头上做装卸工，后来她因身体过早衰退，先我母亲去世。第一次去温州时我只有6岁，和母亲同行。那时正值“文革”中期，“大串联”已经结束，中学生们开始上山下乡了，令人羡慕的是他们有机会去边疆。我认为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如火如荼地展开，恐怕与这些免费的旅行也有关系。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母亲和兄长又各带我去过一次温州，它依然是我心目中的繁华都会。

就在我第三次从温州回家没几天，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接着，他乘坐的波音飞机抵达杭州。据长辈们说，为了能让尼克松的专机安全着落，杭州笕桥机场进行了扩建。当报纸上刊登出总统先生在花港观鱼的照片时，我正在300千米外的一所乡村小学念书，从未见过火车的我被这件事触动了，在笔记本上画下他的旅行路线。我用的是一亿分之一的比例，线路全是笔直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亚洲东部和北美之间最近的航线要经过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岛。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不仅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同时它也打开了一个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至今我对那位引咎辞职的美国总统深怀感激，无疑他也是20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这位大人物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20多年以后，尼克松的葬礼在他位于南加利福尼亚的故乡约巴林达小镇隆重举行，那会儿碰巧我又在160千米以外的另一座城市收看电视转播。那是我许多次西方之旅中的头一回。可时光似乎总是不均匀分配的，对一个民族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英年早逝的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他从20岁开始用三年的时间写作了200多首诗，其中包括他一生的大部分力作，而在生命中的最后7年，他仅写了8首诗。出现在我个人身上的奇迹是，我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亲身游历了这个世界的大

部分地区，甚至超过历史上绝大多数探险家。在某种意义上，旅行对于我这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人来说，已经成为心灵的真实需要。

2.旅行与旅游



旅行者的小憩 作者摄于里约热内卢

为了使下面的叙述变得更为明晰、准确，我想把“旅行”（travel）和“旅游”（tour），“旅行者”（traveler）和“旅游者”（tourist）加以区分。旅行和旅行者除了包括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其他目的，甚至是怀有某一种使命，至少是遵循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因为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无论多么丰富，毕竟是有限的。本书无意谈论政客、商人、富豪和明星们的出访活动。我心目中的旅行者是那些试图在旅行中获得灵感或启示的人，例如，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僧侣、探险家等。

自从17世纪以来，意大利便是欧洲各国青年才俊向往的旅行目的地，他们在那里探寻先辈的足迹，寻找创作的灵感。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正如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她的诗中所写的，

是因为缺少想象力才使我们离家，

远行，来到这个梦一样的地方？

至于他（她）们的旅行属于自费、官方派遣或得到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西方有各种各样的旅行奖学金），这一点并不重要。事实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鲁本斯和作为流浪艺人的高更，两人都从异国旅行中获益匪浅。

当然，我也无意把另外一类人排除在外，即那些漫无目的的旅行者。他们为数众多，有的可能在很久以后才能获得世人的认可。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要数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假如他后来没有成为热那亚人的战俘，没有向狱友讲述离奇的东方传奇，谁会知道他呢？同样，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年轻时都分别在南太平洋的捕鲸船和密西西比河的运输船上做过水手，很多年以后，他们才依据各自的经历写成了传世之作——《白鲸》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虽然绝大多数旅行者默默无闻，不为后人所知，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这个世界才变得可爱、精彩纷呈、适宜居住。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哪个女子不怀春？我想说的是：哪个少年不梦游呢？

3. 史上的旅行者

在早期社会里，由于缺少袖珍钱币和其他便于携带的交易媒介，长途旅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虽然游历很广，也不过局限在波斯和地中海的范围内。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远行者可能要数中国东晋的法显和尚。公元399年，法显和尚以65岁高龄，从长安出发，经西域由陆路去天竺取经，后由海路从耶婆提国返回，历时约14年。当他回到长安，天子已更新了两朝，东晋也快要灭亡了。可惜，法显与后来的玄奘、鉴真、郑和一样，没有创作出一部有机整体的作品。他们之所以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贡献，不过，除了玄奘因为后人的

一部《西游记》广为人知以外，其他三位的知名度仅限于中文历史教科书的读者。



旅行者的午餐 2002年作者在维也纳

遗憾的是，这4位远行者都没有抓住历史的机遇，成就更伟大的事业。尤其是郑和，曾7次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船队到过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其足迹遍及今天的泰国、斯里兰卡、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在时间上，他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时间要早近一个世纪；在距离上，他的航程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航程的一倍；在年龄上，他首航时比达·伽马大6岁，比哥伦布小7岁；在规模上，他率领的船队有200多艘船，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多艘，共约超过27 000人，最大的船长约150米，宽约60米，需要200多人驾驶才能启航，可容纳上千人，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三艘船总长不超过70米。

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世界的中心，对探险没有太大的兴趣。组织郑和七下西洋的明成祖在文化方面倒是颇为费心，在位期间修成了《永乐大典》。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罗盘针和航海图，但是缺少理想主义的梦想和发现新航路的勇气，尤其是没有早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和竞争机制来刺激航海。郑和的每次远行都受天子派遣，而非哥伦布那样自告奋勇，郑和本人又缺乏航海的经验，他的船队只好沿着已知的海岸小心翼翼地行进。实际上，朱棣命郑和“通使西洋”，是因为郑和的祖父和父亲曾经到过麦加朝圣，同时也是对他辅助自己篡位的一种奖赏。



乡村公路 作者摄于保加利亚

有的史书记载郑和最后客死在今天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而郑和去世65年以后，达·伽马的船队抵达的正是同一座城市。更为巧合的是，从法显到郑和，这4位中国跨国旅行家要么是佛门弟子，要么是太监。我想问问，当时那些普通人都忙些什么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延续至今的“学而优则仕”和“官本位”思想在那个年代里极为盛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为祖先开脱，从地理位置上看，在亚洲处于发现新大陆最有利位置的无疑是日本，而绕过好望角到达欧洲的新航路应该由印度人去探索，不是吗？欧洲之角正好处在伊比利亚半岛，那里是旧大陆离新世界和非洲南部最近的地方。

4. 葡萄酒的故事

2011年3月，我独自旅行到了南半球的智利，当时那儿正值夏秋之交。在从圣地亚哥到瓦尔帕莱索港的汽车上，我一面想象着巴勃罗·聂鲁达当年经常乘坐的窄轨火车，一面听邻座的农场主讲述葡萄的栽培和葡萄酒的酿造工艺。随着海拔高度的不断下降和气温的变化，面貌一新的景观接连出现。不可思议的是，这段100多千米长的路途居然分成了4个经济区：蔬菜种植区、葡萄种植区、林业区和渔业区。可是，一路下来，我对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佐餐酒、香槟和餐后酒之间的区别仍所知甚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葡萄的栽培比起水稻和小麦的种植要复杂得多，更不要说酿酒工艺了。此外，智利的红葡

萄酒是南美洲最负盛名的，仅英国每年就进口2 500万升，足够每个成年人喝一瓶的。

葡萄栽培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经有这方面的记载。《圣经·创世记》中提及：是诺亚酿造了葡萄酒。在荷马时代，葡萄酒已经是希腊人经常买卖的商品。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人把葡萄带入法国，罗马人在公元2世纪以前便在莱茵河流域种植葡萄。此后，由于教会在举行圣餐时要饮用葡萄酒，这项事业得到了严格的管理，葡萄园的种植范围也迅速扩大。死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那不勒斯海军司令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提及了90多种葡萄和50多种葡萄酒，并详细地描述了葡萄栽培的方法。



正午的月台 作者摄于东布拉格

葡萄对土壤的适应范围较广，因此在气候适宜的情况下，栽培的技艺便显得十分重要。繁殖葡萄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嫁接，也就是将优良品种的一段茎接在砧木上，也可将砧木先定植于葡萄园中，在夏末再将其他品种的芽接在已生根的砧木苗上。接下来是整形和修剪，要使藤蔓长成所需的形态，便要整形，先对幼树进行修剪，然后把它绑在支架上。对酿酒的葡萄来说，修剪是调节产量的主要手段，这不仅关系到果实的品质，还影响到下一年枝条的质量。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与水稻和麦类品种的改良不同，葡萄的优化不可能由少数几位专家来完成，它需要广大果农的精心配合和操作。

这次旅行让我恍然大悟，欧洲文明之所以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独步向前，除了地中海上的远航带动了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以外，更与这种攀缘植物的受宠有关。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葡萄的栽培和品种优化，葡萄酒的酿造和储存（例如：葡萄酒的储存需要特定的温度，防

止光照和振动，佐餐酒瓶则要横放以保持软木瓶塞湿润），熏陶了一代代农民的科学观念和文化素养。当后来葡萄的栽培技术终于由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容易种植的谷类植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这片黄土地了（相比之下，北方的单季收获比起南方的双季或三季种植更容易操作）。正因为如此，启蒙思想才会最早出现在西欧各国并深入人心，欧洲才会萌发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潮。

5. 少女的旅行

少女旅行在途中

少女旅行在途中

水波歇息

那轻柔曼妙的身影

依附着时间之树

她自远方而来

茉莉花的露台

一个影子的花园

坐落在湿润的国度

话语撒播在空中

梦想飘游在水上

一匹白马走出

从她的蓝眼睛里头

1994年夏天，我终于实现了向往已久的穿越北美大陆的旅行。当我将要到达俄勒冈州的最大城市波特兰时，在列车中部的休闲车厢里结识了一位苏格兰少女玛丽。玛丽是爱丁堡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浑身洋溢着清纯和朝气，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她正在捧读D.H.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与玛丽的相识促使我写了上面这首小诗，当时她刚刚游览了风景如画的温哥华和西雅图，正准备南下去旧金山湾。在此之前，玛丽已经到过新西兰和南非，初步验证了从教科书中获得的前殖民地印象，她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

西方各国旅游城市的市区都有价格低廉的青年旅店（Hostel），即使在纽约和巴黎这类物价昂贵的城市，也不难找到十几美元一晚的整洁床位。廉价旅店和各式各样的优惠月票和联票，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游历世界大开方便之门。旅行中的少女无疑是最美丽的，她们通常不会有任何顾忌。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心灵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与旅行中的少女交谈，自然是最惬意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即便是性情忧郁的男子，也会因此变得开朗。不过，这首诗中还依稀存有一位中国女孩的身影。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在大学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位从外省分配来的女教师S。



村舍与云朵 作者摄于威尔士

S小姐绝对是一个迷恋旅行的人，每逢假期便带着一本小说和一个日记本出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然独自去了西藏和南疆。这让我自愧弗如，并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学生时代的我也是一个独

往独来的旅行者，经常只需靠在硬座车厢的小茶几上休息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就可以接着游览新的城市。此后不久的一天夜晚，我约S小姐到湖滨的一座地下电影院看一部法国侦探片，散场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用英文告诉我，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和中国男孩一起看电影了。果然，几个月以后，她嫁给了一位丹麦留学生，不久便随那位高鼻子的丈夫移居到美人鱼的故乡了。我毫不怀疑，S小姐将会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

6. 拜伦的旅行

1812年初春的一天早晨，伦敦依然是寒风凛冽，24岁的贵族青年拜伦在寓所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原来，几天前拜伦的诗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前两章问世，轰动了整个英伦，4周内重印了7次。这部书的第一、二章描述了诗人在欧洲各地游历的经历，尤其是希腊，诗人对处于土耳其暴政统治下的文明古国深表同情，并鞭笞了自己的同胞乘人之危，在雅典抢夺宝物的行径。12年以后，正当希腊独立战争渐趋高涨之时，侨居意大利的拜伦倾其所有，买下了一艘军舰，并随舰前往爱奥尼亚海。后来，拜伦病死在佩特雷湾的港口城市迈索隆吉翁，我曾在从罗马到雅典的飞机上俯瞰过那座城市，据说诗人的墓碑铭文上只提到两件事：他的游记和希腊。

在这部游记的扉页上，作者引用了法国前辈作家德蒙布隆的一句话：世界像一本书，如果一个人只见过自己的国家，等于只读了这本书的第一页。这句话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假如不忙里偷闲外出旅行，还不如生活在古代。更多的时候，我会这么自我安慰：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以今日人类社会

分工之细，恐怕谁也无法取得牛顿和莎士比亚那样的成就，而这个多彩多姿的地图上的世界，倒像是为我们有限的生命特别安排的。


旅行者的阅读 作者摄于马德里

在为这部游记的某一个版本补写的序言中，拜伦提到了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当时他正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班克斯出身豪门，年轻时曾随著名的探险家库克船长环球旅行，在此前后还分别去过纽芬兰岛和冰岛。我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参观过班克斯图书馆和班克斯植物标本室，他也算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了，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圈内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岛屿，可拜伦却以嘲弄的口气谈论他。原来，班克斯在塔希提岛逗留期间，出过一桩轰动一时的桃色新闻，为英国上流社会所不齿。看来科学家的浪漫故事要不得，甚至被拜伦这样风流成性的诗人挖苦讽刺。在学术上，班克斯也没有利用先行者的优势，他的成就很快被后来的同胞达尔文超越。

7. 诗人与旅行

除了博物学、人类学等少数几个专业以外，大多数科学家都无法从旅行中直接获取经验。以数学家为例，他们出访的主要目的是与别国的同行们相互交流，如果有人主动从外地前来合作，效果恐怕是一样的，这一点就像政客、商人们的外事活动或谈判。当然，某些比较依赖灵感的人可能会从场景的转换中获益。而对于体育明星们来说，主场的战绩和胜率往往好于或高于客场。至于那些急于看世界的年轻

人，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可以不计较眼前的利益得失。尤其是那些想成为作家而囊中羞涩的人，常常选择记者或水手作为职业，前者有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格雷厄姆·格林，后者有赫尔曼·梅尔维尔和约瑟夫·康拉德。



十字路口的云 作者摄于罗得岛

在古希腊时代，西方就有游吟诗人并留传下两部史诗，古代中国的诗人们也有漫游祖国壮丽河山的传统。前面谈到的4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早年的游历写成了小说。对于那些一心盼望周游世界的诗人来说，现代社会中最理想的职业无疑是外交官。法国诗人圣－琼·佩斯从事外交工作长达26年，逗留过的城市包括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先后出使过欧、亚、非洲十几个国家，并担任了5年的驻英大使；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都在亚、欧、美洲的一些国家做过领事，聂鲁达在晚年还被任命为驻法大使；波兰诗人米沃什也担任过驻法国和美国的文化参赞；墨西哥诗人帕斯则经历了23年的外交生涯，直到他主动辞去印度大使的职位。

以上6位诗人后来都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毫无疑问，外交官的身份为他们的写作、旅行、交游，尤其是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这里，我想特别提到聂鲁达初次出国的故事，那是1927年的冬天，这位年仅23岁的青年被任命为驻仰光领事。据诗人在自传里透露，他是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径自闯入智利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才获得领事职位的，在此以前聂鲁达既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又不懂缅甸的语言。聂鲁达的勇气果然令人敬佩，而当时外交部部长的胆识更让人拍案叫绝，诗人的家庭没有任何背景，他的母亲早亡，父亲是一个火车司机。这位外交部部长迅速做出了决定，一方面是由于聂鲁达喜

欢写诗，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位部长认为某些地方的领事由谁担任并不重要。



旅行者的快乐（1999，巴黎）



旅行者的快乐（1999，巴黎）

8. 旅行者之树

最高乐趣

请客人们旅行吧
美丽的金斑蛾
鼹鼠绯红的手

开蜡花的灌木丛
小溪的喧响之流
青草在身后起伏不定

人们在树上涂抹糖浆

罗得之妻在逃离时回望

顷刻化为一根盐柱

夜晚不知道夜晚的吟唱

孤独不知道孤独的美妙

没有时间的最高乐趣

1993年深秋，我在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旅居时写作了这首诗。旅行带来的快乐唯有诗歌才能表达，反之，诗歌产生的喜悦唯有旅行才能相比。每当我游历一个新的国家，便会感觉获得一次新生。而写作对于我，就像是故地重游。

同样让人兴奋的是出发之前的那段时光，一旦你有了计划中的一次旅行，生活就会变得美妙无比。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屡次赴中亚探险寻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真正让我羡慕的是，赫定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大略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和目标，高中毕业前夕，他获得了一次机会去里海之滨的巴库做家庭教师，“那是1885年的春天和夏天，18岁的男孩一心盼望着出发的瞬间来临”。赫定后来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冰原上的山 作者摄于格陵兰岛

在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高大的植物叫旅人蕉（traveler’s tree），因其叶基能贮水，在旅人急需时可供饮用而得名。这种植物花簇巨大，茎干类似于棕榈，每片叶子长四五米，底部像一个杯子，可以容纳一升雨水。我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去那个岛国，它的面积是英国的2.5倍，还盛产香草、紫丁香和咖啡豆。据说，马达加斯加人的祖先来自亚洲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马达加斯加在黑人部落语言里的意思就是马来人）。有一次，我在一架从巴黎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遇到了一大群马达加斯加人，他们却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让我备感好奇的是，那些马来－印度尼西亚人为何舍近求远，没有去更近的澳大利亚呢？

2001年9月，杭州西溪

神秘的岛屿



纽约，作品29号 作者摄于曼哈顿

1.博尔赫斯的岛屿

20多年前，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一篇访问的开头谈及他曾经访问过的4座岛屿：冰岛、日本、英国和美国纽约曼哈顿。我碰巧去过其中的三处。我对博尔赫斯关于纽约的看法记忆犹新，他把纽约比作太阳，这一点非常有趣。正如其他有力量的事物一样，太阳是无声的，这与纽约的喧哗和尖锐形成对照。在我看来，纽

约像两把长短不一的利剑，垂直的那把是曼哈顿，横放的那把是长岛。正是这两把利剑使得纽约的生活多姿多彩，同时也充满了刀光剑影般的竞争和搏斗。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过上某种悠闲的生活，这座岛屿收留的艺术家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正是纽约的魅力所在。可是，对博尔赫斯来说有所不同，因为他到达纽约时双目几乎已经失明，需要通过听觉来感知一切，无声的世界意味着一片虚无，在他那里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如何，一个不那么喜欢巴黎的人钟情于纽约，未免让我感到意外。

至于日本，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博尔赫斯的某些观点。例如，他把日本人描绘成温文尔雅的绅士。博尔赫斯自然看不见某些日本男子说话时嘴唇的翕张了，否则的话，他完全可以想象何以古代的日本人不知道用亲吻来表达情感，这个论点出自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一部著作。日本给博尔赫斯留下美好印象的重要原因恐怕是他晚年娶了一位叫玛丽亚·儿玉的日裔女子，这使我想到了英国披头士乐队的歌手约翰·列侬、美国“垮掉派”诗人加里·斯奈德以及法国神秘主义画家巴尔蒂斯，他们对日本女人的偏爱比起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里那位寻花问柳的海军上尉平克尔顿要坚定许多。此外，日本还占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博尔赫斯一直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心向往之，他是《道德经》和《红楼梦》的热心读者。遗憾的是，博尔赫斯不像邻国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那样幸运，后者几乎游遍了世界。



春日大社 作者摄于奈良



泰晤士河畔 作者摄于伦敦

在这三座岛屿中，真正令博尔赫斯倾心和着迷的要数英国了，即那个他认为最神秘的国度。这种神秘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的外祖母，以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赋予的。此外，还有与其同出一宗的显赫人物罗萨斯（博尔赫斯曾写诗为他辩护），也长眠在英伦。远离大陆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耽于幻想，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产生如此众多有着世界性影响的诗人；远离大陆也使得英国很早就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军，这帮助英国在后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正如博尔赫斯指出的，伦敦这座城市充满了奥秘。从海德公园的演说到莱斯特广场的杂耍，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到考文特花园的美味佳肴，虽然希思罗机场的地铁通道过于冗长，泰晤士河上的桥梁稍显笨拙。让我困惑不解的还有，由诗人艾略特的一首儿童诗改编的喜剧《猫》上演几十年后历久不衰，而他最重要的作品《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的购买者却逐年减少。这或许就是博尔赫斯所称颂的人类诸多伟大冒险活动中的一项。

2. 更多的岛屿

在博尔赫斯从未游历过的岛屿中，我愿意列举出7座。

首先是中国香港，它是我第一次出境抵达的城市，我在那个岛上的最高学府逗留了一周。鳞次栉比的大厦和绕来弯去的马路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唯有来到维多利亚港，尤其是在夜色降临、华灯初上之时，我才会觉得豁然开朗，才会想起“东方之珠”的美誉。作为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香港与著名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相比，其地理特征既有相似之处又别具特色，前者依山傍水的景观让人赏心悦目，后者与罗马、莫斯科、坎帕拉一样都是建在7座小山之上。可是，在我看来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使香港形成有品位的独到文化，这使它失去了作为东方最迷人的城市与纽约、巴黎、伦敦并驾齐驱的资格。作为一种通俗化的佐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它的经典电影或歌曲享誉世界。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夜晚，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细雨蒙蒙中登上皇后码头上的军舰驶离港岛的情景。对英国人来说，20世纪遇到的此类尴尬事件已经不少，他们理所应当地能够应付自如。


桥梁最多的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作者摄

作为世界上地域最广阔的英语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和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法语城市，蒙特利尔显然有着与众不同的迷人之处。发达的商业，旖旎的风光，优雅的卡巴莱舞厅和圣劳伦斯河岸上的仿古马车，一座悠闲和享乐之城。四周被河水包围着，它的华丽和安详容易使人忘却此地离熙熙攘攘的美利坚合众国近在咫尺。可是，蒙特利尔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一座国际化的文化名城，在这方面甚至不及上游更加内陆的城市芝加哥。巴黎灿烂的文化和风雅的名声对蒙特利尔来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包袱，甚至成为以它为中心的魁北克省可能从加拿大分离出去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完全有别于马德里和里斯本，那两座拉丁城市虽然也极具个性，却没有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带来任何心理负荷。而处于劳伦斯河入

海处的首府魁北克以两年一度的中世纪节闻名，也表明该城对古典主义时期的欧洲的怀念姿态。

20世纪末最后一个浪漫的夏天让我相信，“人间天堂”这四个字是专门用来描述威尼斯的。火车穿过一条宽阔的大堤，就进入了亚得里亚海边的那座小岛。走在圣露西亚火车站的广场上，随即被扑面而来的欢乐气氛感染。大运河上满载乘客的船只穿梭往来，它们被习惯性地称作水上公共汽车。人们喜气洋洋，仿佛是在欢度重大的节日，即便巴黎的塞纳河畔也无法与之相比，那儿堤岸和水面的差距容易造成一种疏离感。而当我抵达被拿破仑称作“欧洲的客厅”的圣马可广场后，这种感觉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之相比，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更像一个训练场或公众聚会的地方，罗马重新崛起之晚使之丧失了争夺海外领地的良机，但同时也使意大利拥有五六座享誉世界的城市，这在欧洲绝无仅有。难以想象，威尼斯这样一座小巧可人的城市一度称雄西方，无论是在军事还是贸易方面，它在欧洲文艺复兴进程中散发出来的能量和活力，也非亚平宁半岛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

如果说丹麦王国是一个岛国，恐怕很少有人会立刻同意，因为它的大陆部分（日德兰半岛）占了其国土面积的3/4。可是，丹麦却有1/2以上的人口居住在400多座岛屿上，其中最大的一座要数首都哥本哈根所在的西兰岛。抵达哥本哈根的第一天下午，我就来到风景秀丽的郎格宁海滨，依据安徒生的童话人物创作的雕塑“美人鱼”坐落在此，而安徒生的出生地欧登塞则位于丹麦第二大岛的菲英岛。哥本哈根地处西兰岛的东端，如果不是一座叫萨尔特的小岛阻隔，从美人鱼身边可以眺望厄勒海峡对岸的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这个海峡乃是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连接处，正如直布罗陀海峡位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连接处。鉴于这一因素，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小小的丹麦在历史上长时间地统治了冰岛、挪威、瑞典以及德国的部分地区，至今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仍是丹麦的属地。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

《哈姆雷特》讲述的就是丹麦王子的故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那时候的丹麦王国甚至对英国人也颐指气使。



苦涩的希腊咖啡 作者摄于克里特岛

作为美洲和西班牙语世界最大的岛国，古巴的面积并不算大，可是该国在最近几届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数量，按人口比例来算是美国的5倍，堪称世界之最。我在抵达哈瓦那的第一个黄昏，就看见一位勇敢的古巴男孩，穿过车来人往的海滨公路，从高高的防洪堤上纵身旋转两周，跳入三面环礁的激流。这一幕帮助我理解了为何小小的古巴敢于与强大的邻国对抗。这是一个开放型的“封闭国家”，吸引了向往自由的各国人士，他们在古巴最危难的时候起到了保护神的作用。许多人为追寻切·格瓦拉的足迹而来，这为古巴的旅游业外汇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其首都国际机场像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那样，以诗人的名字命名。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和各种思潮在古巴像潮水一样涌来退去，古巴的音乐也因此流传到世界各地。可是，由于历史上美国的制裁和封锁、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以及自身的原因，古巴目前的经济陷入困境，但人们却似乎在等待某种契机的到来，以一种并不算太糟的心态。

从罗马到希腊，很像是逆流考察一条“大河”的源头，当游船驶离雅典的外港比雷埃夫斯，两岸灯火通明，使我想起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居所。在拥有数不尽的岛屿和传说的爱琴海上航行，缪斯女神的频频光顾令我应接不暇。在抵达克里特岛之初，我头脑里的那一丁点

儿智慧都溜走了，全部记忆都用来搜寻荷马所创作的《奥德赛》，“在酒绿色的大海中央，美丽又富裕，人口稠密，90座城市林立在岛上”。可是，自从9世纪以来，克里特岛被阿拉伯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相继占领，先后长达1 000多年，岛上建筑风格的繁杂也说明了这一点。希腊是欧洲地区经济较落后的国家之一，克里特岛尤其突出，其颓败的现状让人担忧。站在欧洲地理的最南端，我不由得想起邻近的埃及，另一个辉煌之后衰落的文明。

夜航

她端坐不动

双臂怀抱

谜一样诱人的

等腰四边形

当她抬起头

那棕色发尾下

两颗鲜嫩的葡萄

迅速被我吞吃

美腿舒展

仿佛停滞的钟摆

海浪在增高

睡意在减少

她嫣然一笑

露出两行牙齿

犹如开裂的石榴

悬浮在空气中

爱琴海
1999年夏天

哈尼亚湾

当正午的阳光自如地挥洒下来

海浪轻轻地拍击岸边的游艇

常春花开放在客店的阳台上

旅行者从睡梦中纷纷醒来

侍者刮光了两腮的胡须

其中一个来自伊拉克利翁

另一个来自北方的卡特利尼

那里是海伦的故乡有迷人的沙滩

在两次难得的航行中间

我甚至没有时间去追忆爱情

或者在不同的嘴唇中做出辨识

许多个夏天已经远离而去

那股推动帆船前进的凉风

也把许多张面孔推到我面前

奥德修斯船长出航未归

那座白色的灯塔可是为他修筑？

普罗米修斯播下的火种

依然照耀着我敞开的心扉

被南方一座光秃的山峰阻隔

终于没有到达汉尼拔的腓尼基

克里特岛
1999年夏天

3. 岛屿的亲情



作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

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台湾的土地时，我已经游历过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了，但是这座岛屿对我来说依然有一种不可替代的诱惑力，我想这主要是由于种族和语言。而在反复比较了两者的差异后，我发现语言比种族更通人性。一个会说流利汉语的雅利安人显然比只会说西方语言的东方人更让我感到亲切。这就是为什么台北比起香港、澳门以及某些南方城市更让我有回家的感觉，更不用说旧金山、温哥华或者圣保罗这些城市里的“中国城”了。另一方面，假如这座岛屿离中国再远一些，比如说它处在关岛或者夏威夷的位置，那么这种诱惑力就更大了，正如地处非洲西海岸的加纳利群岛和加勒比

海的瓜德罗普岛每年都吸引大批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去旅游度假一样。有时候，我难免要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在马来群岛或其他地方建立一个自治的社会感到遗憾，或许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手段过于接近，因此只好分散居住。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台北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跻身世界知名城市行列。虽说台北经济的繁荣凝聚了几代人的辛劳，但是弄文舞墨的人比例相当高。即便如此，阳明山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没有使得这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变得古色古香。在繁忙有序的交通背后，潮水一般涌来退去的摩托车和五彩缤纷的墓群都昭示着这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人居住的地方，而基隆郊外价格连天的“灵骨堂”则表现了人们对客死异乡的恐惧。当我乘坐的一列普通客车沿着太平洋沿岸行驶，两侧的渔村和山峦时隐时现，此刻我才见到了这座岛屿最纯朴的一面。载运着新兵的车厢设备陈旧，每两节共用一个厕所，这与西海岸明亮整洁的快速列车形成强烈反差。即便是在时速约达300千米的“自强号”列车里，居然也有雕梁画栋的圆形拱门，中华的传统无处不在，这就是台湾——一个古老与现代结合的美梦。

在台湾地区的全部访学活动结束以后，我在台北文昌街的舅父家里做客一个星期。年近八旬的舅父原来是中国香港招商局的一名海员，因为机智果断地处理了一次海上事故获得过英国交通部的嘉奖，后来，他以一部《操船学》闻名航海界，这部著作一度成为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海员晋级大副和船长必读的参考书。舅父当年是国民党最后一批撤离的船队中的一位船长，他居留两年以后，思乡之情甚切，便辞去工作，搭船来到浙江外海的渔山列岛，向往着从那里返回故乡南田岛与妻儿母亲团聚。但政治的阻隔迅速中断了回乡之路，他又勇敢地雇一条小舢板闯来的外婆见了最后一面，便又艰难地回到了台湾地区。或许是命中注定，舅父漫长的生命起始于一座岛屿，终结于另一座岛屿。在离开台北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拨通了远在杭州的家母的电话，兄妹两人在分离半个多世纪以后首次通过越海电话交谈。目睹

此情此景，我感到心酸，非笔墨可以形容和描绘，我发现了这座岛屿最触动我情感之弦的地方。

4. 岛屿的秘密



西西里大教堂 作者摄于巴勒莫

在西方语言里，岛屿一词与“孤立”“隔绝”“游离”同出一源，许多历史人物都曾与岛屿发生瓜葛，就其相对狭小的面积来说，岛屿的重要性远胜过陆地。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萨福的一生在小亚细亚海岸的莱斯博斯岛上度过；神秘主义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诞生于萨摩斯岛，晚年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害于埃维亚岛，一说是死于他林敦（今意大利南部塔兰托）；他们的同胞，全才的亚里士多德在其前弟子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不得不开始流亡，最后与毕达哥拉斯死于同一座岛上；而作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阿基米德，他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在航海家中，哥伦布因抵达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而发现了美洲，麦哲伦库克的生命则分别终止于菲律宾中部的麦克坦岛和夏威夷岛西侧的凯阿拉凯夸海滩。至于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出生在地中海的第四大岛科西嘉岛，在流放中死于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拿破仑出世的前一年，热那亚人将科西嘉岛卖给了法国人。假如这桩有关岛屿的交易推迟若干年进行的话，整个世界的历史无疑将要被重新书写。

在拿破仑的同胞中，作家维克多·雨果与岛屿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故事的主要地点是在巴黎塞纳河中的城岛（与他同年出生的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的故事发生地点则是在蒙特克里斯托岛上）。雨果晚年被放逐到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和根西岛，先后长达20年。与雨果的被迫流放不同，大器晚成的画家保罗·高更则两度自愿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并在那里完成了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曾经娶当地居民为妻。他最后孤苦伶仃地病死在约400海里(注)以外的希瓦瓦岛，隶属于马克萨斯群岛。在高更到达塔希提岛以前，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因参与澳大利亚一艘捕鲸船上的暴动被囚于该岛，他后来又游历了隶属于厄瓜多尔的科隆群岛，并在遗作《水手比利·巴德》里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当然，与科隆群岛最密切相关的人物要数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他发现了岛上的环境变化对雀类的物种演变有重要影响。



马耳他的晨曦 作者摄于瓦莱塔

岛屿因为被蓝色的大海环绕而使人想入非非，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分别起源于克里特岛和冰岛。与此同时，岛屿也丰富并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在中国神话中就有蓬莱仙岛的传说。除了英国人外，21世纪中屈指可数的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现代主义诗人中，居然有6位诗人出生在海岛上，他们分别是：法国的圣－琼·佩斯（瓜德罗普）、意大利的夸齐莫多（西西里）、爱尔兰的叶芝和希尼、希腊的埃利蒂斯（克里特）和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特。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则在西印度群岛的波多黎各辞世。有意思的是，瓜德罗普、圣卢西亚和另一位诺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的出生地特立尼达同属加勒比海的小安的列斯群岛，这三座岛屿的人口加在一起仅100多万。此外，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息影后一直隐居在波罗的海的法罗岛

上，他是否有意在那里结束生命，为岛屿留下一个神话，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注

最后，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纽约的曼哈顿集中了当今世界最多的财富，英国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国家，而目前具有压倒一切影响力的西方文明则起源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

2000年12月，安第斯山
2001年12月，杭州西溪

---

1. 1海里≈1.85千米。——编者注
2. 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果然在法罗岛上过世，享年89岁。

一个探戈的下午



明信片上的探戈

1.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莺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三天中午，我头一次乘坐地铁H线（黄线）。穿行在幽暗封闭的隧道里，木制的车厢多少让人有些放心不下，这是该市4条自西向东的地铁线路之一，它们与南北向的B线（红线）交汇于市中心最繁华的七月九日大道。我一直坐到费德里科终点站才钻出地面。出了地面就看见小小的广场四周摆满了鲜花，对面是

一排白色的圆形大石柱，三角形的尖顶让我想起雅典的帕特农神庙。那正是恰卡里塔公墓，豪·路·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里曾提及它，并引用了吉他手的歌词：“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命是临近的死亡。”阿根廷人对死亡的崇敬由来已久，他们纪念一个人不在他的生日而在忌日，或许是因为最初的欧洲移民知道自己死后难以返回故乡，因而极尽奢华。恰卡里塔虽不及葬在该市的另一座公墓雷科莱塔华贵荣耀，但对到过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和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我来说，仍然感到不可思议。每一座墓室都有三米多高，门口由“铁将军”把关，有的墓室还安装了两扇侧门。整座公墓采用清一色的大理石墓碑，街道、门牌和广场一应俱全，简直像一座小城镇。



卡洛斯·伽达尔雕像 坐落在他长大的街区

1935年的一个夏日，一位古巴女子从哈瓦那住所的阳台上跳下来自尽，而在波多黎各和纽约，各有一位女子服下毒药，她们这样做全都是为了一个未曾见面的中年男子，他刚在麦德林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他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一场演唱会。这个人便是如今被尊为“探戈之父”的阿根廷歌手卡洛斯·伽达尔，他的另一个雅号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莺”。我来恰卡里塔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卡洛斯·伽达尔的墓，因为在哥伦比亚我曾听说，虽然时光流逝，但每天仍有虔诚的歌迷来为伽达尔点烟，夹在他雕像的手指间。博尔赫斯早年对探戈的歌词不以为然，认为它缺少男子气概，尽是些对失去的爱或对背叛的悲叹。还嘲讽说，他和伽达尔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人都不会跳探戈。可博尔赫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次到访麦德林，不得不说这与



埃娃·庇隆像

伽达尔之死有关。伽达尔的墓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他的雕像的右手指间夹着一颗燃烧的烟头，传言果然不虚！有一句民间流行的话说：伽达尔的歌一天比一天唱得好。



雷科莱塔公墓

在伽达尔的遗体运抵阿根廷之前有个长长的“奥德赛”。他离开麦德林以后，先是北上到了纽约，然后经过里约热内卢和蒙得维的亚，在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伽达尔的遗体被放置在月球公园体育场里供人瞻仰，最后才由一辆马车载送到恰卡里塔公墓。值得一提的是，恰卡里塔还安葬着显赫一时的庇隆将军，我对庇隆将军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电影明星出身的庇隆夫人埃娃·庇隆葬在雷科莱塔。在阿根廷有一个说法：“过一辈子奢侈的生活容易，葬在雷科莱塔不易。”因为葬在那里需要有高贵的姓氏，庇隆将军虽三度出任阿根廷总统，死后却也只能葬在恰卡里塔。埃娃·庇隆得以葬在雷科莱塔十分偶然。在军人统治时期的阿根廷，遗体的安葬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埃娃在33岁时患癌症去世，她的遗体被丈夫的一个政治对手偷运到意大利，匿名下葬在米兰的一座公墓里。近20年以后，那位政治对手被庇隆将军的追随者暗杀，他的遗体在总统答应将埃娃安葬雷科莱塔后才得以奉还。至于埃娃因为后人制作的一部传记电影和主题曲蜚声世界，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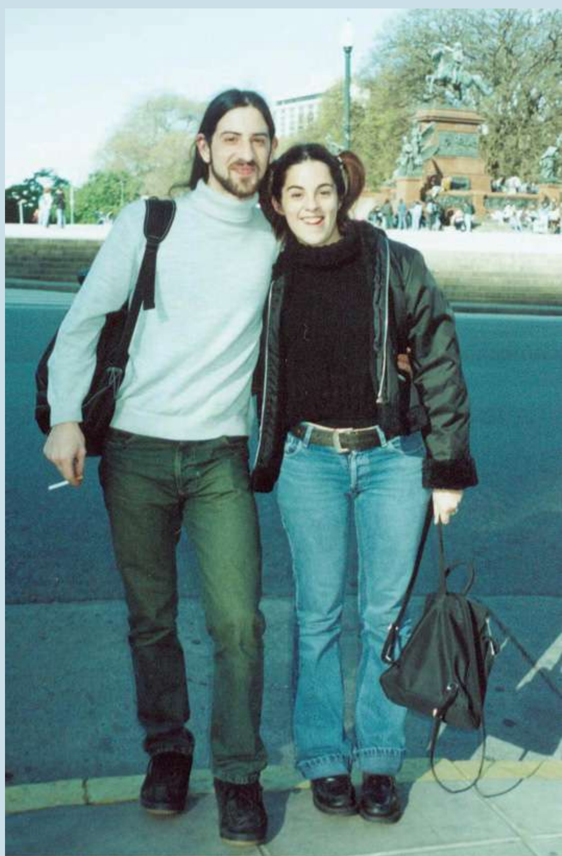
情了。考虑到阿根廷人关于死亡的恩恩怨怨，就不难明白为何高明的博尔赫斯愿意最后栖身于他度过青春期的日内瓦湖畔了。

2. 青椒奶酪番茄比萨

大约下午两点钟，我回到费德里科车站，正准备原路返回，发现街角有一家比萨饼店，才感到肚子有点儿饿了。这家店的名字叫“帝国”，让我想起墨索里尼时代的亚平宁半岛，而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的数量众多。我点了一份青椒奶酪番茄比萨和一瓶可口可乐，找了一个临街的座位，窗外有一个报刊亭。不到10分钟后，一位穿皮衣短裙的年轻女子进了店，她不假思索地走到我的邻桌，背对着我坐了下来。几秒钟之后，那位女子又调整了座位，和我相对而坐，她把皮衣脱下来放在椅背上，露出低低的前胸。侍者上来打招呼，我能看出来她是这里的常客，她要的比萨和饮料与我的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包万宝路香烟。当她开始吞云吐雾的时候，我才仔细观察了那张脸，蓬乱的头发，眼神毫无光彩，过分使用化妆品伤害了她的肌肤，她的脸和那双白净的手臂相比，衰老的速度明显不一致。当她踮着脚走向洗手间的时候，我可以看出她的年纪不超过25岁。

显然，这是一个睡梦初醒的妓女，正在享用她的“早餐”，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起初，她的眼睛盯着窗外，不久一种职业习惯使她调过头来，有几次我们举杯的时候视线相遇，相互做出碰杯的姿势，她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描述的笑容。不用说，四周的顾客包括侍者和报刊亭的主人都在朝这边看，对这些她早已习以为常，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人们瞩目的焦点。收音机里忽然播放起一支古老的探戈舞曲，她开始摇头晃脑地轻声吟唱，曲调哀婉忧伤，歌词恐怕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清。

本来，探戈一度流行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妓院和酒吧里，在卡洛斯·伽达尔使之扬名世界以前，探戈一直被视作伤风败俗的舞蹈，只有流氓地痞才敢在大街上跳，连劳动妇女也更加不愿与之有任何瓜葛。博尔赫斯在《探戈的历史》中追忆道：小时候我在巴勒莫，后来在恰卡里塔看到一对一对的男子在街角跳这种舞。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探戈舞曲依然能够在恰卡里塔听到，可是再也看不到对舞的男子了。



马路上的情侣 作者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条被割去尾巴的小狗出现在过道上，像一个初次剃光头发的男孩，煞是可爱。店里的顾客扭头去看电视画面中的足球比赛了，妓女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并下意识地伸了伸懒腰。这个动作使我相信，在那些漫长而又有暖意的下午，最难度过时光的是老人和妓女。老人因为退休了无所事事，妓女则因为还没到工作时间而百般无聊。再说，习惯了夜生活的妓女对自然的亮光怀有恐惧感，如同那些畏光的蝙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点儿出人意料，从门外进来一位戴眼镜的老头，年纪比那些侍者还大，替她付了账，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领走了。同时，他的出现也打消了我一个刚冒出来的念头，即写一篇题为“与妓女共进午餐”之类的散文。我想我该去圣特尔莫了，那是探戈表演的圣地。在地铁月台上，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妓女和老头，他们相互依偎，有说有笑的，或许在这个时候，她才感受到一种平等，悬殊的年龄差距抵消了她的自卑心理，他们在卡洛斯·伽达尔车站下了车，从我的视野里彻底消失。

3.多莱戈的露天探戈

圣特尔莫如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格林威治，相对低廉的房租吸引了无数贫穷的艺术家。小巷里有许多单身公寓，而宽阔的人行道旁是开设露天咖啡厅和集市的理想场所，甚至国立的现代艺术馆也坐落在此。不过在历史上，圣特尔莫以与入侵的英国军队发生激烈的巷战，并最终将他们驱逐到海上而著称，妇女也参加了那次巷战。那是在1806年，阿根廷人从中找到了勇气，4年后他们就摆脱西班牙获得了独立，而那次巷战中市民所佩戴的蓝白相间的标志，后来成了阿根廷的国旗，同时也出现在引以为傲的国家队队服上。

在换乘B线地铁以后，我向南到达了宪法区的圣胡安，随后步行向东前往圣特尔莫。快到多莱戈公园时，我看到街道两侧摆满了卖画的小摊，以表现探戈舞的水彩画居多，有些画作的内容十分低俗，似乎保留了早年的风貌。此外，伽达尔的肖像画也不少，他的容貌风度有些像“猫王”，只是比后者少了些颓废之气。埃娃·庇隆也在这里大出风头，我相信她不仅是作为政治人物，更是因为美貌受到后辈的仰慕。



多莱戈公园的探戈表演

多莱戈公园位于十字路口的一侧，占地不到10 000平方米，其中跳蚤市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区域，留给探戈的只有东南一隅的一个小小空地，四周围拢着上百位观众。在这个表演露天探戈的地方，三对男女舞伴轮番出场。其中一对年逾古稀，他们虽然舞步迟缓，但神韵犹在。另外两对均是年轻人，两位男子身材高大，穿着西装，不系领带，皮鞋永远是脏的，因为女伴不

时会站到他们的脚上。其中一位年轻男舞者留着络腮胡子，一身黑衣，兼有侠客和牛仔的气度。另一位戴着礼帽，温文尔雅，幽默风趣。相比之下，两位女伴形体单薄，惹人怜爱。她们间或跃起，分腿骑坐在男伴身上，容易让人联想到性交的姿势，这正是当年让探戈引起争议的动作。可以说，探戈在舞蹈里相当于美术作品中的裸体画，它后来风靡一时的原因也在于此。在探戈舞的间隙，他们还表演了米隆加舞蹈和潘帕斯草原上的舞蹈。米隆加作为探戈的“近亲”，节奏明显要更快一些，这种舞蹈表现了男人之间的争斗和勇气，深得博尔赫斯的赏识，博尔赫斯以此为题写过不少诗篇。

我对探戈最早的记忆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学舞会，那时的年轻人喜欢尝试新鲜的玩意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学的几个动作包括突然转身和伸腿的姿势，毫无探戈的神韵，要是让阿根廷人看见了，非笑掉大牙不可，怪不得它很快就从舞会上消失了。当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名为“卡布里尼”的舞曲，歌词讲的什么我至今不知道，但旋律中强烈的节奏感让人难以忘怀。许多年以后我游历地中海时，才从罗马到雅典的飞机上看见了卡布里，是那不勒斯湾一座风景秀美的小岛，而探戈的先驱正是生活在拉普拉塔河两岸的欧洲和非洲移民，其中也不乏意大利人。游客换了一茬又一茬，我口袋里的硬币也给光了，邻座的一位热那亚少女却纹丝不动，她盘腿席地而坐，脸型和发辫有着古典的韵味。后来她终于找到机会与穿黑衣的男舞者交谈了几分钟，索要了一张名片，原来到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欧美游客



博尔赫斯之墓 作者摄于日内瓦

相当一部分是冲着探戈来的，因此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探戈速成班。热那亚少女问我要不要参加，她把地址抄给了我，探戈班就在我下榻的旅店附近。可惜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拉普拉塔河上游巴拉那河畔的罗萨里奥，那里是切·格瓦拉的出生地，也是拉丁美洲的诗歌之都。

2000年11月，麦德林

哈瓦那朗诵记



哈瓦那街景

1. 从伦巴到莎莎

21世纪的一个冬日，我应邀到古巴参加一个数学学术会议，这使我有机会造访那个名闻遐迩的加勒比海岛国家。

早就听说，古巴人口中逾半数是非欧混血儿，这样的比例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极为少见（其他国家以印欧混血儿居多），且余

下的人口多为西班牙人和非洲裔（主要少数裔的华人仅占1%）。我认为西班牙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生活怀有悲观情绪，而非洲人则根据祈祷神灵的习俗，形成了一种如泣如诉的音乐，这种音乐能使悲观情绪得到升华。四季温暖的气候让大多数古巴人形成了一种欢乐、朴实、外向且天真无邪的个性。

古巴人生性活跃，只要政府宣布取得一点儿胜利，便会举国欢腾，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动辄有上百万人游行集会。这样大规模的集会在其他国家除了盛大的宗教活动以外是很少见到的。在日常生活中，古巴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是：每个人都能歌善舞，这一点与哥伦比亚人如出一辙。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古巴人那样创造并发展出如此众多风靡世界的舞蹈：伦巴舞（Rumba）、曼波舞（Mambo）、恰恰舞（Cha-Cha）、莎莎舞（Salsa）。



用以演奏莎莎音乐的康佳鼓

伦巴源自古巴非洲裔民间舞蹈颂舞（Son），是一种力度较小但音乐比较喧闹的舞蹈，常在小酒店里表演。伦巴原是舞厅舞，于20世纪初流行全球，舞者上身挺直，臀部左右摇摆，先是向旁两个快步，再向前一个慢步。80年以后，伦巴舞的风潮席卷了中国，那时我在大学里念书，在周末舞会里伦巴舞是不可或缺的，印象里它比较能展现东方女性的婀娜妩媚，比起探戈来更受同学们欢迎。

在伦巴舞流行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曼波舞在古巴诞生了，它实际上是一种不按传统的伦巴音乐节奏表演的舞蹈，舞者的姿态更为随

意，舞伴时常是只握着一只手，甚或根本不接触。没过多久，据说古巴的一位小提琴家又将曼波舞加以改造，使得小节的后两拍迅速换步，它变成了一种更容易跳的快步舞，这就是恰恰，至今恰恰仍是不可或缺的国际标准交谊舞之一。相比之下，莎莎的流行要晚一些，它融合了伦巴、曼波和恰恰的特色，更适合在舞会或酒吧等场所而不是在舞台上表演，目前莎莎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交谊舞。



莎莎女王塞利娜·克鲁兹

数学会议行程过半时，主办方和古巴科学院物理所共同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地点设在物理所的大礼堂，虽说有领导讲话和歌手表演，晚会的主要内容却是跳舞。不出所料，在中国最出名的伦巴早已过时，相反莎莎成了主角，还有来自多米尼加的玛兰戈和墨西哥的瓦杰那多。我邀请一位肤色黝黑的物理学博士跳舞，她像晚会上的其他古巴姑娘一样穿着露脐装。礼堂里没开空调，没跳几曲，她的腰间便渗出了汗水。

在我看来，跳莎莎舞时女人试图依附着男人，而男人装模作样地要摆脱女人。与来自欧洲各国的那些同行相比，我毕竟在麦德林受过熏陶，哥伦比亚人特有的气质、仪表和修养创造出了世界公认的“哥伦比亚莎莎”，我的舞感明显要纯正一些。当我们歇息下来，一直在旁观看的巴黎大学教授米歇尔凑近我，对我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跳舞跳得这样好。”三年以后，我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大学再次遇上了米歇尔，他对哈瓦那的那个夜晚仍记忆犹新。

Salsa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调味汁，salsa de soya便是酱油的意思，soya是指黄豆，而de相当于英文的of。传说在1933年的一天，古巴作曲家伊格纳西奥·皮涅罗因为吃了淡而无味的食物获得灵感，创作了一首歌《加点酱吧！》，这首曲子既不像传统的拉丁舞曲那样有许多约束和规范，又比迪斯科舞曲多了几分高贵和典雅。从那以后，一种新的音乐和舞蹈形式便出现了，莎莎首先在加勒比海地区得以普及，继而流传到世界各地。

“莎莎皇后”这项桂冠如今还戴在塞利娜·克鲁兹的头上，她的代表作《糖》（*azúcar*）是全球音乐电视台（MTV）的保留曲目。在我的记忆里，塞利娜·克鲁兹的形象并不算美但她的声音很有特点。正是在1960年那个戏剧性的年份，克鲁兹离开故乡哈瓦那到美国闯荡，她赢得的荣誉包括7项格莱美奖，耶鲁大学和迈阿密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以及国家艺术奖（比尔·克林顿亲自把奖章别在她胸前）。当克鲁兹于2003年夏天在纽约患癌症去世时，她的经纪人猜测她的年龄大约是78岁。

2.海明威的庄园

大概正是古巴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加上热情好客的民族个性，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名人。曾与古巴亲密接触过的著名作家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让·保尔·萨特夫妇以外，至少还有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作为20世纪英语世界里最受尊敬和欢迎的作家之一，格林的作品主要探讨在当代不同政治环境下，人类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格林是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同龄人，出生在英国，在其父亲担任校长的中学学习了几年以后，他被家人送到伦敦，接受了为期6个月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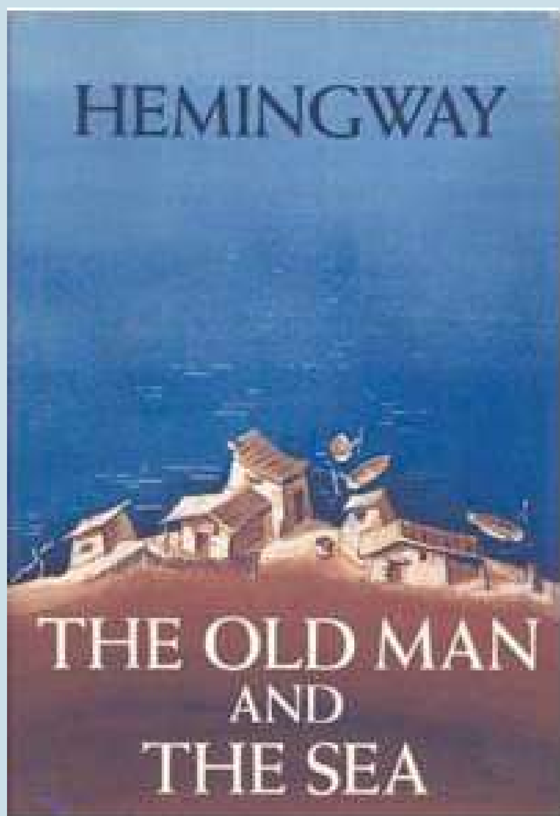
理治疗。在完成牛津大学历史系专业的学习以后，格林移居到伦敦，结婚并随妻子改信了天主教。他先是在《泰晤士报》做编辑，出版了处女作（诗集）和一部不太成功的长篇小说。从1940年起，36岁的格林作为一名自由撰稿的新闻记者，开始了长达30年的旅行，同时为其小说寻找故事和背景地点。

在格林的异域小说里，有一类颇具消遣功能，也是电影导演乐于改编的题材。譬如，《东方列车》描写了穿越英吉利海峡驶往伊斯坦布尔的火车上乘客们的尔虞我诈；《权力与荣耀》和《名誉领事》的故事与他在西班牙的经历有关，讲的都是神父违背教会行为，一位教父做了真正的父亲，而另一位教父投身于革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格林接连出版了4部小说，分别以面临政治动乱的第三世界国家——越南、刚果、海地和古巴为背景。其中，《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是一部真实的间谍小说：一个身不由己的小人物无意间被卷入国家政权之间的争斗风波，结果竟然靠弥天大谎在两国之间无往不胜，将阴险狡诈的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间。

综观格林一生的创作，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事物危险的边缘”，这是布朗宁的一句诗，格林将其视为“对我全部作品的概括”。事实上，格林关心的总是间谍、刺客这类人物，他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非洲西部地区做过谍报工作。即便是在古巴游玩，他的真实身份也极有可能是英国间谍。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格林没有在哈瓦那留下一丝可以让我们探访的踪迹。

显而易见，无论格林以什么身份出游，写作才是他最大的目的和兴趣所在。与格林的隐秘身份相比，海明威在古巴可谓是家喻户晓了。一天下午，我搭乘一辆出租车，来到哈瓦那东郊的小镇圣弗兰西斯科·德·保拉，海明威的故居坐落在一个栽满槟榔树的小山头上。

那正是维西亚小庄园，包括主卧室在内的每个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猎物标本，以犀牛和野鹿居多，想必那是作家的战利品，我想与他



《老人与海》初版封面（1952）

一起生活的女人必须得学会容忍。这可能是海明威居住时间最久，也是最为舒适的一个家了，海明威的9 000册藏书和在基韦斯特注册的比拿号游艇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不过，书房的门口拉了一条警示线，游客只能在门口参观，据说里面的打字机敲出了《老人与海》这部著作，游艇则被放置在一个搭好的凉棚下。

从29岁那年第一次为躲避风浪来到哈瓦那，到古巴革命后离开，海明威断断续续在这个国家居住了20多年，虽说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曾和他一起出海捕鱼，但他们所追求的毕竟不同。海明威以前曾经说过，“我热爱这个国家，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除了出生的故乡，此处是命运归宿的地方。”海明威初到哈瓦那时，住在老城区的“两个世界”饭店，在那里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由于他当时的妻子玛莎不喜欢住饭店，海明威才买下维西亚小庄园。

海明威返回美国后，他的精神极度沮丧，加上两度接受电击疗法，次年便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在维西亚小庄园徘徊了许久，随着黄昏的来临，它显得更加颓败。由于年代久远，树根已侵入墙体和地基，白蚁啃噬着木块，屋顶开始漏雨，楼梯也已经变形。在经济封锁了40多年以后，美国的“海明威基金会”拟向古巴提供200多万美元的专款，用于修缮作家的故居，但却被小布什政府阻止。当时的政府认为，提供这笔资金等于资助古巴的旅游业。

3.拉姆艺术中心

我游览维西亚小庄园的第二天下午，会议组委会带领大家参观古巴的最高学府——哈瓦那大学，这座大学也是坐落在这座城的西边，与物理研究所相隔几个街区。进入校门，有几幢米黄色的大楼，门前各有一排希腊式的圆柱。台阶虽只有六七级，却由于宽度长达好几十米而显得非常有气魄。更有意思的是，每一层楼都有5米高，据说这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典型建筑，由于古巴大部分时间天气炎热，建筑师就尽量增加房子的高度。我随意地与台阶上坐着的几位大学生聊天，并和他们谈起切·格瓦拉，虽然到处都有人穿着印有他头像的T恤衫，但让我惊讶的是，切·格瓦拉作为青年楷模的地位并不如表面上那么牢固。在此以前，我在自由古巴饭店附近的一家书店里看到最新出版的一部切·格瓦拉传记，里面有许多彩色地图，包括他三次穿越美洲大陆的旅行图，非常精美，令我这个地图绘制爱好者羡慕不已。



哈瓦那老城区



哈瓦那少年 作者摄



古巴华裔画家维弗莱多·拉姆

有一天，我和哥斯达黎加姑娘卡塔利娜结伴去了哈瓦那老城区。卡塔利娜是米歇尔教授的弟子，也是巴黎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她是物理研究所举办的晚会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早就听说哈瓦那是历史遗迹保存得最好的美洲城市之一，果然如此，那里的街道、住宅、广场、喷泉、城堡、要塞和剧院无一不是由石头堆砌而成。在一个小弄堂里，我看到三名牵着一条狗的小孩和两名穿着太阳裙的少女，他们非常大方地在破烂的门槛前面摆姿势让我拍照。我们还路过了著名的老字号小酒馆“五分钱”和“小佛罗里达”，里面顾客盈门，酒馆外游客川流不息，据说当年海明威经常光顾这里。我们好不容易在“五分钱”酒馆找到一个位置，每人要了一瓶啤酒，价格却今非昔比，每瓶啤酒收费三美元。几个吉他手在角落里低吟浅唱，比起刚才大教堂广场上的流浪艺人，无疑多了几分悲凉，对顾客来说这才是最好的下酒菜。在老哈瓦那城市的尽头，靠近河边的一处地方，有一幢两层楼房，外表不起眼，里面却布置得非常大气，那正是拉姆艺术中心。

维弗莱多·拉姆（Wifredo Lam，又译作林飞龙，1902—1982）被认为是古巴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也是第一个赢得国际声誉的拉丁美洲画家。拉姆的父亲是华裔，母亲是西班牙人和非洲人的后裔。在世界各地，华人大多各自为营，以相似的生活方式存在，形成众多的唐人街或中国城，唯有古巴的华人例外，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并且改变了姓氏，例如，李姓改成了刘易斯。

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应该与古巴民众对中国人的友好态度有关。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叫我chino或chinito，听起来比起英语里的chinese要亲切悦耳多了。和我一起的西方同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甚至还有点儿忌妒，这情景使我想起了印度。不过，参观老哈瓦那的唐人街却让我有些失望，那不过是一条50多米长的胡同，入口处立了一块牌坊，仅有的几家饭店和肉铺主人都是混血儿，我只遇到一个自称有华人血统的小伙计，其中还有一个小剧场在放映电影《红高粱》。

拉姆出生在古巴中部的一座小镇上，从小就显露出艺术天赋，他由当地的镇政府出资前往欧洲留学。除了战争时期避居美国以外（他和安德烈·布勒东同船去了纽约），维弗莱多·拉姆在马德里和巴黎度过了大半生。或许是由于血统的关系，拉姆的作品里有非洲艺术的影子，他与包括毕加索在内的艺术家关系亲密，毕加索对非洲木雕感兴趣主要也是受其影响。拉姆的三任太太分别是西班牙人、德国人和瑞典人，我们在艺术中心认识的一位古巴妇女对此耿耿于怀。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拉姆12岁时就为他的华裔父亲画过肖像，可他本人却从未到过中国。



拉姆作品赞比西娅（1950）

拉姆的作品主要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机械的部件、飞鸟的影子和光洁的头颅时时闪现其中。从1939年起，拉姆索性成了超现实主义流派的成员，可是在我看来，他的作品里还是缺少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这妨碍了他取得进一步的成就。除了绘画以外，拉姆与西班牙画家胡安·米罗一样，创作了不少以鸟为主题的金属雕塑，只是在体积

上小了许多。拉姆的作品大多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和伦敦的泰特美术馆等世界一流的艺术馆收藏。

4. 哈瓦那朗诵记

在拉姆艺术中心的门厅里，我看到一幅“哈瓦那双年展”的海报，上面印着拉姆晚年的代表作《第三世界》。哈瓦那双年展已经揭幕，自费前来参展的各国艺术家超过1 000人，其中有两位注定要和我认识。我来古巴以前，曾请我的德文译者、居住在斯图加特的诗人托比亚斯·布加特介绍几位哈瓦那诗人给我认识，因托比亚斯·布加特不久前刚刚到访加勒比海。

原本，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和罗萨里奥国际诗歌节上各邀请了一位古巴诗人，可他们既不住在哈瓦那，又不会使用电子邮件，因此无法联络上。其中一位叫塞萨·洛佩兹的诗人，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虽然他身材矮小，相貌平常，却极具个性，朗诵起诗歌饱含激情。无论是朗诵会之前还是之后，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一长串男女崇拜者。

事实上，除了莎莎这个共同爱好以外，哥伦比亚人和古巴人还有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性，那就是刚毅和无所畏惧，否则安第斯山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游击队。这次，布加特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女诗人蕾伊娜，当我通过她的邻居给她打电话时，她告诉我，有一对正在参加双年展的墨西哥画家夫妇正准备到她家做客，问我可否和他们一起来，那样就免去找路的麻烦了，她同时把那对画家夫妇下榻的旅店电话告诉了我。

墨西哥位于拉丁美洲的最北端，它与位于拉丁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是西班牙美洲文化最发达的两个国家，我在罗萨里奥诗歌节上了解

到，一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必须要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墨西哥城或布宜诺斯艾利斯这4座城市之一出版著作并获得认可，才能在西班牙语文学界里真正站住脚跟。

我见到那对墨西哥画家时，才知道先生佩德罗还是一位诗人兼编辑，而他的夫人安娜是洪都拉斯诗人，安娜告诉我蕾伊娜的家和一般古巴人家一样很穷，他们每次去看望她总要带些食物和酒。我因此也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当我跟随佩德罗夫妻找到蕾伊娜家时，看到她家对面有一个露天的小菜场，几个小贩的篮子里只剩下不甚新鲜的青菜、萝卜和洋葱头了。

出乎我的意料，蕾伊娜的家布置得温馨整洁，两居室加上屋顶上搭起顶棚的阳台，倒也舒适自在。她的丈夫塞拉诺是文化馆一个普通的职员，看起来像是模范丈夫，沏茶、递烟，照顾客人的活儿全由他包了。蕾伊娜告诉我们，目前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5美元，只够全家下一次馆子。我想起在80年前，拉姆去欧洲留学时，当地的镇政府每月还提供给他40美元的奖学金。

说话间，蕾伊娜念了几首她的新作，布加特写信告诉我，蕾伊娜的诗写得很棒，德文版诗集不久将在法兰克福问世。可是，也许她的朗诵水平有限，听起来除了比较凝重以外，我没有别的感觉了，至于内容的好坏我就得仔细查阅西汉字典才能明白。接着，佩德罗和安娜各朗诵了一首自己的诗，我因这个场景而陶醉，4位诗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唯一忠实的听众是蕾伊娜的丈夫塞拉诺。这是一场即兴举行的朗诵会，我用中文朗诵了一首旧作《梦想活在世上》和一首在麦德林写的新作《飞行》。

显而易见，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中文朗诵。接着，我从口袋里掏出译文，蕾伊娜和佩德罗分别念了一首我的诗，从安娜和塞拉诺的表情来看，效果相当不错。次年夏天，我的这两首诗连同另外4首诗便发表在佩德罗担任编辑的墨西哥城诗刊《断裂》上了，可惜那时我还无

缘造访那座高原上的城市。我在Vedado饭店遇到过几个墨西哥游客，他们走到哪里就唱歌跳舞到哪里，风景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舞台上的布景更换一下，只是给观众看的。



保拉街41号诗人何塞·马蒂出生地

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的国际关系情形，除了墨西哥以外，几乎所有的美洲国家都与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虽然戴高乐访问拉丁美洲，给古巴带来一丝希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哈瓦那通航的欧洲城市只有一个——布拉格，这条经停莫斯科的航线也是切·格瓦拉出访亚非欧的必经之路。在那段时间里，古巴的政治氛围令人窒息，蕾伊娜那晚提起在西班牙出生的古巴摄影师内斯托尔·阿尔门德罗斯。1961年，阿尔门德罗斯因发表了一篇为反映酒吧夜生活的纪实短片辩护的文章而遭到了批评。

据说，卡斯特罗亲自参加批判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刊登阿尔门德罗斯文章的报纸随后被查封，他本人也遭到放逐，却幸运地成了世界级名人，1978年，他拍摄的影片《天堂之日》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冷战”结束以后，古巴虽然还是卡斯特罗当政，但气氛明显缓和了许多，人们私下里可以随意开玩笑，许多有关卡斯特罗的政治笑话不胫而走。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蕾伊娜的全名叫蕾伊娜·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如今，她已是古巴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2013年，蕾伊娜获得

了古巴国家文学奖。2014年，她又荣获了智利政府颁发的“聂鲁达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可以说，这是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和塞万提斯奖以外，古巴和西班牙语诗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而这两个奖每年都只有一位获奖人，想必蕾伊娜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今也已经大为改善。

2001年1月，麦德林

2018年1月，杭州二稿

西湖，或梦想的五个瞬间



白堤的冬天
西湖申遗图

1

在水边

黄昏来临，犹如十万只寒鸦，

在湖上翻飞；而气温下降，

到附近的山头，像西沉的落日

消失在灌木丛中。

我独自低吟浅唱，在水边。

用舌头轻拍水面，溅击浪花。

直到星星出现，在歌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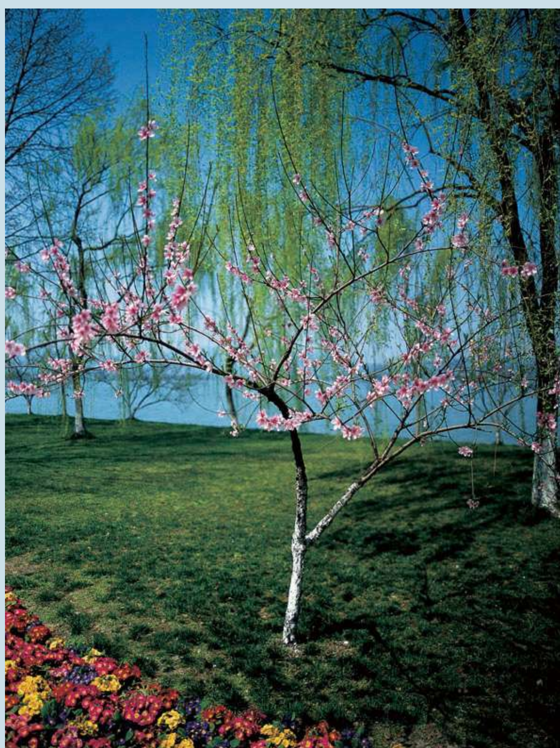
潸然泪下。

1991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独自一人闲坐西子湖边，写下或者说是得到了这首诗，这段喃喃低语成了我青年时代的一种生活写照。记得那天天色阴沉沉的，一个寂寥平凡的日子，我离开校内的单身宿舍，骑车出了大学校门，沿着西溪路和保俶路来到少年宫。接着，向右加速并冲上了断桥，然后在白堤上缓缓骑行。那时候，我喜欢在词与物之间徜徉，陶醉于为事物命名的幸福之中。那时候，杭州还是一座小城市，人们的生活比较简单，既少有酒吧、茶馆、迪厅之类供人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没有私家轿车、高级公寓甚或五星级酒店。换句话说，社会阶层还没有明显地分化出蓝领和白领、穷人和富人。

白堤虽然离闹市区不远，却很难在这里碰到一个熟人，大多数游客都是外地人，这容易营造出一种幻景。加上那时我到杭州的时间不长，每次逛西湖都有不一样的感觉。那时的我有点儿贪心，经常到湖边寻觅灵感，并且总能在骑车或漫步的途中有所斩获。如同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所说的：在诗人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梦想将现实本身同化了。不过，我平时写的诗歌与西湖甚或杭州这座城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那天下午却多少有点儿反常，我在白堤上来回转悠，最后竟然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冷飕飕的湖面。直到黄昏来临，我回眸凝望宝石山的那一瞬间，才似乎发现了什么。那种体验妙不可言，就像此时此刻，想象力的作用使得记忆栩栩如生，同时也为记忆绘制出插图。殊为难得并值得珍惜的是，我得到了一首关于西湖的诗。

2

我的故乡在东海之滨，一个盛产蜜橘和枇杷的地方，一个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县级行政单位，我在那里出生、长大，直到考上大学。我第一次听说西湖必定是在9岁以前，因为那年的残冬和初春之交，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次访问了北京，接着他来到杭州。当报上登出尼克松一行在杭州花港观鱼的照片时，美丽的西湖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上。


白堤的春天 《城市画板》供图

至今我依然记得，县城汽车站的墙壁上写着：到杭州的里程是324千米，票价7元8角。可是，后来的每次旅行我都是去温州或更近的地方，直到6年以后，我才得以亲眼见到西湖和那座依偎在它身边的城市。人们无法想象，那最初的一瞥对于一个喜欢梦想的男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是在去济南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西湖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当汽车从茅以升和梅旸春设计的钱塘江大桥上穿过，我首先看到的是六和塔和蔡永祥烈士事迹陈列馆，当时出现在中学教科书上的只有那座陈列馆，并没有江南名胜六和塔，甚至连建塔1 000周年也被忽略了，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那不是明摆着的错失商机吗？沿着绿树成荫的南山路向北，杭州西湖若隐若现，童年时代的一个美梦实现了。这种感觉唯有在17年以后，我乘坐高速列车从尼斯去往巴黎的旅途中才失而复得。

济南的名胜中有趵突泉和大明湖，大明湖是北方城市里唯一可以与颐和园中的昆明湖相媲美的湖泊。小沧浪亭的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和杜甫的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使得泉城名声大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做过齐州（今济南）知州，宋代两位大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的故居也坐落在湖畔泉边，清末小说家刘鹗的名作《老残游记》把大明湖写得很美。可是，这一切均未能打动我，倒是好多次寒暑假期间，我回家路上流连杭州，并把初恋的足印留在了西子湖畔。那时候，我正潜心在数学王国里遨游，若干年以后，我取得最后的学位来到杭州任教，才写下一首诗，作为青春期的一个纪念，那也是我最早描写西湖风景的作品之一。



白堤的秋天 佚名摄

宝石山

柳丝漂漾在湖上

被一簇簇桃花

分隔

断桥向西

雨点一样密集的情侣

向西

早春二月

青郁的宝石山上

是谁的嘴唇开口说话？

3

古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出处恐怕无法考证了。这句话有着“几何学的想象力”，比起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老年对壮年的回忆），或者宋代词人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对逝去的青春的缅怀）来，一点儿也不显逊色。对此，13世纪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有着自己的理解，“苏州是地上的城市，正如京师是天上的城市”。这位大旅行家对京师（杭州）情有独钟。在那部影响历史进程的游记里，他用了约14页的篇幅来写杭州（苏州只用了一页），还使用了“人间天堂”这个词，如今人间天堂已成为西湖边上一家酒吧的名字。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游记对当时“世界上最美丽与华贵的城市”及其居民的描述仍十分准确，例如杭州人喜欢吃家禽和海鲜，向往奢华的宴席，爱好绘画和室内装修，杭州城内妓女的数量多得惊人，男性长相清秀而且都对女性很体贴，等等。



西湖的西边 佚名摄

不知从何时开始，西湖美丽的风景在我眼里逐渐凝固和淡化，甚至成为扼杀才华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美景使许多天资聪颖的诗人和作家过早地丧失了想象力和进取心。当年的鲁迅就曾写诗劝阻郁达夫把家迁往杭州，鲁迅对西湖的概括性评价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这样的观点

绝非文人所独有，从鲁迅的故乡绍兴向东直到宁波，这一带的人们似乎更崇尚沪上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以至于直接连接宁波和上海的杭州湾大桥屡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苏东坡之后，还有哪一任杭州的父母官恃才自傲呢？苏小小之后，才貌双全的佳人也难觅，以至于近水楼台的多情才子徐志摩只好移情别处。


芙蓉湖 作者摄于厦门

“是因为缺少想象力才使我们离家/远行，来到这个梦一样的地方？”这是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句。继学生时代游历了西北、东北和西南以后，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头三个夏天，先后去了三座海滨城市——福州、青岛和厦门。“家是出发的地方”，这是我一篇短文的开头一句，其意义对我来说非同寻常。因为我住在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显而易见，蓝色的大海更诱使人想入非非，那无边无际的水域既可以接纳童年的美梦，又能够抚慰受伤的心灵。厦门大学是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带给我灵感，校园不仅紧挨着海水浴场，校内还有一个小巧可人的湖泊，居然可以通宵划船。我用一首小诗记录了那次旅行，那也是我第一次倾心于西湖以外的湖水，或许，我把它看成了西湖之水的一种延伸。

芙蓉湖

一次我驾舟在芙蓉湖上

一位少女在岸边沉入遐思

她夏装的扣眼里闪烁着微光

我驶近她，向她发出邀请

她惊讶，继而露出了笑容

暮色来到我们中间，缩短了

万物的距离，一颗隐微的痣

比书籍亲近，比星辰遥远

4

马可·波罗的旅行激发了西方人对东方无穷无尽的向往，同时也反过来让我们产生了西游的梦想。1993年秋天，在对中国香港进行了一次短促的访问之后，我匆匆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异国的景色、人物和风俗如春风般扑面而来，我打开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吸收灵感，很快写出了100多首诗歌，其中不乏对秀美却缺乏历史沉淀的风景的情感抒发，例如《尼加拉瓜瀑布》、《约塞米蒂》和《米勒顿湖》，后者位于西海岸的圣华金河，以及我在归途中游日本所获的《芦之湖》，该湖坐落在本州中部箱根群山的怀抱之中。可是，这类情感的抒发通常不带有任何鲜明的地方色彩，即使在芝加哥亲近了烟波浩渺的密歇根湖或是在多伦多亲近了安大略湖之后，我写下的这首诗仍然表现出一股东方韵味。

湖水

大地是一片湖水

天空是一片湖水

城市是一片湖水

房屋是一片湖水

墙壁是垂立的湖水
椅子是折叠的湖水
茶杯是卷曲的湖水
毛巾是悬挂的湖水

阳光是透明的湖水
音乐是流动的湖水
爱情是感觉的湖水
梦忆是虚幻的湖水

没有一个地方让我喜欢：我就是这样的旅行者。法国诗人亨利·米修在《厄瓜多尔》里这样写道，他最早的两部诗集都是关于想象中的旅行。其实，旅行是人类的普遍需求，也是延伸生命内涵的有效方式。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未必要见多识广，但他们需要时常呼吸新鲜的空气。如同阿瑟·兰波的诗中所写的："生活在别处"，巴黎大学的学生曾把这句话写在校园的墙壁上。米兰·昆德拉用"生活在别处"命名了一部小说，其中提及："就像兰波的老师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那些著名的捉虱女人——俯身向这位法国诗人，当他长时间地漫游之后，便去她们那里寻求避难，她们为他洗澡，去掉他身上的污垢，除去他身上的虱子。"诗人之旅，是享尽了自由、孤独和极乐的精神之旅。

而我每次异国漫游以后回到杭州，总能对这座城市有新的发现或感受：她的美丽在我身上注射了一枚温和的毒汁，我有我的双桨：语词和梦想，奢华的宁静和追名逐利的纯朴交相辉映。不仅如此，杭州还让我为自己找到借口和契机来从事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散文。本来，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写作地点变得不那么重要（就像科学论文的写作一样），唯一重要的就是作者的心态。可是，写作这种事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文学创作交织着两种状态：在国内写散文，在国外写诗歌。而我的环地中海之旅，尤其是新千年的拉丁美洲之行和从死海到里海的旅程，则让我再次体验到诗歌灵感的喷发，一路行走一路写作，我似乎都听见了米修的声音——“我从遥远的国度写信给你。”

5

然而，杭州毕竟是我居住得最久的一座城市，我对它的观察也较为细致。比起中国任何一处风景来，西湖更像一幅山水画，浓缩了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理想之美。事实上，有许多人都是在折扇上第一次认识它的，这一点注定让杭州成为一座“袖珍型”的城市，尽管它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日渐庞大，可是一旦过了子夜时分，唯有六公园到南山路的湖滨一带尚余几处亮光和喧嚣。与黄山、漓江、长城、秦始皇兵马俑这些奇异的景观不同，西湖之美依赖于人文的渲染和典故，这注定了它的知名度局限于汉语世界和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的邻国。除非有一天，杭州主办一场国际诗歌节，邀请世界各国的顶尖诗人来做客。某位大文豪在现场说出“谁厌倦了杭州，谁就厌倦了生活”之类的话，杭州的美名就会在世界上不胫而走。



第5套人民币上的西湖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本人对杭州也有了某种隔离或疏离感，它千年不变的方言，听起来像是鱼类王国的母语，始终让我排斥。居住在宝石山的北侧，西湖对于我而言就像是一只手背，总是朝

向熙熙攘攘的行人，而白堤、苏堤便成了手背上流淌的血脉。久而久之，我自己也成了杭州城里的一名游客，唯其如此，我才有可能再次获得新的观察西湖的角度。果然，在20世纪末的一个夏日，我为西湖找到了一种较为抽象的表现方式。

湖

1

明亮清澈的水面

燕子在天空飞翔

对于小小的湖泊

它就是一架歼击机

2

两支木桨摇响

一个瘦瘦的老家伙

滋润的船体

委身于湖面

3

青山倒映在湖中

那碧绿的水波下

可有烈焰的森林

鱼儿和猎人一起巡游

4

一阵微弱的凉风吹过

湖上漾起了层层涟漪

湖水的心事重重

徒有冷漠的外表

5

一大群人爬上了岸

他们的面孔像鱼鳞

阳光似刀片切割下来

被茂密的树枝遮拦

6

黑夜来到我们的周围

有人扔下一块石子

可以听见一种声音

在湖上久久地回荡

或许，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西湖，它只是由来已久的一件事物。既可以被看作一处公共景点，又像是我的一只手背，可以随时跟我前往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某一张长椅上，去到南美洲、大洋洲或非洲的某一座丛林中。

2002年8月21日，杭州

数学家与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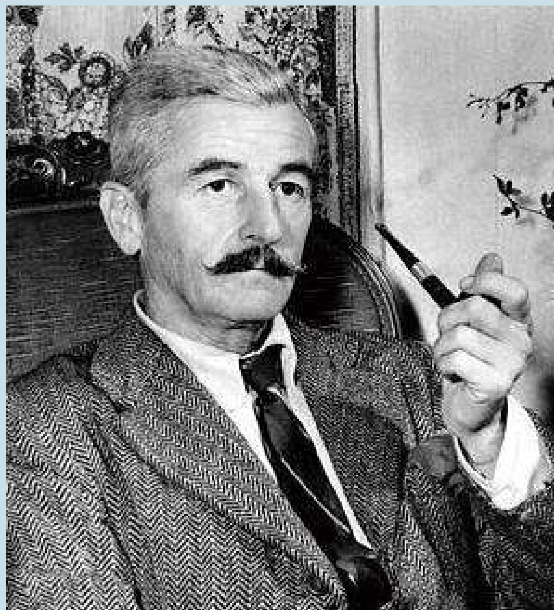


“通灵者”兰波

数学家和诗人都像先知先觉的预言家。只不过诗人由于天性孤傲被认为是狂妄自大，而数学家则由于超凡脱俗让人们敬而远之。因此，在文学艺术团体里诗人往往受制于小说家，正如在科学界物理学家领导数学家一样。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我做不了诗人”，晚年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彬彬有礼地承认：或许每一位长篇小说家最初都想写诗，发觉自己写不出来，就尝试着写短篇小说，这是除诗歌以外要求最高的艺术形式。再写不成的话，只有写长篇小说了。相比之下，物理学家并不那么谦虚，但无论如何，对每一位物理学家来说，物理认识的增长总是受到数学直觉和经验上的双重指导。物理学家的艺术就是选择一种材料并用来为自然

规划一幅蓝图，在这个过程中，数学直觉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数学家改行研究物理学、计算机或经济学，就像诗人转而写小说、随笔或剧本一样相对容易。



小说家福克纳

数学通常被认为是与诗歌绝对相反的，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可是无可否认，这两者的关系有这种倾向。数学家的工作是发现，而诗人的工作是创造。法国画家德加有时也写十四行诗，有一次他和诗人马拉美谈话时诉苦说，他发现写作很难，尽管他脑海里有许多概念，实际上是概念过剩。马拉美回答：诗是词的产物，而不是概念的产物。与此相反，数学家尤其是代数学家主要研究概念，即把一定类型的概念组合起来。换句话说，数学家运用了抽象的思维，而诗人的思维方式却较为形象，但这种差别也不是绝对的。

数学和诗歌都是想象的产物。对一位纯粹数学家来说，他面临的材料就像是花边，像是一棵树的叶子，像是一片青草地或一个人脸上的明暗变化。也就是说，被柏拉图斥为“诗人的狂热”对数学家同样重要。举例来说，当歌德听到卡尔·威廉·耶路撒冷自杀的消息时，仿佛突然间见到一道光在眼前闪过，立刻他就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结尾和耶路撒冷的命运联系起来，他回忆说：“这部小册子好像是在无意识中写成的。”而当“数学王子”高斯解决了一个困扰了他多年的问题（高斯和符号）之后写信给友人说：最后只是几天以前，成功了，我想说，不是由于我苦苦地探索，而是由于上帝的恩惠。那一刹那，就像是闪电击中了我，这个谜解开了。我以前的知

识，我最后一次尝试的方法以及成功的原因，这三者究竟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我自己也未能理出头绪。



德加自画像

数学虽然与天文、物理及其他自然科学分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完全自成体系的、内容极为宽广丰富的、最具真实性的知识领域。这一点正如真正的文字语言，它不仅用来记载和表达思想及思维过程，相反通过诗人和文学家的笔又把它们创造出来。可以这么说，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匈牙利数学家保尔·图拉认为：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这也应验了福克纳的话：人只要有向往自由的意志，就不会被毁灭。

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我认为数学研究的过程或多或少是一种对智力的锤炼和对美的欣赏过程，这或许是数学研究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我非常能够理解哲学家乔治·桑塔耶拿晚年说过的一席话：如果我的老师们真的曾在当初就告诉我，数学是一种摆弄假设的纯粹游戏，并且是完全悬在空中的，我可能已经成为优秀的数学家了。因为我在本质王国里感到十分幸福。当然，在此我不能排除伟大的思想家追求时代智力风尚，就如同妇女在服饰上赶时髦一样。

与其他任何学科相比，数学更像是年轻人的事业。最著名的数学奖之一——菲尔兹奖是专门奖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的。黎曼死于40岁、布莱士·帕斯卡死于39岁、斯里尼瓦瑟·拉曼纽扬死于33岁、艾森斯坦死于29岁、阿贝尔死于27岁、埃瓦里斯特·伽罗瓦死于21岁，

他们生前的工作已经足够奠定伟大数学家的地位。有些数学家虽然长寿，但他们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大多是在青年时代完成的，例如牛顿和高斯。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列出一长串早逝的诗人名单：普希金、洛尔迦和阿波利奈尔都死于38岁，兰波死于37岁，王尔德死于46岁，马雅可夫斯基死于37岁，西尔维娅·普拉斯死于31岁，雪莱和叶赛宁死于30岁，诺瓦利斯死于28岁，济慈和裴多菲死于26岁(注)，洛特雷阿蒙死于24岁。在其他艺术领域，大器晚成的名家更多。以绘画为例，高更、卢梭和康定斯基都是30岁以后才开始艺术生涯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科学、艺术领域里，数学家和诗人是最需要天才的。不同的是，对诗人来说，一代人经常推倒另一代人所修筑的东西，一位诗人所树立的成就另一位诗人要加以摧毁。而对数学家来说，每一代人都能在旧建筑上增添一层新楼。由于这一原因，诗人比数学家更容易出现或消失。



数学家图拉

诗人的语言以简练著称，埃兹拉·庞德被誉为“简练的大师”。这方面似乎没有人做得更好，殊不知数学家的语言也是如此，英国作家J.K.杰罗姆曾在《闲人痴想录》中举过一个例子，有这样一段描写：

当一个12世纪的小伙子坠入情网时，他不会后退三步，他会凝视心爱的姑娘的眼睛，然后告诉她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他会去外面看看，倘若正好碰上那么一位仁兄，并且打破了他的脑袋——我指的是另一个人的脑袋——那就证明了他的——前面那

个小伙子的——姑娘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打破了他的脑袋——不是他自己的，你知道，而是另外那个人的——对后面那个小伙子来说的另外一个——那就说明了……

倘若我们把这段没完没了的叙述借助数学家的符号表达出来，就变得非常简洁明了：

如果A打破了B的脑袋，那么A的情人是一位漂亮姑娘。

但如果B打破了A的脑袋，那么A的情人不是一位漂亮姑娘，而B的情人却是一位漂亮姑娘。

不仅如此，数学家的语言还是一种万能的语言，歌德曾逗趣说：数学家就像法国人一样，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能把它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于是就成了全新的东西。马克思更是教导我们：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完善了。与此相应，诗是一切艺术的共同要素，可以说每一件艺术品都需要有“诗意”。因此，莫扎特才有“音乐家诗人”的美誉，肖邦也被称为“钢琴诗人”。不难想象，在一篇科学论文中出现一个优美的数学公式和在一篇文章或谈话中间摘引几行漂亮的诗句，两者有一种惊人的对称。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命题。弗洛伊德认为：诗人在心灵的认知方面是我们的大师。这句话曾被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奉为圭臬。诺瓦利斯声称：“诗歌的意义和预言十分相似，一般来说，和先知的直觉差不多。”



哲学家桑塔耶拿



数学家伽罗华

诗人（预言家）通过有魔力的词句和形象使人得以触及一个陌生而神奇的世界的奥秘。因此，一个正直的诗人难免会冒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柏拉图历数诗人的两大罪状：其一，艺术不真实，不能给人真理；其二，艺术伤风败俗，惑乱人心。㊟另外，纯粹数学尤其是现代数学的发展往往是超越时代的，甚至是超越理论物理学的。例如，伽罗瓦群和哈密尔顿的四元数的理论在建立近一个世纪以后才开始应用于量子力学；非欧几何学被用来描述引力场，复分析在电气动力学中的应用也有类似的情况；而圆锥曲线自被发现2 000多年来，一直被人

们认为不过是富于思辨头脑中的无利可图的娱乐，可是最终它却在近代天文学、仿射运动理论和万有引力定律中发挥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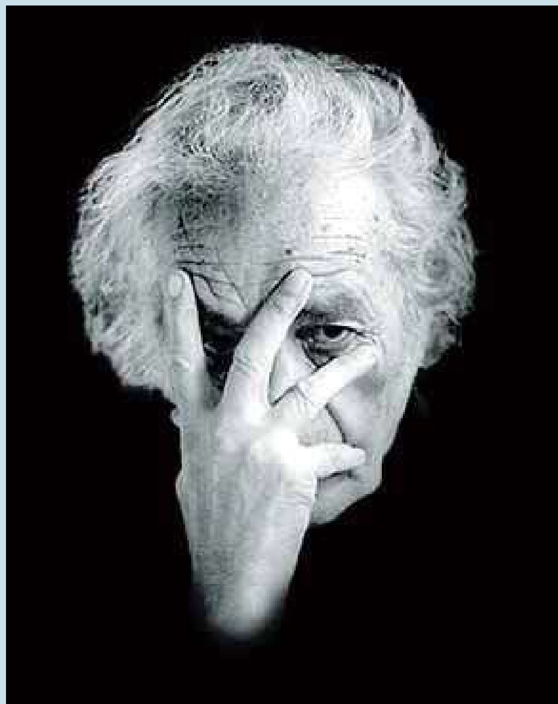
然而，更多的时候，数学家的工作并不被人们理解。有这样的指责：很多人认为数学家喜欢沉湎于毫无意义的臆测，或者认为数学家们是笨拙的和毫无用处的梦想家。可悲的是，这些“饱学之士”的观点还得到某些权威的支持。圣·奥克斯丁一面攻击荷马的通俗文学败坏人心，“把人间的罪行移到神的身上”，“我们不得不踏着诗的虚构的足迹走入迷途”，一面又叫嚷道，“好的基督徒应该提防数学家和那些空头许诺的人，这样的危险业已存在，数学家们已经与魔鬼签订了协约，要使精神进入黑暗，把人投入地狱。”古罗马法官则裁决“对于作恶者、数学家诸如此类的人”，禁止他们“学习几何技艺和参加当众运算数学这样可恶的学问”。


诗人诺瓦利斯

叔本华——一位在现代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哲学家，一方面视诗歌为最高艺术，另一方面却把算术看作最低级的精神活动。㊟进入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受惠于数学的，至少圣·奥古斯丁那样攻击数学的权威人士销声匿迹了。但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境况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如故，或许他们应该用毕加索的话来聊以自慰：人们只有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能得以登上艺术家的宝座。因此我们对艺术非但不该加以鼓励，反而应该压抑它。

数学家和诗人常常是不约而同地走在人类文明的前沿。古希腊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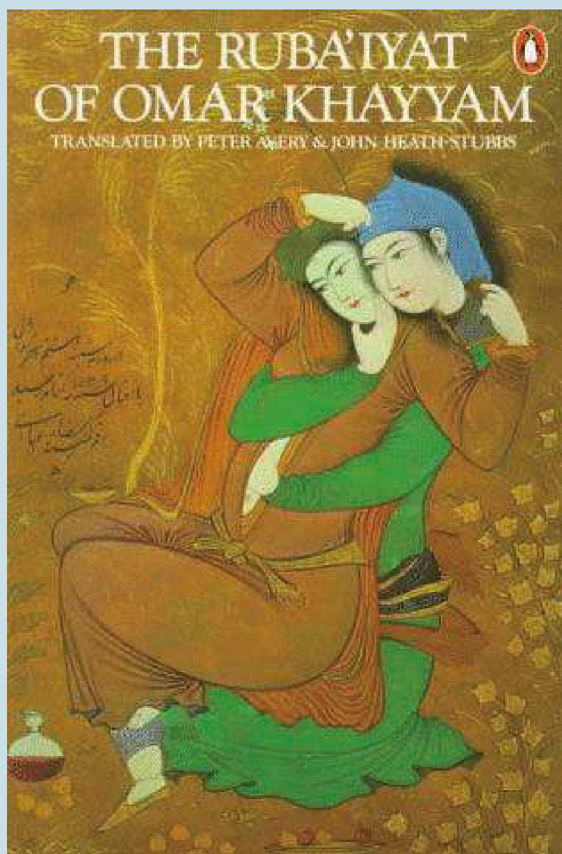


智利人帕拉

圣·奥古斯丁

重要的两部学术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几乎诞生在同一时期，并且都是建立在对三维空间模仿的基础上。只不过前者是抽象的模仿，后者是形象的模仿。现代艺术的先驱爱伦·坡、波德莱尔与非欧几何学的创始人罗巴切夫斯基、鲍耶也属于同一时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画家聚集巴黎，发动一场诗意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时，这个世界上另一些聪明绝顶的头脑正各自为营，致力于发展新兴的数学分支——拓扑学。这里，我想引用一个拓扑学家经常引用的例子，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篇叙事诗《海华沙之歌》（创作于1855年，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受其影响写成）中有一段故事，讲到一个做毛皮手套的印第安人：

> 他把晒暖的一侧弄到里面，把里面的皮翻到外面；把冷冰冰的一侧翻到外面，把晒暖的一侧弄到里面……



海亚姆《鲁拜集》插图

在手套的翻进翻出过程中，这个印第安人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拓扑动作。有趣的是，拓扑这个词最早叫形势分析学，由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提出。后来高斯的学生李斯亭在1848年引入了“拓扑”一词。在那个年代，拓扑的概念只存在于极少数几个数学家的头脑里。

最后我想阐明的是，一个人能不能既成为诗人又成为数学家呢？帕斯卡尔在《思想录》的开头这样写道：凡是几何学家只要有良好的洞见力，就会是敏感的；而敏感的人若能把自己的洞见力运用到几何学原则上去，也会成为几何学家。虽然如此，从历史上看，只有18世纪意大利数学家马斯凯罗尼和19世纪法国数学家柯西勉强算得上是诗人，20世纪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也曾做过数学教授。而人类历史上能够在两个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或许唯有欧玛尔·海亚姆了，这位11世纪的波斯人比多才多艺的达·芬奇还早出生400年，他的名字不仅因给出三次方程的几何解载入数学史册，同时又作为《鲁拜集》一书的作者闻名于世。20世纪初，14岁的T.S.艾略特偶然读到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立刻就被迷住了。他后来回忆说，当他进入到这光辉灿烂的诗歌之中，那情形“简直美极了”，自从读了这些充满“璀璨、甜蜜却有着痛苦色彩的”诗句以后，便明白了自己要成为一名诗人。

1991年5月，杭州

1. 1849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反抗俄奥联军的一次战斗中失踪，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他一直被认为是在26岁那年“死在哥萨克士兵的矛尖上”。直到不久前，俄罗斯研究人员才找到他的档案，这表明他曾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并于1856年死于肺结核，由此可见，他去世时为33岁。
2. 柏拉图的用词较有特色，在他的《法律篇》里，他认为不知道数学的基本应用是荒唐而无耻的，更多的是猪而非人类的特征。
3. 叔本华的这个观点正好和柏拉图唱反调，柏拉图声称要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同时又猜测“上帝是位几何学家”。

数学家与政治家



业余几何学家拿破仑

数学与政治一样，都是可能性的艺术。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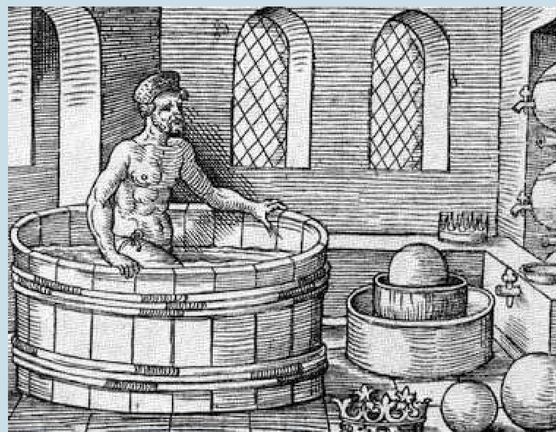
1

数学家向来是不问政治或远离政治的，他们不像艺术家那样惹是生非，这一点晚年的波德莱尔似有所悟，这位惯于在贵妇人的客厅里

寻觅灵感的法国诗人被后世尊为“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却终其一生过着波希米亚式的放浪生活，他的晚年颇为凄凉。在其身后出版的散文集《巴黎的忧郁》里，波德莱尔引用了17世纪同胞数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的话：“几乎所有灾难的发生都是由于我们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数学家较艺术家更容易赢得政治家的信任和友谊。

欧几里得是古希腊几何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出生地和确切的生活年代至今仍是一个谜。我们只知道他曾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求学，后来被埃及国王托勒密延聘到亚历山大，主持亚历山大大学数学系，欧氏因此得以在亚历山大城完成著名的《几何原本》。这部著作是现代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作为演绎推理逻辑方面的杰出典范，它甚至能给思想家们带来启示。传说托勒密曾向欧几里得询问学习几何学的捷径，他的回答是：“在几何学中没有王者之路”。而当有位学生问起学习几何学能得到什么回报时，欧几里得命令仆人给这名学生一枚钱币，并对身边的人说：“给他几枚钱币，因为他总想从学习中得到好处。”

在欧几里得去世前出生的阿基米德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年轻时也曾在亚历山大大学学习过，师从欧几里得的弟子。据说阿基米德返回故乡叙拉古以后，很受希罗王的器重。有一个流传广泛的故事，希罗王得到一顶金王冠，他担心这个王冠不是纯金的，便求助于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有一天沐浴时注意到，一个人坐在澡盆里，排出的水在容积上和自己的身体体积相等，他立刻联想到，相同重量的物体同时置入水中，密



阿基米德从浴盆里站了起来

度小的物体排出的水比密度大的多。由此他发现了著名的阿基米德定律（浮力定律），并解决了希罗王金王冠的问题。

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在位时政绩显赫，他率先把罗马的统治扩大到了北非，并御驾亲征渡过英吉利海峡，使不列颠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除了军事才能以外，他对历史也颇有研究，被称为“史学家皇帝”。更为有趣的是，据说这位皇帝还写过一本题为《如何在掷骰子中获胜？》的小册子，探讨了概率问题。原来，他和那些悠闲的大臣爱好博弈，迷恋于掷骰子的游戏。可惜这本书没有保存下来。直到1654年，帕斯卡尔和费尔马在通信中奠定概率论的基础，他们的出发点仍是掷骰子这样的赌博游戏。

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数学家的处境相对来说也不算太糟，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非常喜欢数学，有证据表明他把包括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从西班牙传入欧洲其他地方，据说他还制作过算盘、地球仪和时钟。在教皇亲自撰写的著作《几何学》中，他解决了一个当时非常困难的问题：已知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面积，求出两条直角边。西尔维斯特二世的本名叫热尔贝，与克劳迪乌斯一样出生在法国中部，他年轻时旅居西班牙，在一座修道院里学习“四艺”，那里由于受阿拉伯人统治，所以数学水平比较高。后来，西尔维斯特二世来到罗马，因数学才能受到教皇约翰七世的赏识，被引荐给皇帝奥托一世，皇帝很赏识他，于是聘请他给奥托二世当导师。以后的几任皇帝也十分器重他，直到任命他做了教皇。

中世纪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是斐波那契，人们习惯地称他为“比萨的莱昂纳多”，而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称作“佛罗伦萨的莱昂纳多”，他提出的“兔子问题”成就了不朽的斐波那契数列。斐波那契的才能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注意，他受到了皇帝的召见，成为宫廷数学家并向市民和官吏讲授计算方法。有意思的是，800多年后的今天，在美国南达科他州，仍有一家名为《斐波



邮票上的教皇热尔贝

那契》的数学杂志专门刊载有关斐波那契数列的论文，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斐波那契协会”，每年在世界各地轮流举行年会。

在东方，比斐波那契稍晚的中国数学家秦九韶在杭州曾受宋理宗赵昀的召见。据说他纠正了以往错误的历法，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他的《数书九章》概括了宋元时期中国传统数学的主要成就。而在燕京，年长秦九韶16岁的数学家李冶虽三度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却主要是因为忽必烈需笼络知识分子。事实上，这位“占领者”看重的并非李冶的数学才华，而是他“经为通儒，文为名家”的声望。

倒是在阿拉伯世界和波斯，多位君主对数学颇为重视，与数学家的关系也较密切。例如，9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下令在首都巴格达建造了智慧宫，这是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于一体的联合机构，是继亚历山大大图书馆以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代数之父阿尔·花剌子模被聘请主持智慧宫的工作，据说早在马蒙登基以前，花剌子模就在一次游学过程中与之相识了。

在阿拉伯人占领的波斯，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数学家，而且几乎每一位都得到了君王的庇护和赞助。比如，11世纪的学者海亚姆和塞尔柱帝国的苏丹马克沙利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苏丹马克沙利曾把海亚姆邀请到首都伊斯法汗，主持兴建的天文台进行历法工作，海亚姆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直到苏丹去世，他们的故

事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又如，13世纪的数学家纳西尔丁和伊利汗国建国者旭兀烈；15世纪的数学家卡西和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兀鲁伯。其中，卡西最为幸运，因为兀鲁伯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并在他之后去世。卡西在王子建造的天文台工作期间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17位，从而打破了祖冲之保持了近千年的纪录。兀鲁伯曾这样评价：卡西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学者之一，他通晓古代科学，并推动其发展，他能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王子出身的学者兀鲁伯

2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也有一些君主和当时的数学家有密切的来往。17世纪，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邀请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笛卡儿当家庭教师长达一年之久，甚至最后派出一艘军舰前往笛卡儿客居的荷兰迎接。一向深居简出、体质羸弱的笛卡儿一开始非常犹豫，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被女王的热情和诚意打动。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斯德哥尔摩寒冷的天气让他得了肺炎，笛卡儿在到达瑞典的4个月后不治身亡。1933年，由有着“冰美人”之称的瑞典女星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好莱坞电影《瑞典女王》上映，再现了这则真实的故事。

18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曾两度受聘于彼得堡科学院，先后长达31年的时间，此前欧拉的老师、著名的数学世家——伯努利家族的两位成员丹尼尔·伯努利和尼古拉·伯努利也在那里工作过。欧拉是历史上最高产的数学家之一，他的两只眼睛都是在旅居俄罗斯期间失明的，虽说欧拉20岁即离开故乡，可是瑞士法郎的纸币上仍印有他的肖像。在欧拉接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聘请到柏林主持普鲁士研究院工作的25年间，彼得堡科学院照付薪水。可以说，欧拉与这两国的多位统治者均有交往。当欧拉在1766年再度前往圣彼得堡时，同年腓特烈二世又向定居法国的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发出了热情洋溢的邀请，“欧洲最伟大的国王”希望“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在他的宫里。显而易见，这位国王对欧拉的离任耿耿于怀。

在欧洲所有的君王中，拿破仑与数学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他几乎与同时代的每一位法国数学家都交上了朋友。曾经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对拉格朗日的评价是：拉格朗日是数学科学方面高耸的金字塔。据传，拿破仑曾开玩笑地问自己的老师拉普拉斯：为什么你的著作中没有提到上帝？数学家回答：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

拉格朗日（Lagrange）、拉普拉斯（Laplace）和另外一个名字以“L”开头的数学家——勒让德（Legendre）都为那个时代的数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担任众多的官方职务。拿破仑本人还是一位不错的几何学家，他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只用圆规，如何把一个圆周四等分？这个问题后来由他的朋友、另一位定居法国的意大利数学家马斯凯罗尼解答了。

在1812年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时被捕的数十万战俘中，有一位年仅24岁的数学家因祸得福，他的名字叫彭赛列。当时他被关在狱中，身边什么书也没有，就开始在战俘营里思考他学过的数学知识并创立了射影几何学，后来写成了巨著《论图形的射影性质》。他被释放回国后，于1822年在巴黎出版了此书，这部著作开创了射影几何史

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拿破仑的确间接伤害过一位伟大数学家的心，这就是“数学王子”高斯。高斯是一位数学神童，出生在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故乡的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的欣赏，公爵后来成为他的资助人和亲密朋友。比起莫扎特的资助人，不伦瑞克公爵更为慷慨且始终如一，他在高斯29岁那年死于拿破仑军队的入侵。斐迪南的名字虽然战争史上没有记载，却在数学史上留芳。

在大西洋另一头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有几位总统和数学有密切联系，乔治·华盛顿是一位著名土地测量员；托马斯·杰斐逊在鼓励讲授高等数学等课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亚伯拉罕·林肯则被认为是通过研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来进行政治决策的；最有创造性的是詹姆斯·加菲尔德，这位美国第20任总统虽然政绩平平，并且在任上惨遭暗杀，但他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与卓越才能。1876年，加菲尔德独立发现了勾股定理的一个非常简洁的证明。这个证明可以通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计算梯形的面积（第一种方法是用梯形的面积公式，第二种方法是把梯形分解成三个直角三角形来计算，经过比较和化简得到）。与400年前达·芬奇的证明相比，加菲尔德的方法要更简洁。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青铜雕像得以安置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前，我曾在大理石的台阶四周徘徊，没有发现其他人物与他分享这份殊荣。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牛顿。牛顿在数学领域的主要成就是发明了微积分，但人们往往把万有引力定律和其他力学定律也包括在内，因为它们都用数学公式表达。因此，那个时代的人把牛顿、阿基米德和高斯并称为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数学家。又因为牛顿在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很早就进入议会，后来又被安妮女王封为爵士，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可是，牛顿对政治毫无兴趣，据说他在议会的唯一一次被记录在案的发言是要求关上窗。晚年的牛顿沉迷于神学，虽然如此，他还被提升为权力很高的造币厂厂长。



土地测量员华盛顿

与牛顿不一样，出生在莱比锡的莱布尼茨年轻时就喜欢结交王公贵族，那时候的德国还没有统一，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比较落后，随时有可能被法兰西那样的强国吞并。1672年，处于危难之中的美茵茨选帝侯派遣能说会道的莱布尼茨去巴黎，他唯一的使命是：用一项征服埃及的诱人计划去分散路易十四对北方的注意力。结果，莱布尼茨没有见到法兰西国王，他在巴黎研究起了数学，并成了微积分的两位发明人之一，另一位是牛顿。由此引发的一场有关微积分发明优先权的争论，使得英吉利海峡对岸英国的数学发展停滞了一个世纪。

可是，喜欢参与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数学家也不是没有。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就热衷于此，他们在亚平宁半岛南端的克罗托内结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也因此引起了敌对党的嫉恨。后来，毕达哥拉斯被迫逃离，最后客死他乡。至于阿基米德则被入侵叙拉古的罗马士兵用枪刺死，这并不是因为他和希罗王亲近，而是误杀。据说100多年以后，罗马政治家、作家西塞罗来到西西里岛，没有人肯告诉他阿基米德墓地的位置，这位以演说见长的大人物只好自己拨开荆棘寻找。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微分几何的奠基人蒙日积极追随拿破仑，直到拿破仑称帝以后，蒙日也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耻笑，蒙日和三角级数的发明人傅里叶都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回来后蒙日成为了部长而傅里叶只当上县长。蒙日的学生拉扎尔·卡诺也是热情洋溢的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他和他的老师都对处死路易十六投了赞成票。但卡诺在1802年和1804年投票反对

拿破仑终身执政和称帝，为此他逃往瑞士，最后死于异乡。由于过度卷入政治，学术成为卡诺的业余爱好，不过，他的后代却能分身做这两件事。卡诺的儿子萨迪·卡诺成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的孙子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后来当上了法国总统。

相比之下，有着“法兰西牛顿”美称的拉普拉斯更为幸运，也更有才。拉普拉斯比卡诺早4年出生，却比卡诺晚4年辞世。拉普拉斯本是诺曼底一个农民的儿子，靠自己的才华和善于应变的能力，步步高升，深受国王路易十六重用。法国大革命时，他和拉瓦锡等科学家一起研究制定公制系统，所以躲过一劫。之后，随着拿破仑的上台，作为拿破仑从前的数学老师，拉普拉斯很快又在政治上红了起来。他担任过法国经度局局长，还做过6个星期的内政部部长，被拿破仑的弟弟顶替后，成为元老院的掌玺大臣。王朝复辟以后，拉普拉斯又效忠于路易十八，被封爵位。



牛顿爵士吧 作者摄于剑桥



毕达哥拉斯学园遗址 作者摄于克罗托内

政治家虽然在任时声名显赫，但卸任或死后也容易被人们遗忘，英国学者韦斯特福尔在为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300周年撰写的文章中意味深长地谈道：我们从不纪念某某文官的300周年诞辰。对于英国和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个说法可能是成立的，但历史上也出现过几位伟大的君王，如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成吉思汗、阿育王等。而有些数学家之所以具有广泛持久的魅力，原因在于数学本身。

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普罗克洛斯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新柏拉图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曾担任雅典柏拉图学园的园长，他认为，

数学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提醒你有无形的灵魂；它赋予它所发现的真理以生命；它唤起心神，澄清智慧；它给我们的内心思想添辉；它涤尽我们有生以来的蒙昧与无知。

7世纪的印度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婆罗摩笈多曾以诗的语言和形式阐述印度天文学体系，他也说过：

正如太阳以其光芒使众星失色，学者也以其提出代数问题而使满座高朋逊色，若能给予解答则将使侪辈更为相形见绌。



拉普拉斯车站 作者摄于巴黎

在我看来，随着用途越来越广泛，数学已成为对现代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与此同时，在纷繁的现实世界里，数学也是一座坚固的精神堡垒，可以避免让你在现代社会中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和政治一样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从事这两项工作的人都需要冒险精神和勇气，他们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都需要依赖直觉和运气。另一方面，数学和政治也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们各自领域之外的经验和智慧都是有限的。因此在非数学和非政治领域，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的价值也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迫使他们和大众有了距离。尽管如此，数学家和政治家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

倘若要谈论伟大，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划分出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身体上、物质上的伟大，这方面伟大的代表是各种光彩显

赫的事物，例如太空、星辰、国王、富人、首领，他们的伟大是肉眼能看见的。其二是精神的、智慧的伟大，这方面伟大的代表是那些天才人物，例如阿基米德、牛顿、高斯。他们有着他们的领域、他们的显赫、他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辉煌，他们的伟大不是用肉眼看到，而是用心才能感知到。帕斯卡尔进一步指出："一切伟大事物的光辉显赫，对于从事精神探讨的人来说，都毫无光彩可言。"

1990年8月，初稿于杭州
2008年8月，修改于剑桥

纳什，两个世界里的爱



晚年的纳什与妻子艾丽西亚

对话可以增强理解力，但是孤独却是天才的摇篮。

——［英］爱德华·吉本



2001年，也许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不授予数学家的遗憾，挪威政府宣布设立以数学家阿贝尔命名的奖项，2002年是这位27岁就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的天才的200周年诞辰。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是2015

年度阿贝尔奖的两位获奖人之一，但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北欧领奖。

纳什（左一）最后一次出游 在挪威领取阿贝尔奖

1994年，纳什因为在博弈论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15年5月19日，纳什偕夫人从挪威国王手中领取了荣誉。4天以后，他们返抵美国，在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搭乘出租车回普林斯顿途中，因车祸双双罹难。

1. 西弗吉尼亚，天才的童年

回想起来，我恰好在纳什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年夏天，第一次游历了普林斯顿。4年以后，又与友人结伴，驱车沿卡诺瓦河，听着乡村歌手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游览了西弗吉尼亚州。歌中唱道：“乡村路带我回家，到我生长的地方——西弗吉尼亚，我的山峦妈妈。”



纳什的出生地 西弗吉尼亚的布鲁菲尔德

1928年6月13日，纳什出生在西弗吉尼亚南部的工业城市布鲁菲尔德。纳什的父亲曾是“一战”时期的老兵，曾在法国担任中尉，退役后回故乡的电力公司做了一名电气工程师。他的母亲出身名医之家，婚后她按当地的习俗做了家庭主妇。她毕业于西弗吉尼亚大学的语言学专业，曾花几个暑假与女伴出游，并在伯克利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听过课，可谓见多识广。

纳什幼时寄居在外祖母家，常听到老人家在客厅里弹奏钢琴。他不是神童，但自小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往，与此同时，他好奇心十

足，喜欢向父亲提出各种问题，且热衷于做实验。那时当地重商主义风气较浓，同时镇上有一个科学兴趣小组。纳什因而既重视较为实用的经济学，还对科学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纳什

多年以后，纳什妹妹玛莎这样回忆哥哥："他永远与众不同。父母知道他不同寻常，也知道他很聪明。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母亲坚持要我帮助他，给他介绍女朋友，但我并不十分乐意。"少年时期的纳什喜欢恶作剧。据说有一次他制作了一把摇椅，通上了电，想让妹妹坐上去；还有一次，他与街坊男孩一起制造土炸药，结果炸药在那个男孩的膝盖上爆炸了……

对纳什来说，最好、最温暖的朋友是书本。对他而言，每天最美好的时光是晚餐以后。他听完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节目和新闻报道后，就一个人看书，或者翻阅旧杂志。大约在13岁前后，他第一次读到了数学家E. T. 贝尔的《数学精英》。这本书一共讲述了34位数学家的故事。这些传记故事大多生动有趣，让少年纳什很感兴趣。在贝尔笔下，数学家们个个活力非凡、充满冒险精神。

在这本书中，让纳什尤其感兴趣的是费尔马，他的研究领域包含了数论。这位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原本是一名律师，平日里生活乏善可陈，却把夜晚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数学研究。当时纳什就成功地推导出了费尔马小定理的结果：如果n是任意整数，p是任意素数，n自乘

p次后减去n，所得的值恰好是p的倍数。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把这一切都写在了自传里。

2. 从匹兹堡到普林斯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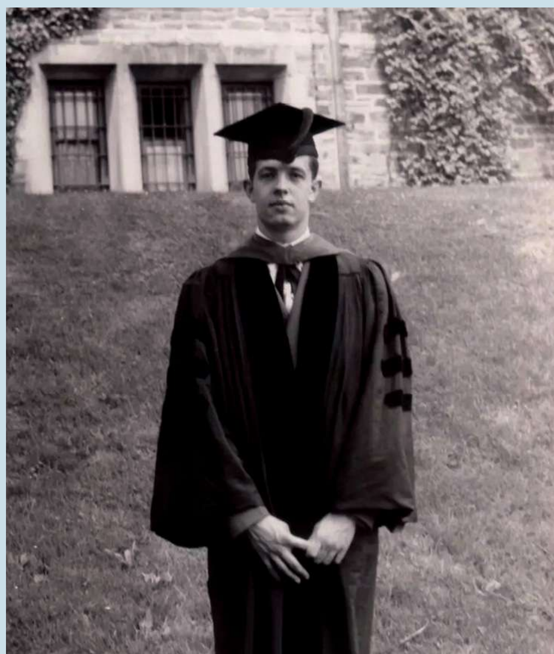
中学毕业后，纳什获全额奖学金并进入了匹兹堡市的卡内基技术学院。他读的是化学工程专业。匹兹堡是一座钢铁城市，处处可见冶炼厂、发电厂和被污染的河流，浓浓的含硫烟雾吞没了市区。卡内基技术学院最初的目标是“为匹兹堡的工人阶级子女提供良好的职业培训”，不过，战后院方努力使之变成一流的大学并取得了成功，现已易名卡内基·梅隆大学。

在几位年轻教员的熏陶下，纳什最终放弃了化学学科，转向了数学，并提前获得学士学位。有意思的是，纳什的同龄人安迪·沃霍尔也于同年进入该学院。安迪出生于匹兹堡本地，是捷克移民的后裔，后来成为波普艺术大师，以玛丽莲·梦露和毛泽东的画像闻名，有的批评家认为安迪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安迪·沃霍尔起初学的是艺术教育学，预备做一名中小学校的教师，在卡内基技术学院获得图像设计学士学位后，他去了纽约闯天下。1987年，安迪·沃霍尔因为失败的外科手术在曼哈顿去世，年仅59岁，他的遗体被运回故乡安葬。如今，安迪·沃霍尔博物馆已成为匹兹堡最吸引游客的地方之一。

1948年春天，在纳什大学毕业那年，普林斯顿大学向他伸来橄榄枝。

纳什的学习方法很特别，主要通过下午茶交谈和听学术讲座，没人见他捧着一本书。与他同年入校的意大利人卡拉比（丘成桐因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获得菲尔兹奖）回忆说，纳什为自己不读书辩护的理由是：学习二手知识会损害他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但是，纳什会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且不时在上面写点儿什么，字迹无人可以辨认。



青年时代的纳什

纳什喜欢独自散步、骑车或躺在休息室的地板上思考。那时，在上海出生的杭州人钟开莱刚在普林斯顿留校做讲师。有一回他推开休息室的大门，发现宽大的桌子上铺满稿纸，中间卧着一个高个子男孩，那正是研究生新生纳什。钟开莱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来赴美留学并做了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他是20世纪概率论的教父级人物。

纳什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棋类——六角棋，就像国际象棋一样。这也是一种两人零和博弈。但是，国际象棋常以和局告终，纳什却证明了六角棋的先行者总可以取胜。这为他带来不少崇拜者，其中包括米尔诺（1962年菲尔兹奖得主）和库恩。40多年以后，库恩为了让纳什获得诺贝尔奖四处游说。那时，库恩和加拿大人阿尔伯特·塔克共同主持一个博弈论讨论班，不久塔克成了纳什的博士生导师。

3. 博弈论，或纳什均衡定理

纳什在匹兹堡念书时选修过经济学的课程，这促使他在普林斯顿写出了一篇题为“讨价还价问题”的论文，这篇论文让他对博弈论产生了兴趣。虽说交易的概念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即便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两个世纪以后，仍然没有一个经济学理论可以说明讨价还价的各方会怎样相互作用、划分利益。

19世纪后期，英国统计学家埃奇沃思才想到用数学代替传统的历史和哲学方法。纳什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引入了非合作博弈均衡，即“纳什均衡”，它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年以后，纳什自己这样评价：它利用了拓扑学中的一个定理，即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它与空间有关，是那种维数可以无限多的空间。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经济学家用它作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生物学家用它来理解和预测进化论的某些结果。

1932年，从匈牙利移居美国的数学家冯·诺依曼在普林斯顿的一个数学研讨班上，做了一次没有讲稿的报告，题为“关于经济学的几个方程和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的推广”。他从数学的角度指出了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所有商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和尽可能大的量进行生产”。这是一种理想的模型，生产量一旦达到最大的增长率，成本和产量就会自动产生动态平衡。

这正是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因此冯·诺依曼被公认为这门学科的创立者，他同时也是数理经济学的开创者。迄今为止，至少有萨缪尔森等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承认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冯·诺依曼的影响，还有十几位获奖者的工作是对博弈论的直接应用或发展，纳什是其中最早、最具创新性的一位，最近的一位是2014年获奖的法国人梯若尔。

在冯·诺依曼提出博弈论的时候，纳什还只是一个4岁的男孩。他们至少有4个共同点：他们在上大学时都学过化学，他们俩都取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他俩都对经济学和博弈论着迷，他俩也都与普林斯顿大学有缘。对纳什来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有几位让他崇拜的大人物。首先是爱因斯坦，然后是冯·诺依曼，这两位大师都曾与纳什相约见面交谈，这对纳什来说无疑是近水楼台。

在1994年秋天，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的那天下午，普林斯顿大学为纳什举行了一个小型香槟酒会。当初，没有人意识到《非合作博弈》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包括他的导师塔克，就连自信满满的纳什本人也不例外，还有那位激励了作者的冯·诺依曼，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颁发前11年便已过世。

4. 波士顿和纽约：嵌入定理

1951年，23岁的纳什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在纳什看来这所学院最重要的数学家是控制论的先驱诺伯特·维纳，这位神童出身的俄裔犹太人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都有卓越贡献，并著有两部自传《昔日神童》和《我是一个数学家》。当纳什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时，维纳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



1994年12月，纳什与其他诺贝尔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

还有两位波兰犹太移民的后裔，一位是数学系的科恩，他后来证明了康托尔的连续统假设与ZF集合公理系统彼此独立，且因此获得了

1966年的菲尔兹奖。在经济学系，同样是波兰裔犹太人的萨缪尔森发展出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被瑞典皇家学院称赞为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

在波士顿，纳什研究了流形等距嵌入n维欧氏空间问题，得到了两个嵌入定理，指出每个黎曼流形都可以等距嵌入到欧几里得空间。据说当年若不是菲尔兹奖只能给两位获奖人，纳什已经凭借这一成就获奖了。多年以后，一位在俄国出生的法国数学家格罗莫夫指出，“纳什在几何方面的作为远远超出他在经济学方面的作为好几个数量级”。半个世纪以后，纳什终于凭借嵌入定理获得了阿贝尔奖。

1956年，纳什获得了新设立的斯隆研究基金，这使他至少有一年时间不必从事教学工作，去到他喜欢的任何地方。纳什选择了普林斯顿，却在纽约租住公寓，或许是因为纽约的夜生活更吸引他。那里有着狂野和令人兴奋的美丽，尤其是华盛顿广场周围，有一种魔力吸引着对自由、性爱或精神方面有特别需求的人。

可是没过多久，纳什父亲心脏病发作，他的母亲花了好大力气才通知到儿子。当她终于联系上儿子时，丈夫已经过世。纳什立即赶往故乡参加父亲的葬礼，对内心尚未成熟的纳什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幸运的是，纳什适时地找到了一处避难所。那一年他有相当长的时间待在应用数学的天堂——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在那里研究椭圆型偏微分方程问题。

1935年成立的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是以它的主要创建人德国数学家库朗命名，研究所设在一座19世纪的旧建筑的顶楼，起初纳什只是在驱车去普林斯顿的路上，在那里待上一两个小时，后来他渐渐地把更多的时间留在那里。那时，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已有不少与纳什兴趣相投的人，例如拉克斯和莫泽，他们分别是1987年和1995年沃尔夫奖得主，还有来访的瑞典人赫尔曼德，他在1962年获得菲尔兹奖并在1988年获得沃尔夫奖。

果然，纳什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以及应用该理论于几何分析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新成果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超出了他的嵌入定理。可惜第二年暮春，人们发现，有一位名为迪乔吉的意大利人比他早几个月得到了这一结果，此人还是1990年沃尔夫奖得主。这件意外的事故，又一次几乎击垮纳什。

5. 两个世界里的爱

20世纪60年代，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的数学家卡佩尔曾经说过：“所有数学家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由完美的理想形式构成的晶莹剔透的世界，一座冰冷的宫殿；另一个是凡人生活的普通世界，事物因其发展或转瞬即逝，或朦胧不清。数学家们穿梭于这两个世界中，在透明的世界里，他们是成人；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是婴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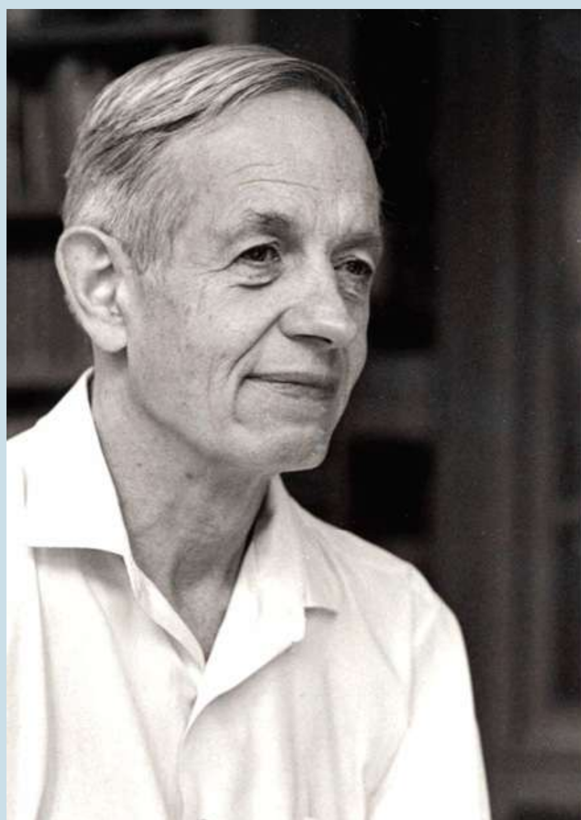


纳什与艾丽西亚的结婚照

这个说法对一流名校的数学家们来说更为准确，在那里男性占据统治地位，校园里不乏竞争和冷酷的私心，人们往往感受不到友情和同情心，但是那里也不时出现令人仰慕的天才。正因为缺乏精神寄托，一旦遇到合适的倾诉对象，便有可能产生情感上的依恋。按照乌兹别克斯坦裔美国记者西尔维娅·娜

萨撰写的《美丽心灵（纳什传）》（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王尔山译，王则柯校），纳什第一次对男性产生爱慕之情便是在1950年的普林斯顿。

那年纳什只有22岁，有一位比他年长5岁的师兄沙普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普利是驻扎在中国成都的美军航空兵士官，因破译了日本人的天气密码获得一枚铜质勋章。战后沙普利回到哈佛继续完成了学士学位，随后来到普林斯顿，与纳什一同参加博弈论讨论班。沙普利出身高贵，才华横溢，又是战斗英雄，且成熟、宽容、耐心，这些都是特别吸引纳什的地方。但这种依恋是单方面的，后来他们成了竞争对手。2012年，沙普利也获得了一枚迟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章。





纳什与电影里纳什的扮演者

除此以外，纳什还与多名男性有过情感纠葛。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纽曼回忆说，纳什总想与男性建立有浪漫色彩的友谊。有一次纽曼

正开车，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纳什试图在他身上撒娇。相比之下，另一位同事对纳什一见倾心而陷入真正的麻烦，很久以后才得以摆脱。在西海岸，纳什还有过两次恋情，对象分别是洛杉矶的一位航空工程师和西雅图的一位昔日校友。

相比之下，在与女性的交往中，纳什似乎更有魅力。1.85米的身高，具有阳刚之气的身躯，酷似英国贵族的容貌，他像天神一样英俊。在波士顿，纳什认识了后来的终身伴侣艾丽西亚·拉迪，一位出生在萨尔瓦多的年轻貌美、气质优雅的女生。从小，艾丽西亚·拉迪的理想便是成为居里夫人。艾丽西亚是当年麻省理工学院物理专业录取的仅有的两位女生之一，纳什是她的微积分老师。

拉迪一家原来是法国贵族，曾是香槟地区的酿酒商，法国大革命期间家人来到美国，落脚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巴吞鲁日。其中一支后裔去了中美洲，先是在危地马拉，继而来到圣萨尔瓦多，经营旅馆业。那正是艾丽西亚的先祖，她本人于1933年生于圣萨尔瓦多，11岁那年，一场反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促使他们全家迁回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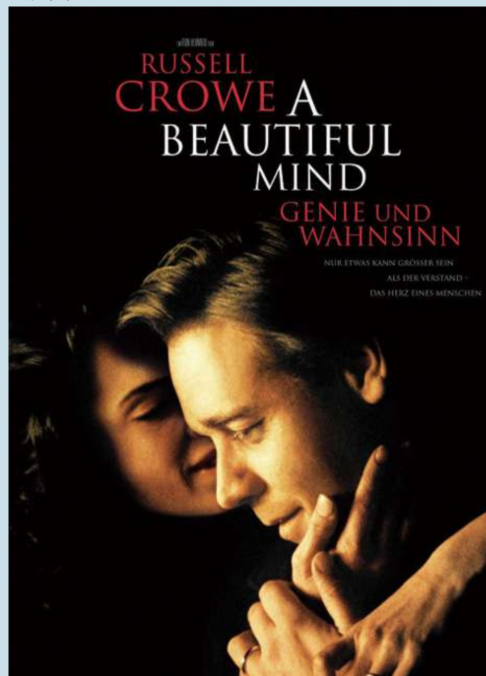
可是，纳什首先遇见并与之坠入情网的却是校医院女护士艾莱娜，她比纳什年长5岁。当时纳什因为静脉曲张，做了一个小手术。艾莱娜妩媚迷人、心地善良，使得之前宁愿跟椅子而不是女孩跳舞的纳什完全被她迷住了，他们很快就恋爱了。艾莱娜和纳什还生过一个私生子。可就在艾莱娜分娩前夕，纳什离开了她，据说这在2002年成了电影《美丽心灵》获奥斯卡奖的障碍之一，有人抨击纳什是因为艾莱娜社会地位低才与她分手。

接下来的故事因电影广为人知，纳什在而立之年又一次做了父亲，几乎同时他得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失踪两周之后，纳什来到同事身边，神秘兮兮地指着手中的《纽约时报》说，外太空的组织正通过这张报纸跟他交流。当时芝加哥大学为纳什准备了终身职位，但数学系主任却收到纳什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即将出任“南极洲皇帝”。

纳什还给驻华盛顿的各国使馆去信，声称自己正在组建世界政府。在1962年夏天，他病情最严重时，纳什给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寄去一张让学校转给毛泽东的明信片，上边仅用法语写了一句哑谜。



艾莱娜与她和纳什的儿子约翰



电影《美丽心灵》剧照

纳什多次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最受伤害的无疑是深爱他的妻子艾丽西亚。尽管纳什在许多人看来孤僻、怪异，不好相处，这也使得他迟迟未能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职位。但在艾丽西亚的眼里，“他非常英俊、聪明”。这有一点儿像英雄崇拜。落花流水春去也，艾丽西亚必须要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她的丈夫变得越来越冷漠、难以捉摸，甚至威胁说要伤害她。终于，他们在1963年分道扬镳了。



1960年纳什和艾丽西亚在巴黎

“穿着蓝色制服醒来”，美国大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诗集《人生研究》里这样写道。这位两度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早已享誉文坛，却在纳什首次住院两周后，来到马萨诸塞的麦克莱恩医院，成了纳什的病友，他被确诊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据当年前往探视的学院同事回忆，洛威尔常与纳什在一起。1977年，洛威尔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的出租车内（与纳什一样）去世。

随后的30多年里，无论数学界还是经济学界，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同行们都对纳什予以关切和帮助，包括美国普林斯顿的塞尔贝格、波士顿的萨缪尔森和法国数学界的格罗滕迪克。难能可贵的是，离婚后艾丽西亚仍保持了非同寻常的爱心和耐心。她觉得要对纳什负责，相信自己可以给予他医生无法给予的东西。1970年，艾丽西亚提出将纳什收留在自己家中，她不希望看到纳什再住进精神病院。

在漫长的岁月里，艾丽西亚温柔的目光对纳什的康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注意到：纳什可以去听讲座了，可以和人讨论学术问题了，可以外出旅行了……在经历幻想的破灭、人生的艰难困苦和一次次失望之后，艾丽西亚那始终如初的少女般的爱恋仍未消失，终



晚年的纳什

于等到了花好月圆的一天。2001年，在离婚38年以后，纳什与艾丽西亚正式复婚。而如今，他们已携手去往天国。

2015年5~8月，杭州莲花街

吴文俊：数学是笨人学的



1975年吴文俊重返巴黎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周易》

2017年5月7日，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北京仙逝，享年98岁。他是20世纪50年代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190位杰出科学家之一（另有社会科学家64位），也是其中最年轻者之一（38岁）。在同时代的科学家中，他有松柏之寿，自然也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他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虽只在20多年前与吴先生有过一次交往，仍记着他的风采和人格魅力。

1. 上海民厚里的童年

1919年5月12日，吴文俊出生在江苏市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青浦位于上海西南角，是江浙沪三地交汇处。那时，青浦隶属苏州市，南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接壤。而吴先生的祖籍正是嘉兴，据说他的爷爷奶奶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到了青浦。朱家角镇地势较高又偏僻，是一个小地方，因此很少有战事波及。也正因为如此，如今镇上古迹保留较多，属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上海四大古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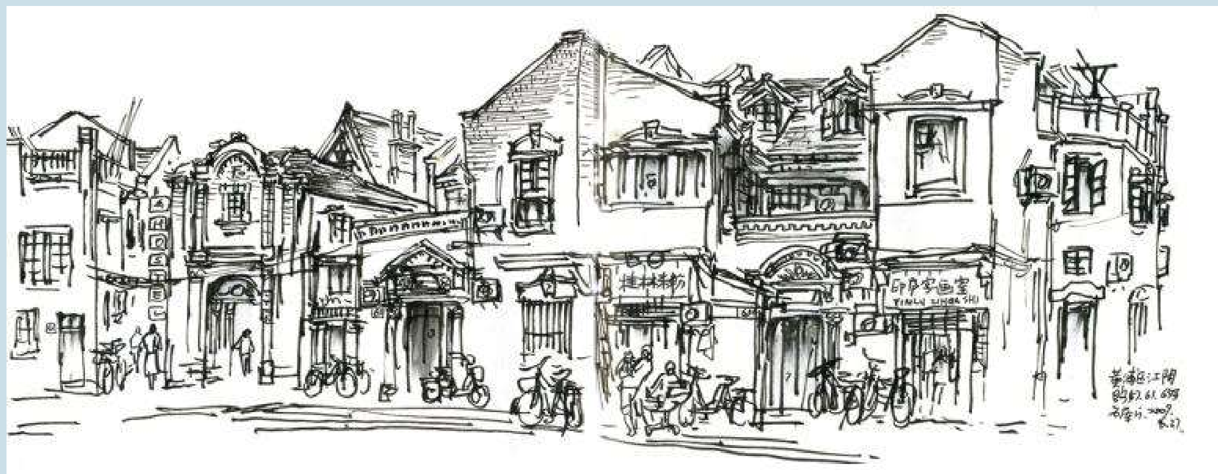
2004年 吴文俊先生偕夫人重游朱家角

小时候的吴文俊，清明经常随家人回嘉兴祭祖。但他似乎记不得具体地点，只记得要坐船，慢慢地“漂”到嘉兴。他的爷爷是一位秀才，却始终没能做上官，后来主要靠在私塾教书养家糊口。到了他父亲的少年时代，吴家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而他母亲的家境要殷实许多，主要从事小手工业。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一个不甚富裕的家里如果有个想读书的男孩，通常会得到家族或乡绅的财力支持。正是在

外祖父家族的资助下，他的父亲得以进入南洋公学，读完了预科，相当于高中毕业。

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吴文俊的父亲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英文基础非常扎实。毕业以后，他一直在上海的一家医学出版社做编译工作。19世纪末的上海便有了外国租界，到了吴文俊父亲开始工作的时候，上海早已成为中国最开放、最繁华的大都市了。当时创办于上海的著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已经诞生，出版了大量好书，尤其是外国经典名著。那时的出版人和报人家庭里通常有许多藏书，吴文俊孩提时代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的藏书，以及他们父子一起泡在书里的时光。

从吴文俊记事起，他家就住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里。民厚里是上海石库门的典型代表。就像四合院是老北京的典型建筑一样，石库门民居是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西合璧的典范。画家徐悲鸿蒋碧薇夫妇、翻译家兼教育家严复，都在民厚里居住过。那儿也是海派文人的聚集地。1922年，戏剧家田汉从日本返回上海，也寓居民厚北里，他在上海大学的学生施蛰存和戴望舒常来探望。民厚南里则住着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老上海的典型建筑石库门

民厚里附近的静安寺是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铺设开通的有轨电车始发站，可以沿南京路直达外滩，交通十分便捷，因此吸引租客。张爱玲也住附近，她曾坦承："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遗憾的是，1996年的上海旧城改造，静安寺附近的老房子都被拆掉了，现在留下的有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绿房子"等老建筑。

吴文俊在家中是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也可能是受旧社会观念的影响，两个妹妹都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他的弟弟文桀聪明可爱，但不幸幼时从楼梯上摔下，起初好像没事，后来病情加重，拖延了几年后还是夭折了。吴文俊成了独子，得到父母的加倍关爱。这让我想到印度数学天才拉曼纽扬，他在吴文俊出生的第二年去世，年仅32岁。拉曼纽扬也是长子，他有三个弟弟妹妹，都很小就夭折了，结果他也成了受宠的独子。

4岁那年，吴文俊上了小学，就在家附近，接送很方便，那时上海已不流行私塾了。由于弟弟的早逝，吴文俊的父母对他的照顾格外小心。他的母亲只要听见里弄里小孩子们玩闹的声音略大一点儿，就会把他喊回家，生怕他出差错。不过踢毽子除外，因为这项运动没有危险，所以家人允许他玩，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爱玩这个游戏。这样一来，吴文俊在家中与书相伴的时间就多了。他上的小学叫文蔚，我查阅过，"文蔚"一词出自《周易》，"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君子像小豹子一样慢慢地成长，长出好看的花纹，拥有高尚的品格。

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吴文俊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后来在法国期间，他又爱上了看电影，加之"放羊式"的家教（他母亲的"管制"其实是另一种溺爱），他的性格比较豁达。童年时的吴文俊爱看大人的书，尤其是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小说，还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但也因此反感"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他一直记得自己小时候似乎读到梁启超说过的一句话：英雄只在

落后的国家才有。他由此联想到德国的“数学王子”高斯，高斯出道时，德国数学还比较落后，后来德国出了许多数学家，都再也达不到高斯的数学造诣了。

2.数学零分的中学生

10岁那年，吴文俊从文蔚小学毕业，但父母觉得他还年幼，又让他念了一年书。1930年，11岁的吴文俊上初中了。第一年是在离家较近的私立铁华中学，学费很贵，教学质量却很差，校长为了节约开支，常常在实习期一结束就把老师给打发走了。后来吴文俊生了一场类似于伤寒的大病，病愈后他转学去了另一所私立学校，名为民智中学，在今天上海的威海路。初二时，吴文俊还学了文言文，主要是六朝时期流行的骈文，以初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为代表，这篇文章沿用至今，尤以“秋水共长天一色”流传后世。我还记得，南宋数学家秦九韶也喜爱这种文体。

从初三开始，国文课从文言文改教白话文，“五四运动”的影响日渐突出。那时上海已有不少新刊物，例如1925年创办的《生活周刊》，吴文俊对主编邹韬奋的文章印象尤为深刻，他的国文大有长进，语文老师也经常表扬他的作文，认为那是他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以及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所致。少年吴文俊已懂得查找书评，了解著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人生观，还写过分析性的文章。晚年吴文俊认为胡适提倡白话文了不起，也赞赏他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军野蛮入侵上海。为了躲避轰炸，吴文俊与家人回到乡下，躲了好几个月。可是，学校并未停课，等到他们回到城里，吴文俊的功课被耽误了一大截。语文还好说，数学他根本听不懂了，因此他干脆不听，在下面看小说，结果，

吴文俊的期末考试数学成绩得了零分。这次考试对少年吴文俊是有警示意义的。暑假期间，学校为那些因为躲避轰炸而耽误学习的同学补课。还采用“吊黑板”的形式，就是在黑板上出题，让学生上来做，老师当场评判。这种方法果然奏效，很快，吴文俊掌握了几何的内容和方法。当时的课程设置很不一般。在初中，吴文俊就学习过德语和经济学。

1933年秋天，吴文俊上了徐家汇的正始中学，这是一所私立高中，出资人是上海滩的大老板杜月笙，因此学费比较便宜。有一次杜老板过生日，同学们列队从徐家汇走到外滩去祝寿。该校校长是陈群，早年曾留学日本，获文学士和法学士。在当校长之前，他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南京警察厅厅长，后来又在汪伪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成了十足的汉奸。但吴文俊认为作为校长，当年陈群是很称职的，课程设置规范，聘请的老师学有所长，还从交通大学请来一批兼职老师。

如果说初中时的吴文俊比较随性，那么高中是他真正用功学习的三年，特别是数学和英文。在这个时期，学习对他来说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尤其钟爱几何，除了由于初中时的那次暑假补课给他的引导以外，还因为高中时一位数学老师。这位老师的福建口音，让其他学生望而却步，但吴文俊却并非如此，得到了老师积累多年的几何题，并从中受益匪浅。同时，吴文俊也在高中遇到了一位很认真的英语老师，这位老师还会打排球。加上父亲给他的启蒙教育和指点，吴文俊在高中时期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不仅能读原文，而且会写作文，还阅读了不少原版英文小说，包括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至于听和说英语，则要等到他的大学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吴文俊念高中时还喜欢上了看话剧，这一爱好贯穿了他的整个大学时期，他自己说，在抗战期间，他喜欢话剧。正如他所敬仰的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少年时代喜欢各种游戏和跳舞。吴文俊

那时最喜欢的演员是石挥，他演的《雷雨》中的奴才鲁贵让作者曹禺为之叹服。其实，石挥只比吴文俊大4岁，因此这有点儿像如今追星的年轻人。同时，吴文俊也记得他看过《武则天》、《秋海棠》和《大马戏团》等剧。不同的是，吴文俊还喜欢看剧本，他尤其喜欢剧作家洪深的作品，并对他的“拟真”理论颇为欣赏。


刚入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吴文俊

除了数学和英文，高中时吴文俊的物理成绩也不错，有一次还考了满分，他特别喜欢力学，虽然他的动手能力比较弱。在报考大学前夕，吴文俊的物理老师认为吴文俊之所以物理学得好，是因为数学功底好。事实上，物理学与几何学是有关联的。因此学校指定他报考交通大学数学系，且答应如果考上每年给100元的奖学金。那时上海交通大学每学期的学费需要30多元，这笔奖学金对吴文俊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换句话说，当初念数学系并非他的本意。最后，他以交通大学理学院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3.孤岛上的大学生涯

1921年，交通大学正式由南洋公学改名，晚清时期人们习惯把辽宁、河北、山东沿海三省称为“北洋”，把江苏和江苏以南的沿海地区称为“南洋”。至于交通一词，来源于《易经》“天地交而万物

通”，校庆日4月8日也有四通八达之意。另一方面，交通大学的主管部门是当时政府的交通部，那时候交通部的职能除了“有形之交通”，还有“无形之交通”，无形的交通包括通商、外交、邮政、电信、旅游，等等，故而交通大学也是综合性大学。

说到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胡明复就毕业于该校。1910年，他与胡适、赵元任等作为庚子赔款第二届留美生，一同进入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学习，学成回国以后，胡明复去了大哥胡敦复主持的上海大同大学，创办并主持数学系。不幸的是，1927年，他在故乡无锡溺水而亡，年仅36岁。否则，吴文俊应该会认识他。

在吴先生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曾多次提及微积分老师胡敦复。1930年胡敦复卸任大同大学校长，改任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1935年，胡敦复联合北京的熊庆来、冯祖荀，重庆的何鲁，杭州的陈建功、苏步青等，成立了中国数学会，并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而胡家老三胡刚复则是物理学家，庚子赔款首届留美生，于191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西迁时期，他是浙江大学的理学院院长。当年，竺可桢动员他出来当院长时称，假如胡刚复不出来做院长，他也不会接受浙大校长的任命。

交通大学的理学院开设于1930年，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学科。数学系规模最小，吴文俊是第4届学生，同学里有一位从宁波来的男生赵孟养，赵孟养成了他的终生好友，吴文俊人生中的几次重大机遇都得益于这位赵同学的无私相助。

吴文俊上大一时交通大学还在徐家汇办学，即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本部。他大二时，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在激战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后，上海于1937年11月沦陷。江浙沪的大部分大学都开始向内地转移了，交通大学也在这段时间临时搬往租界，在日军攻陷租界后，交通大学才迁往重庆。吴家也搬到了租界。那时上海有日租界、



青年吴文俊

法租界和英租界，后两者成了上海日占时期的“孤岛”。交大在法租界，吴文俊的大二下学期和三、四年级，都是在法租界度过的。

说到法租界和英租界，我知道一个掌故，便是如今中国的许多城市街道上都有的“法国梧桐”并非来自法国，事实上梧桐是亚洲的树木，多产于中国。而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和英租界栽的树是悬铃木，这是世界驰名的行道树，有着“行道树之王”的美誉。可是两个租界品种略有不同，英租界是二球悬铃木，法租界是三球悬铃木。不知是谁开的头，上海人就分别称它们为“英国梧桐”和“法国梧桐”。可能因为英租界的地盘大小和悬铃木的栽种范围不及法租界，英国梧桐渐渐被遗忘了，而法国梧桐的说法一直沿用至今，并在南北各地传播开来。

“孤岛”的教学环境相对艰苦、生活不安定，师资也不如以前，吴文俊还曾打算换系。但是，大三开始数学系单独开课以后，他遇到一位教实变函数论的老师武崇林，这门课为他开启了现代数学的大门。武老师循循善诱，还在自己家里给他开小灶，并借给他一本印度出版的英文著作《代数几何》。他研读了集合论、点集拓扑和代数拓扑的经典著作，有一些是德文原版。

那时候数学界流传着一句话，“打起你的背包，去到哥廷根”。这里的哥廷根是指德国哥廷根大学。当时，在这所高斯和黎曼的母

校，新一代的数学家克莱因和希尔伯特已经建立起崭新的哥廷根学派。吴文俊有一个榜样，那就是浙江余姚人朱公谨（1902—1962），他小学毕业后进入了南洋中学，后来考取清华大学，再后来留学哥廷根，他的博士生导师是希尔伯特的得意弟子库朗。朱先生回国后执教于交通大学等学校，写过不少介绍现代数学的科普文章，吴文俊每篇必读。

吴文俊的学习方法分成“读学懂”三步。所谓“读”是阅读课本本身，了解概念的引进，给出定理的证明，“学”是指合上书自己能推导课本里的定理，而“懂”是指理清所有概念和定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用力学方法证明帕斯卡尔定理”，多年以后，吴老写过一本书名为《力学在几何中的一些应用》，这本书便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延展。据说，华罗庚曾赞叹，“这本书比10篇论文都好”。此书后来与华罗庚、段学复、姜伯驹等数学家的科普著作组成“数学小丛书”，并荣获2010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到吴文俊大学毕业时，他已经有成为数学家的志向和自信心了。

4. 动荡，知遇与上路

1940年，21岁的吴文俊大学毕业了。接下来的六七年时间，本可以用来继续深造或做研究工作，却不幸遇到黑暗的战争岁月。因此，他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后来又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做代课教师。吴家在法租界只有一个大房间，因为有两个妹妹，文俊就睡在小阁楼上。那时，法国在欧洲已经向德国投降，因此比起英租界来，吴文俊所住的法租界相对安稳一些。

吴文俊任教的第一所中学叫育英中学，他教初一代数，每周上20多节课，因为课时不足，吴文俊还要兼教务。教务的工作更琐碎复

杂。至于教学，吴老一直觉得自己当年没有教好“负负得正”这一基本概念，为此到了晚年仍然感到惭愧。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消息传来，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过了许久，教务处长长叹一声“覆巢之下”。果然不久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各租界，育英中学解散，吴文俊失业了。



吴文俊在之江大学任教住过的白房子 作者摄

在家待业半年以后，吴文俊又找到一份工作，即在培真学校当老师。他还是教数学，并兼职做教务工作。在那些年，做数学研究自然是谈不上，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家里挤，还要早睡，因为第二天要早起上班。不过在学校里，同事们相处还比较愉快，大家无话不说。在教员中，吴文俊是比较沉默寡言的。可是有一次，老师们看见他捧着一本德文书，便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为德日同属轴心国。直到有一天，他帮助一位同事解出了一道数学难题，大家才知道吴文俊是潜心钻研学问的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这一年的秋天，吴文俊开始在杭州的之江大学做代课老师。之江大学是民国时期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1952年解散。这是吴文俊第一次在大学任职，他在钱塘江畔，六和塔旁（如今的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度过了4个多月的时光。他当年的宿舍是现在被称为白房子的那幢可以看见钱塘江的楼房，而红房子则是外国教授的住房，曾经的主人有之江大学第二任校长司徒华林，他是民国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弟弟。

当时之江大学的校长叫李培恩，是杭州本地人，曾在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留学，擅长于用英文讲授经济学。我估计之江大学的数学

不是太强，有一位吴文俊的同龄人张理京曾就读于之江大学，他后来参与翻译了不少数学名著，包括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

虽说孕育了“陈苏学派”的浙江大学那时还没有从贵州迁回杭州。赵孟养通过自己的亲戚把吴文俊大学毕业时所写的论文递给了几何学权威苏步青。只是多年以后，苏步青才给吴文俊回应，“真是篇好文章”，那时吴文俊早已从巴黎载誉归来。赵孟养还设法把他介绍给朱公谨和周炜良两位数学家，他们已分别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看过吴文俊的一篇文章后，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代数几何学家周炜良评论说“杀鸡焉用牛刀”。这句评语让吴文俊明白，数学研究过程中方向性问题的重要性。

1945年岁末，交通大学总体还留在重庆，但在上海已办起了临时大学。赵孟养慷慨地把自己在上海临时大学取得的助教职位让给吴文俊。翌年春天，当年的教育部招考赴法留学生，也是赵孟养第一时间把消息告知老同学。更重要的是，赵孟养还介绍吴文俊认识了陈省身，后来吴文俊成了陈省身的学生。其实，赵孟养并不认识陈省身，就像他不认识周炜良一样，而是凭着自己的交友才能和热情，委托他人代为引荐好友。这类会面有些类似于诗人之间的会面，一个青年诗人在拜会一个著名诗人时常用这一方式。

当时陈省身只有35岁，却已经出名了，他在美国数学圣地普林斯顿做出了不起的成就，特别是给出“高斯－博内公式”的内蕴证明，同时引入陈省身示性类，使得微分几何的研究进入了新时代。抗战胜利后陈省身回到祖国，在恩师姜立达的推荐下，陈省身在上海筹建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陈省身住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条小弄堂，吴文俊第一次见到他时就鼓起勇气询问数学研究所是否要人？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事我会记在心上”。果然不久后，吴文俊进了数学研究所，从此吴文俊走上了数学研究的康庄大道。

在筹备数学研究所之初，陈省身便给各大学的数学系发函，希望这些大学生能推荐最近三年的优秀毕业生。以这种方式推荐来数学所的数学家有10多位，尤其以浙江大学居多，此外还有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大同大学等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数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在数学研究所，除了听陈省身讲代数拓扑外，其余时间比较自由，吴文俊的办公桌就在图书馆，陈省身安排他兼管图书。他因此阅读了不少数学书。有一天，陈先生来到图书馆，跟吴文俊说，你的书看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还债”了。

原来，陈省身说的“还债”是指写论文。吴文俊被“逼”出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对称积在欧氏空间中的嵌入问题，这篇文章被陈省身推荐到巴黎的《法国科学院通报》上发表了。尤为重要的是，陈省身把吴文俊的研究方向从他擅长的点集拓扑引导到更有发展空间的代数拓扑上去了。陈省身敏锐地意识到代数拓扑在现代数学中的位置，以及它将对其他数学分支产生的深刻影响，相信它会成为数学的主流学科。事实上，陈省身本人后来参与开创了大范围或整体微分几何。其关键性的工具正是代数拓扑里的纤维丛和示性类。

示性类理论里有一个最基本的惠特尼乘积公式，一直缺少一个严格的证明，以至于惠特尼本人计划写一本专著来解释清楚。1947年春天，陈省身北上去清华大学讲学，他带着两个年轻人吴文俊和曹锡华一起进京。曹锡华原来就读于浙江大学，后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教于浙大，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师大担任数学系主任。在陈省身讲学期间，吴文俊利用在清华大学的闲暇时间，证明了惠特尼公式，发表在美国最主要的数学杂志《数学年刊》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重要成就，他终于上路了。

5. 法兰西的灿烂岁月

吴文俊到数学研究所以后，差点儿把前一年春天参加过的留法选拔考试一事给忘了。没想到第二年发榜，他考中数学组第一名，当年一共有4人考中，其他三人是严志达、田方增和余家荣。严志达和田方增来自西南联大，而余家荣来自南京大学。陈省身给吴文俊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他去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师从亨利・嘉当，其父亲埃利・嘉当是陈省身的老师。

在南京参加教育部的培训之后，吴文俊从上海乘船出发了。航线与其他留法同学并不完全一样，他没有在马赛港上岸，而是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到了利物浦，随后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的加来。从那里他们坐火车去巴黎，再从巴黎转到斯特拉斯堡。有趣的是，当时的法国文化参赞看到吴文俊手上有嘉当先生的邀请函，便不管专业是否对口，把其余三位也都派往斯特拉斯堡大学。其中只有严志达坚持了下来，两年后他与吴文俊同时获得国家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后来也当上了院士。而田方增和余家荣后来转学到巴黎大学，回国后分别任职于中科院数学所和武汉大学。

虽说吴文俊的英文和德文都很好，但他曾说自己的法语不太好。他认为自己擅长的理性思维不适合浪漫的法语，我认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5年的中学教师生涯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到法国时他已经28岁了。吴文俊更喜欢德语的严谨和刻板，因为那也是他的个性。不巧的是，当吴文俊来到斯特拉斯堡时，亨利・嘉当受聘去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把吴文俊托付给父亲的学生埃瑞斯曼。没想到阴差阳错，吴文俊因祸得福跟对了导师。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与嘉当之间，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思维方式都存在差异，在短时间内难以磨合。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期间，吴文俊继续研究拓扑学中的示性类问题。按照当时法国大学的习惯，导师一般不先给学生出题，学生也很少见到导师而是进行自我摸索，在取得一些成果后再向导师汇报。之后，导师才会给学生深入的意见，甚或博士论文的题目或方向。当时，流形上是否存在复结构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而复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是近似复结构的存在。通过示性类，吴文俊证明了凡维数是4的倍数的流形均无近复结构，因此也没有复结构。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拓扑学界引起的震动不小，以至于当时的拓扑学权威霍普夫深表怀疑，他特意从苏黎世跑到斯特拉斯堡和吴文俊面谈。结果霍普夫被吴文俊折服了，转而邀请吴文俊去他所在的苏黎世理工大学访问。

1949年年初，埃瑞斯曼认为吴文俊的成果已够博士论文了。于是，便让他着手整理。那年7月，吴文俊完成了论文《论球丛空间结构的示性类》并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由于他埋头于研究拓扑学，在离开斯特拉斯堡时还未逛过这座城市。多年以后，他有机会重游故地，想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可惜仍没有找到时间。我的诗译者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因此我曾特意来过，还在该城的市立图书馆做过一场朗诵会，那次旅行让我对莱茵河畔的这座名城，尤其是中心广场四周的景色、夜晚河巷的灯火印象深刻。这里是欧洲议会总部的所在地，而斯特拉斯堡大学也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母校。

1949年秋天，吴文俊来到巴黎，跟亨利·嘉当学习、工作了两年。他在巴黎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了拓扑学界名人。这倒并不完全是因为嘉当先生的培养，这位布尔巴基学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学术水平自然很高，但布尔巴基学派的那一套吴文俊始终不太能接受。第一次见面，嘉当拿出自己的一篇论文讲，结果吴文俊听得稀里糊涂，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嘉当讲不下去，摇摇头："你对抽象的推理这一套不清楚，听不进去。"吴文俊猜测因为自己是陈省身推荐的，才没有被辞退。

虽然和嘉当没有深入的交流和合作，但这不妨碍吴文俊在巴黎做出惊人的成绩。他一边参加嘉当的讨论班，一边独立地做研究。他住的旅店在第五区，即拉丁区。许多学校、研究所都在那儿，包括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庞加莱研究所。他的房间在半地下，光线很差，连白天都很暗。幸亏附近有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叫咖啡麻油，那成了吴文俊的工作室。咖啡馆对面是著名的卢森堡公园，但吴文俊没有去逛过。与一些法国同行一样，他上午休息，下午参加学术活动，夜里就到那家咖啡馆工作，在一个角落里思考数学问题，通常不到下半夜是不会回旅店的。



1948年吴文俊（右一）与同胞数学家在斯特拉斯堡

翌年春天，吴文俊已经硕果累累。他与嘉当的另外两个学生塞尔和托姆，以及那位瑞士人霍普夫的学生A. 保莱尔，都在拓扑界小有名气。他们4个人的工作引起了“拓扑地震”。其中塞尔和托姆分别于1954年和1958年获得菲尔兹奖，塞尔获奖时年仅27岁，迄今仍保持着最年轻获奖者的纪录，他还是21世纪设立的阿贝尔数学奖的首位得主。晚年吴先生依然自信，回忆起那场拓扑地震中，他说自己是4个人中主要的那个。同时有一些人认为，假如吴文俊没那么早回国，他必定也能得菲尔兹奖。

那么，吴文俊在巴黎做了什么工作呢？

拓扑学主要研究几何图形连续变形时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即拓扑变换下的不变量，它只考虑物体之间的位置而非距离和大小。所谓示性类，是指刻画流形和纤维丛的基本不变量，它可以不唯一，著名的示性类有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庞特里亚金示性类、陈省身示性类。吴文俊命名了陈类。他的工作精髓在于：其一，定义了吴示性

类，用吴示性类表示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计算非常容易，被称为吴（第一）公式；其二，证明了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被称为吴（第二）公式。对此，嘉当给予高度评价，说吴的工作像是变魔术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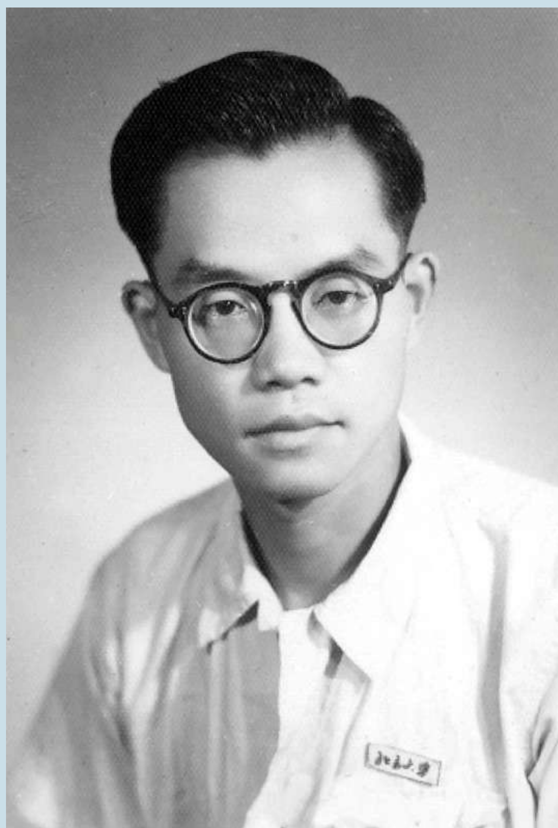
6. 回国，荣誉与徘徊

1951年夏天，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吴文俊为教授。可是，当聘书寄到巴黎时，他已经在回国的轮船上了，之前他已经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做过研究。那时中国已经换了人间。我相信，吴文俊回国的原因应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自小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是主要的。那年他已经32岁，尚未婚娶，至于在法国的4年中有没有谈过女朋友，他在自己的口述自传里并没有交代。依照吴先生的个性，如果有的话他应该会说的。当年陈省身先生学成回国两年后，在西南联大与通信多年的郑士宁结为伉俪。

回国的轮船是从马赛港出发，穿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吴文俊到达了中国香港。可是他还没下船就被边防警察招呼上了另一艘小汽船，被直接送到广州，从那里再坐火车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上海。吴文俊到北京后的第一站是北京大学，他接受了中国的拓扑学元老、北大数学系主任江泽涵在访问斯特拉斯堡时给他的邀约。吴文俊开始在北大教微分几何，一年以后的1952年是中国大学最动荡的一年。时势的变化使吴文俊离开北大，去了设在清华园一幢两层小楼里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长是华罗庚。

那时，数学所只有十几号人，包括远在江南的陈建功、苏步青。根据王元先生所著《华罗庚》一书，那时关肇直还是副研究员，冯康还是助理研究员，而陆启铿、王光寅、丁夏畦、王元、龚升和胡和生

等人还只是研究实习员。吴文俊对华罗庚非常佩服，这种佩服甚至超过了他对恩师陈省身的佩服，他认为华罗庚能在复杂的环境里做好各项工作十分不易，而且华罗庚很早就领略到中国古代数学的优点，这也是吴文俊后来工作的出发点。



佩戴北大校徽的吴文俊

1953年春天，34岁的吴文俊到上海出差，经亲戚介绍，认识了在电信部门工作的陈丕和。结果两人一见钟情，几天后（也有一说是半个月后）就结婚了，可谓是“闪婚”的先驱。年底陈丕和被调至北京，起初在电信局，一年后换到数学所图书馆担任图书馆员，业余时间利用她的打字技术，帮助吴文俊打印外文论文和专著。同时，接连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并承担了全部家务，吴先生连灯泡也不用换。从此以后，吴文俊过上舒坦安逸的生活，并专注自己的数学研究，那应归功于这位上海女性的才德和修养。

1956年冬天，数学所搬到动物园附近的西苑大旅社，两年后又迁至中关村。那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山东进京查阅文献资料时来过数次的那幢五层的楼房，如今早已经拆迁，原来的地方竖起了一幢高楼，即融科大厦。但我无法确定，我第一次到数学所图书馆时，吴夫人是否已经退休？1957年以前，数学研究者们尚有一段相对安静的时光，吴文俊继续着拓扑学研究。但由于那时只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些国家的拓扑学研究相对落后，而西欧和美国的研究突飞猛进，因此他也感到过迷惘和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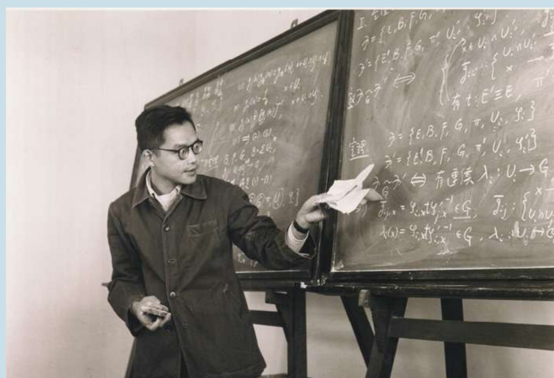
吴文俊结婚照

为了解决“怎样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吴文俊做了一次对拓扑学的全面回顾和分析，并在所里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我猜那时他也许是想起了法国数学家、拓扑学奠基人庞加莱的名言：“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未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在拓扑学这门“难学”里，不变量是基本研究对象，也可谓“难中之难”。于是，人们降低要求，研究所谓的同伦不变量，也就是把1－1对应换成n－1对应。那是当时拓扑学界的潮流，而吴文俊却反潮流，研究非同伦性组合的不变量，包括嵌入问题，建立起了示嵌类理论，成就斐然。

1957年年初，首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公布了，这是今天国家三大奖的前身，共34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有三项，它们分别是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复变函数论”，吴文俊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和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吴的工作被国际拓扑学界公认，获一等奖无异议；而钱伟长、苏步青两位前辈只获得二、三等奖。值得一提的是，吴文俊的参选材料是8篇论文，这恰好是今天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论文数量。

那时候，华罗庚和钱学森已经大名鼎鼎，而吴文俊在国内数学界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获奖的同年，吴文俊便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此前后，他多次随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民主德国、波兰。1957年12月，吴文俊结束了在民主德国的讲学后，回到了阔别6年的巴黎，他的导师埃瑞斯曼邀请他去巴黎大学讲学，接着他应邀去里尔、布列塔尼、波尔多、格勒诺布尔等地，还回到了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

吴文俊在巴黎见到了老朋友安德烈·韦伊，这位数学全才也是布尔巴基学派的骨干，妹妹西蒙娜·韦伊是著名哲学家。早年，韦伊帮助陈省身去了普林斯顿，晚年为《陈省身论文选集》作序。在韦伊自己的数论史著作扉页上，印着陈先生的书法“老马识途”。“二战”期间因为被当成了间谍，韦伊坐过监狱甚至差点儿送命。韦伊常约吴文俊去小饭店，当时他的兴趣已转向数论史。或许，吴先生后来对数学史的兴趣也与他有关。



1956年吴文俊在数学所作报告

吴文俊的访问时长从原定的两个月延长到半年，他还写信申请再延长两个月，那样他就可以写成一部专著在法国出版，正好195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爱丁堡召开，组委会邀请他做45分钟报告（最终未能成行），他是新中国继华罗庚（1954）之后第二个被邀请的数学家。同时，吴文俊也申请让夫人到巴黎照顾他的生活。这封信除了吴先生以外，还有12位法国数学家的联名签署。可是，中科院国际合作局没有批准这一请求，并催促他尽快回国。同时，数学所也以所长华罗庚的名义给塞尔和埃瑞斯曼发电报，希望他们敦促吴文俊回国。

最后还是祖国和家庭的吸引力更大。吴文俊回到了祖国。

7.“赛马”与“吴龙”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才有了翌年年初首届科学奖的颁发。

华罗庚去做优选法，吴文俊也开始研究起运筹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吴文俊把目标确定为“对策论”，即博弈论，这是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开创的学科。冯·诺依曼研究的是合作博弈，而纳什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的是非合作博弈。吴文俊感兴趣的是后者，在他发表在《数学学报》上的文章里，第一次对“田忌赛马”的故事给予博弈论的解释，将其归纳为“两人有限零和博弈”。

到了1961年，时局又有了变化，中央提出了“科研十四条”，基础研究又受到了重视。那年秋天，中国数学会在颐和园的龙王庙召开会议，分别研讨数论、拓扑学和函数论三门学科。那时，解析数论因为有陈景润、王元和潘承洞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正如火如荼，而拓扑学却是大大落后于人了，即便吴文俊开创的示嵌类也已经落后了。吴文俊果断决定，把目标对准奇点理论，并在两三年内到达了前沿，完成了两篇高质量的论文，这两篇论文都到了1975年才发表。



1956年吴文俊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

在1966年数学所的一次会议上，坐在会场后面角落里的吴文俊，随手翻看架子上的书刊时，无意中发现一篇讲印刷电路的文章。印刷电路即集成电路，安在芯片上。在没有计算机的当年，集成电路的布线并非易事。吴文俊发现，用他的示嵌类理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布线问题”。这件事又一次让他出了名，也给他提供了进一步的安全保障。

就这样，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吴文俊更换了四五个研究方向，犹如赛马场的马匹，这样很难做出特别重要的成就。幸好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担任校长，科学家们纷纷做了园丁。华罗庚作为数学系主任，提出

了“一条龙”教学法，即由一位教授领衔主讲带一位学生，三条龙分别由他本人、关肇直和吴文俊领衔，他们教的班分别称为华龙、关龙和吴龙。关于微积分这门课，华罗庚和关肇直就各自编写了一本教材，并且都正式出版了。

吴先生在科大除了教授微积分以外，还教过微分几何和代数几何，共7个学期。据“吴龙”班的学生、著名数学史家李文林回忆，吴先生讲课比较严谨，他一般首先在黑板上写上讲课要点，包括主要内容、定理、概念和思想，然后开始推导、演绎。他的板书也是条理清晰的，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然后自己擦掉重来。而华先生讲课的特点是比较活，板书也比较松散，经常是东边写一块西边写一块，他还喜欢讲一些与课本无关的内容，比如“从厚到薄，从薄到厚”。


1978年吴文俊全家福

“吴龙”班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是李邦河，他是温州乐清人。后来，他继承了吴先生的衣钵，成为他在拓扑学上的传人。在微分拓扑领域，李邦河发展了流形到流形的浸入理论，把浸入理论中的一个奠基性定理从最简单的流形（欧氏空间）推广到任意流形。令人惋惜的是，吴文俊的另一位学生王启明后来不幸在美国因车祸去世。那是在1989年，车主是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拐弯时失了手，丘先生也受了伤。王启明曾在吴先生的课上指出一处错误，并由此指出吴文俊讲课所依据的是德文书。吴老认为，如果假以时日，王启明成为中国数学界领袖不成问题。

等到“四清”运动开始后，数学所第一支“四清”工作队去了吉林，第二支由关肇直带队去了安徽，吴文俊也参加了。1965年7月，他们一行抵达合肥以西六安专区的苏家埠镇，那里傍依着干涸的淠河。

在那里，他能做的事不多，吴文俊帮助生产队制作和填写报表，这些事情他从前当中学代课教师兼教务时干过。那段时间他似乎没做什么农活儿，吃饭就在老乡家里。有空他就去镇上淘旧小说，不光自己看，也借给别人看。不料有一次走在河滩上他被人喊住，当地农民盯了他很久，还以为是“空降特务”。

8. 研究中国古代数学

后来，数学所副所长关肇直开始号召大家研究中国数学史。原本吴文俊对古代数学并无多大了解，在关先生的鼓动下，也借阅了几本书籍，其中有《九章算术》，之后他还读了李俨、钱宝琮的书，特别是李俨的《中国算学史》。他后来在旧书店里淘到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这本书也对他有很大影响。还有两位数学史家，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和西北大学的李继闵对吴先生研究数学史的帮助也很大，尤其是李继闵对《九章算术》的系列解读和阐释，让吴文俊真正领会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妙处。

李继闵（1938—1993）祖籍四川新津，父亲做过川军连长。他本人出生在江西九江，青少年时身强力壮，喜欢游泳，曾横渡长江。在成都念中学时他是学生会主席，毕业时却因家庭出身问题无法被名校录取。1958年，他考入西北大学数学系，本科期间便在教授刘书琴指导下，写出函数论的研究论文，经华罗庚推荐，发表在《数学学报》和《中国科学》上，成为西北地区在《中国科学》发表数学论文第一人。可是，大学毕业时，李继闵被分配去了西安夜大。

不久后，夜大解散，李继闵被下放到陕南地区勉县插队落户。1972年，经朋友介绍，他怀里揣着发表了的论文去见主管文教的西安市副市长，被调回西安师范学校任教。1979年，在他的恩师刘书琴和

方毅副总理的关怀下，他终于回到母校西北大学。返回西安后，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数学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78年春夏之交，吴先生偕李文林等一行人去西安，进行为时近一个月的西北之旅，与李继闵相处多日，回北京后还手绘了一幅旅行图。吴老评价李继闵是“继李俨、钱宝琮和严敦杰三老之后最有贡献者之一”，在吴文俊的支持和推荐下，几年后西北大学拥有了国内第一个数学史博士点，但1993年李继闵却不幸英年早逝。2002年，李继闵的学生曲安京应邀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了45分钟的报告。

吴文俊在数学史研究上的第一次突破是复原日高公式的证明，该公式是三国时期的两大数学家之一——吴国赵爽（另一个是魏国刘徽）在注释《周髀算经》时记录下来的，但是残缺不全。大意是说在平地上竖立两根有刻度的杆子，高度和距离已知，然后量它们在地上的影子，就可以测出太阳的高度。如果是现在，用正切函数、画平行线等方法就可以做到，但那要用到现代数学的概念，而日高公式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里，吴文俊复原了古代的证明，并于1975年以“顾今用”的笔名在《数学学报》上发表相关文章。

之后，吴文俊又复原了刘徽《海岛算经》里“岛高”问题的证明。同时，他指出了数学史研究中的两条基本原理，其一是所有结论必须从幸存下来且流传至今的原始文献得出，其二是所有结论应按照古人当时的知识、辅助工具水平和惯用的思维去推理。继《九章算术》之后，中国古代数学的另一高峰是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他的大衍求一术（中国剩余定理）和增乘开方术（秦九韶算法）是中国数学的重要创造。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在于构造性和可机械化，他用小计算器即可按照秦九韶的方法求出高次代数方程数值解，而大衍求一术的算法十分有效，远超西方人的方法，且计算的条件较为宽松。

吴文俊认为，代数是中国古代数学中最为发达的部分，《九章算术》是一部算法大全，有着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学、最古老的方程组和矩阵。《九章算术》中解方程的消元法比高斯的发现更早，且书中已经有了正负数的概念，甚至有了实数理论。他还认为我们的祖先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数据与数据之间必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现代是通过方程式呈现的。他还认为，在求最大公约数时，古代中国的“更相减损术”很漂亮，比西方人的因式分解方法要强。



1988年 李继闵与弟子曲安京在汉中望江楼

我认为，吴先生所指的中国古代数学是指17世纪以前的数学研究成果。因为自从微积分诞生以后，中国数学在计算方面已明显落后于西方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吴先生的经历中看出，吴先生正是从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探究中获得启示，并推动了他的数学机械化事业。也因为如此，吴文俊觉得当年回国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这让我想起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化学家傅鹰先生（1902—1979）说过的话：“一门科学的历史是那门科学里最宝贵的一部分，因为科学只能给我们知识，而历史却给我们智慧。”

吴文俊还依据钱宝琮的观点，勾画出一幅“数学发展简图”，他认为目前西方数学的一些成果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他认为祖先最伟大的数学发明是位值制，我们在商朝便有了正式的十进制了，就像汉字是从商朝的甲骨文开始定型。在吴先生的复原证明论文发表以后，有一天李文林在数学所走廊碰到他，他们有了如下对话，李文

林说：我看到您的文章了，很受启发。吴先生回答说：准备着不同意见呢。多年以后，李文林接受访谈时指出，“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看法，我想，到现在也许还是不一致的”。198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吴文俊应邀进行了题为“中国数学史的新研究”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尼克松首次访华前后，包括杨振宁、陈省身等在内的华人科学家开始回国讨论。还有一些美国顶尖数学家也来中国讲学，其中就有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行。在这样的形势下，数学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微分几何讨论班，吴文俊又恢复了拓扑学研究，且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他提出一种新的基本不变量，即I^*量度，并引进了可计算性的概念，从而丰富了研究内容和技巧。这项成果后来由吴文俊执笔，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列入“数学讲义丛书”（*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第1264号。

9. 几何定理的新证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得意的事情，晚年吴先生回顾自己一生的成就，仅把拓扑学的工作排在第三位，而把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排在第二位。或许有人说，这是博弈论的一种应用，因为他的拓扑学研究（尤其是示性类和示嵌类方面）早已被世人所公认，而拓扑学也是数学中优雅和高深的代名词，以至于理论物理学家们也纷纷来沾光。无论如何，大家已经猜到，吴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成就是他晚年的数学机械化研究，这方面的成就在他心目中是排在第一位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谈到关肇直，他是吴文俊最信任的同事和领导。关老生于天津，是吴老的同龄人，他毕业于燕京大学，也一起到

法国留学，名义上他是去瑞士学哲学，实际上却留在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攻读数学，他的导师是泛函分析创始人之一弗雷歇。因为关肇直在出国前就加入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听到消息便启程回国，连博士都没有读完。关老在担任行政职务的同时，在纯粹数学、现代控制理论和系统科学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正是关肇直支持并鼓励吴文俊在特殊时期推荐并发表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1980年，关肇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长期担任数学所领导，强调科研立足国内。他在数学所成立了控制论研究室，1979年又组建了系统科学研究所。

关肇直和吴文俊分别担任系统科学研究所的正副所长。华先生回国后，托人找吴文俊，希望他回到数学所，而一些专家一直不赞成他做机器证明，认为那是“离经叛道”的，希望他继续从事拓扑学研究。关肇直却支持他，放话：“吴文俊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

吴新谋是我国偏微分方程的奠基人，他与华罗庚同龄，是江苏江阴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比关肇直、吴文俊更早去法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带着法国太太和子女们回国。20世纪80年代，关肇直、华罗庚和吴新谋相继病故。1998年，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系统科学研究所与同宗的应用数学研究所、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今天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文革”期间，因为吴文俊以前当过中学老师，领导建议他去中学教书，但他却要求去工厂做没有做过的事。于是他被下放到北京无线电一厂，在那里吴文俊第一次看到了计算机。只需要输入几个数字，按几个键，一个微分方程的解和曲线一下就出来了，吴文俊深感震撼。其实，早在计算机诞生之初，波兰数学家塔斯基就提出了机器证明的想法，那是在1948年。塔斯基证明了，在初等代数和几何范围内，任意命题都可以用机械的方法来判定。可是，要真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1958年，在济南出生、从西南联大毕业的美国华裔数学家王浩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计算机上实现了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数百条逻辑命题的证明，用时仅三分钟，从而首次验证了计算机进行定理证明的可行性，他率先提出了“数学机械化”的概念。不过，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比起逻辑命题的机器证明要复杂许多。美国有很好的计算机，美国人尝试用塔斯基的方法，却一直没有成功。吴文俊受笛卡儿思想的启发，通过引入坐标，把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再把它机械化。

一般来说，几何定理都是由假设推出结论。无论是假设还是结论，在引入坐标以后，都可推导出一组方程式，可分别称为假设方程和结论方程。机器要证明的就是，验证假设方程的每个解都是结论方程的解。然而，这一现象并不总是成立，换句话说，假设方程的解只有一部分是结论方程的解，另一部分不是。因此，必须区分假设方程解的两个部分，并做出合理的几何解释。为此，还要对假设方程进行处理，使之从杂乱无章变得井然有序，以适应机器证明的需要。

所谓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是一种利用代数几何方法的构造性理论。

代数几何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经典代数几何研究多元多项式的零点，现代代数几何则用抽象代数（主要是交换代数）的技巧来解决与零点集合相关的几何问题。

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武崇林老师曾带吴文俊进了代数几何的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吴文俊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边学边教边研究。1977年春天，没有计算机的吴文俊用手算验证了他的机器证明初等几何定理的方法！那就像医生在自己身上试验一种新发明的疗法一样，这需要艰难细致的工作。第二年年底，他又把这一方法推广到微分几何的机器证明。

要证明更多的几何定理，自然需要计算机，且计算机性能越好，可以证明的几何定理就越多、越深刻。吴文俊用的第一台计算机是意大利手摇计算机，后来他有了一台他工作过的北京无线电一厂生产的计算机，然后是一台访问数学所的外国人赠送的袖珍计算器。再后来，他终于正式拥有一台美国产的像样的计算机，那是他用25 000美元外汇在美国买的。

有了计算机以后，还得自己学会编程序。年近花甲的吴先生开始学做程序员，他学会了各种计算机语言，从最早的Basic语言，到后来的ALGOL语言，再到FORTRAN语言。20世纪80年代系统所刚有机房时，上机是要分配时间的，同时还要登记。人们发现，那几年吴先生的上机时间在系统所遥遥领先，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发明人王选院士曾回忆道，有一年农历除夕晚上8点多了，有一位数学所的研究员在院子外散步，发现吴老还在机房上机。

吴方法非常成功，许多定理一下子就被证明出来了。吴老给中科大的博士生讲课时，既讲《希尔伯特几何基础》，也讲机器证明的原理。有一位计算机系的旁听生周咸青后来去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计算机，系里几个专家都做机器证明，可是不太成功。周同学给他们介绍吴方法，一试果然灵验，于是传遍美国。之后“出口转内销”。1990年，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成立了“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吴文俊出任主任，上面批了100万元经费专用于机器证明的研究。后来，又以“数学机械化与自动推理平台”这一项目首批进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10.暮年：辉煌与宁静

2000年，吴文俊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起荣获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方面，这是他的成就应得；另一方面，也是他的高寿所至。那年吴老82岁，身体康健，也很健谈。他与袁老“套近乎”：农业与数学向来关系密切，数学是起源于农业的。这在数学史上也的确如此，牧羊人计算牲口的只数产生了数学，正如诗歌起源于对丰收的祷告。吴先生透露，袁隆平多才多艺，会跳踢踏舞。在此以前，吴老曾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首届中国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和法国厄布朗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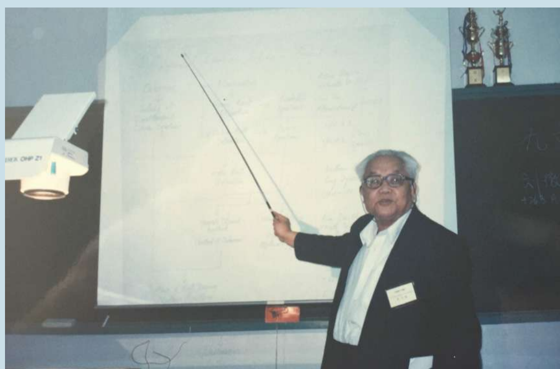
2006年，吴文俊又在中国香港获得了邵逸夫数学奖，这是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奖项之一。这个由宁波籍香港电影制作人邵逸夫先生设立的科学奖项被誉为“东方的诺贝尔奖”，一共设立三个奖项，其中有两项是诺贝尔奖遗漏的，即数学和天文学。另外一个领域是生命科学与医学。据说这是杨振宁先生构想出来的，他是这个奖的评审委员会主席。在数学领域，第一届（2004年）和第二届（2005年）评委会主席杨振宁都邀请吴文俊担任。


2006年吴文俊在中国香港获颁邵逸夫数学奖

第一届邵逸夫数学奖的评委有普林斯顿高研院院长格里菲斯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院长博规农，中方评委由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和中国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推荐。第一届的获奖者是陈省身，而第二届获奖者是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英国数学家怀尔斯。第三届评委会主席是在黎巴嫩出生的英国大数学家阿蒂亚，评委有北京大学张恭庆、格里菲

斯、广中平裕和诺维科夫。获奖人是吴文俊和美国数学家芒福德，他们都从传统的数学——代数几何和拓扑学出发，转向与计算机相关的新领域，这代表了未来数学的发展方向，也为数学家的将来提供了一个新的行为模式。

从1979年开始，吴文俊又频频出访讲学，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瑞士、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他也曾数度返回法国的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与昔日的导师、同学和朋友重聚。在吴老口述自传附录的年表中，曾提及1993年访问中国台湾地区，而1996年只记载攀登计划“机器证明及其应用”验收通过，并获准延续，更名“数学机械化及其应用”等事项，没提那年冬天参加中国台湾地区数学年会的事情。那次，我也有幸受邀，与吴先生一同出席，且我们是那次会议上仅有的两位中国大陆同行，我们常私下聊天，并一起游览了日月潭。



吴文俊先生在中国台湾数学年会上做报告 作者摄于1996年

翌年，我有机会以“数学与艺术”为题申报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打电话请吴老写推荐信，吴老欣然同意。我还记得吴老的信是用蓝笔写的，大意是数学与艺术本有许多相关之处，但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现在某某某大胆“杀”出一条路，值得支持。那封推荐信的副本后来找寻不到了，但吴先生的“杀”字让我记忆犹新。遗憾的是，那次申请以失败告终，我后来也没有机会见到吴老，再次聆听他的教诲。直到20年以后，教育部设立科普著作专项基金，我又一次申报了这个题目，终获成功，也算可以告慰吴老先生了。

1984年，吴文俊担任了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任期4年。他在任内促成中国数学会加入国际数学联盟。同时并没有把位于中国台北的数学会驱逐出去，而是让两者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他还借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之际，邀请留学巴黎时的导师嘉当访华，还陪他游览杭州西湖，并谈起自己机器证明的思想最初来自导师。

卸任之前，吴文俊提议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一职不得连任，这个传统延续至今。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吴先生担任大会主席，霍金与纳什做了公众报告，吴文俊也做了报告，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实数系的发展”。在大会召开前一年，他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中拨出100万元建立了“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有潜力的年轻学者深入研究有关古代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数学与天文学领域的交流传播。

无论是作为数学机械化中心的主任，还是作为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组长，吴先生都非常重视应用。早在1994年，他就开始关心金融数学并把它作为优先资助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彭实戈教授如今已赫赫有名。在数学机械化的应用方面，则首先选择了数控机床，在机床里嵌入一个核心算法，以此提高机床的效率、加工速度和质量。这一技术已在国内外得到推广。实际上，这也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机械化。这方面，吴先生有几位弟子做得很好，尤其是高小山，按照吴老的说法，高小山可以做他的接班人。

在小山教授看来，广义的数学机械化就是把数学问题用计算机来实现，通过计算机来做数学。吴先生做的是代数机械化，还有拓扑机械化、代数几何机械化等。目前，国际上最成功的是数论机械化，也称计算数论，这一理论最直接的应用是密码学。依照我的研究经验，计算机之于数论学家，就如同望远镜之于天文学家，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各种程序包应运而生，美国有家著名的计算数学杂志名

为《计算数学》（*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每期都会刊发计算数论方面的若干文章。

吴老拥有一颗顽童的心。1979年，60岁的他去美国时还想坐灰狗巴士横穿美洲大陆；1997年，78岁的他在澳大利亚尝试玩蛇，让同行的人吓了一跳；2002年，83岁的吴老在泰国期间，有一次他坐在大象的鼻子上开怀大笑。与此同时，吴老喜欢安静，他酷爱读闲书和看电影，读闲书是小时候跟父亲学的，看电影的爱好则是在法国养成的，它们是两种休闲的方式。有时候，他会待在影院里连续看好几部电影。甚至他在90多岁时，也会趁家人不注意，独自一人坐公共汽车去商场看电影，看完以后还跑到咖啡馆喝咖啡。据说有一次，他因为打不到出租车，便拦下一位年轻同事的座驾，请求带他去电影院。



1997年 吴文俊访问澳大利亚

与吴先生共事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主任许忠勤教授认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吴先生都是做得最好的。他是中国数学界的榜样。北京大学程民德先生讲过，吴文俊这个人大智若愚。对此，南开大学胡国定教授表示赞同，他说吴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在我看来，吴先生也是很懂得感恩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是有福之人，每逢人生的关键时刻，总会遇到贵人指点或相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他安然度过了漫长的一生。而每当有人说起天才，吴先生总会自谦自己是一个笨人，同时补充道，数学是笨人学的。

2017年6月，杭州彩云居

奇异的旅行者：詹姆斯·乔伊斯



雨中的乔伊斯塑像 作者摄于都柏林

1

2002年初夏，我应邀参加了苏黎世诗歌节，有机会得以首次造访这座欧洲物价最昂贵的城市之一。苏黎世位于瑞士联邦北部的德语区，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和欧洲的金融中心。德国诗人、翻译家托比亚斯·布加特和他的阿根廷妻子乔安娜用西班牙语翻译了我的10首诗歌，并用英文译稿进行校对。后来，这些诗作出现在《斯图加特日

报》和柏林一家名为*INKOTA*的综合性杂志上，与中国一样，在欧洲报刊发表诗作稿费很少，影响力也有限。布加特深谙此道，于是，他向苏黎世诗歌节推荐了我。最终，不仅我荣幸地接到了邀请，组委会同时也把布加特夫妇邀请到了苏黎世。瑞士人出手大方，除了报销旅费、提供五星级酒店住宿以外，还另有一笔朗诵费给诗人，我可以用这笔钱在诗歌节闭幕后到邻近的奥地利和几个东欧国家游览。

与瑞士另外两座历史名城日内瓦和巴塞尔相比，我原以为苏黎世只是金融和商业中心，文化旅游资源相对匮乏，但事实并非如此。19世纪末，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平静地度过了大学时代，后来他又在苏黎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短暂执教。就在爱因斯坦大学毕业那年，心理学家荣格来到了苏黎世湖畔，行医并教书直到去世，他的学生中有心理学家皮亚杰，而他的病人中则有作家黑塞。皮亚杰在现代儿童思维研究领域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并揭示了成人的思维是如何根植于其中的；黑塞被誉为“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黑塞虽以诗歌见长，但其小说也影响甚远，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逐渐取代了海明威的文坛霸主地位，在德语文学史上堪称一绝。

在来苏黎世之前，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两幅景象。一幅是距利马特河不远的伏尔泰酒吧。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无政府主义艺术流派——达达主义意外地诞生在此。我曾经去寻访这家酒吧的遗址，发现它的四周被脚手架环绕着，一家新的时装店即将开业。很难想象，当年这里曾举办过疯狂的多语种诗歌朗诵会。另一幅是墓地照片，风烛残年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站在老友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塑像前。乔伊斯光着头，戴着金丝眼镜，交叉着腿盘坐着，他左手托腮，右手拿着一本翻开的书，一根拐杖靠着大腿。那是1967年冬天，庞德已经82岁，他披着围巾、裹在大衣里，头戴礼帽、手拄拐杖，两人相距不足5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乔伊斯的

脑袋是如此小巧玲珑，使得整座雕像看起来像是一具骷髅。这幕景象我当然不会错过，而且不止一次造访。

即使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犹太民族也贡献出了不计其数的杰出人才，以至于每一位伟大的作家身上都有可能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但乔伊斯显然不是其中之一。他是庞德的朋友，但庞德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者。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语诗人之一，庞德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活动家，他对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的贡献就像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对数学和物理学的贡献一样。除了帮助建立意象派诗歌团体和帮小说家海明威等同胞作家出版作品以外，他还大力推荐乔伊斯的作品，并帮助他出版了《尤利西斯》。他帮助删改整理艾略特的《荒原》，甚至年长一辈的叶芝也言及庞德对自己的教益。更让人高兴的是，由于庞德的喜爱和推崇，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诗歌在西方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作者在苏黎世乔伊斯故居前（2007）

庞德的问题在于他关心的事情太多，甚至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比如战争及其与欧美经济的渊源。他不仅发表了少量有见地的经济学论文，还在诗歌中广为应用，尤其是在晚年写就的《诗章》，他对普遍意义上违反自然的高利贷进行了抨击，同时又对国家控制信贷体系表示赞赏。难怪英国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调侃说，《诗章》里的气候很像我们英国，大部分时间里都刮着一股夹着雨意的西南风，有时转多雾——经济学论文的雾，偶尔会露出几抹地中海地区灿烂的阳光。《诗章》的开头部分原来是用布朗宁式的戏剧独白来嘲讽那些试图用

欧洲的过去来教化美国的企图，稍后他参照奥德修斯故事中主人公对阴间的采访以及为了重返伊萨卡岛不得不挫败其战友和包括母亲在内亲属的欺诈故事。用古英语的韵律进行了改写。这让我想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对应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奥德修斯。

2

爱尔兰仅有400多万人口，居住在海外的侨民却多达数千万，这一点比起位于中南半岛北部的老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老挝的人口600多万，旅居邻国的同胞却有2 000多万。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喜好迁移，原因却不尽相同，一个被大海环绕，另一个却相对远离大海。爱尔兰人和邻近的英国人虽然居住在欧洲的最西端，但他们都没有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先驱，或许是因为生活在海岛的人民更向往过安逸的日子。直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人才和英国人以及德国人等一起组成了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欧洲人，尤其在纽约一带较为集中，以至于爱尔兰的国庆日——圣·帕特里克节——成为美国的法定假日。同时，有一首曲调忧伤的爱尔兰民歌也传遍世界，歌名非常浪漫，名为《夏日最后的玫瑰》，它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支红遍全球的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风格相去甚远。

正如奥地利人在音乐上的成就可以与德国人相提并论，爱尔兰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堪与英国人媲美。斯威夫特、王尔德、萧伯纳、叶芝、乔伊斯、贝克特、希尼，这一串闪闪发光的名字犹如文学界的北斗七星在夜空中熠熠生辉，而爱尔兰的人口仅为英国的1/16（奥地利的人口仅是德国的1/10）。为了出人头地，这些爱尔兰作家先后来到伦敦或巴黎闯天下，并且使用英文或法文写作。除了患有梅尼埃尔氏病的斯威夫特，一生伴随着周期性的昏眩和呕吐而不得不滞留岛上以

及尚且健在的希尼[注]以外，另外5位都客死异乡。其中乔伊斯的迁徙最为频繁，他自从22岁离开祖国后，仅有两次（27岁和30岁）为了处理出版事宜回国稍作逗留，终其余生辗转生活在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意大利的罗马，法国的巴黎、维希，瑞士的苏黎世等地。



的里雅斯特街头的乔伊斯塑像右为喀麦隆女诗人 作者摄

1882年2月2日，詹姆斯·乔伊斯出生在都柏林郊外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6岁时被送到一所教会开办的寄宿学校，三年后由于家道败落，他转到一所走读学校读书。乔伊斯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出版过几部诗集，可是风格比较保守，语言过时、僵化，略显苍白，因此影响不大。但他的才华并未消失，而是溶化在他的散文和小说里。18岁生日刚过，他就在英国文学杂志《半月评论》上发表了《易卜生的新戏剧》一文，得到那位年事已高的挪威剧作家本人的赞许。两年以后，他在都柏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天，乔伊斯去法国的一家医学院学医，却由于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接着，他两度赴巴黎，试图以写书评和教英语为生，均未取得成功。

乔伊斯的内心就像易卜生戏剧中命运多舛的艺术家主人公一样，始终充满了“孤寂、沉默、出走和狡狯”。1904年，母亲去世以后的第二年，他在一次散步中结识了一位在旅馆做侍者的姑娘诺拉，当年6月16日，乔伊斯在一次约会时向她倾诉了爱慕之情，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约会。他称这一天为“开花之日”，后来又成为以《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命名的“布卢姆日”。4个月以后，乔伊斯不顾父亲的反对，和

诺拉一起来到欧洲大陆，当他们长途跋涉到达苏黎世，原来期望的教师职位却被人占了先。他们不得已转移到亚平宁半岛，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波拉安了家，乔伊斯在镇上一所语言学校教英语，后来他们又搬迁到附近的的里雅斯特市，诺拉在那里生下一对儿女。乔伊斯的学生中有一位年长他20多岁的犹太商人，此人后来以斯韦沃的笔名发表小说，成为意大利第一个国际知名的现代派作家。



世界的尽头 作者摄于戈尔韦

1915年夏天，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乔伊斯一家离开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来到他们青年时代向往过的苏黎世，他在那里做英语家庭教师。正是在瑞士居留的4年期间，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和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得以出版，同时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开始了《尤利西斯》的写作。1920年夏天，返回的里雅斯特没几个月的乔伊斯在庞德的劝说下移居巴黎，他

在法国一住就是20年，其间《尤利西斯》几经波折出版，他还写成了《芬尼根的守灵夜》，这部小说是乔伊斯怀着世界历史循环往复的信念完成的。1940年隆冬，纳粹侵入巴黎，乔伊斯夫妇逃离了法国，又回到了苏黎世。4个星期以后，乔伊斯做了胃溃疡穿孔手术。术后未能恢复，于次年1月13日逝世。诺拉继续一个人住在苏黎世，直到10年以后去世。

3

乔伊斯并不是一位高产的小说家，可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为人们所关注。在我看来，《都柏林人》和出生于加勒比海沿岸的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著的《米格尔街》有着相似之处，这两部小说均是通过少年的眼睛描写故乡的风情和个人经验的短篇小说集。两位作家均来自海岛，虽然他们后来的生活表面上大相径庭，实则殊途同归。奈保尔周游列国走遍世界，乔伊斯则在欧洲重复地进行小范围的迁移，他们都把个人经验成功地转化成了文学作品。乔伊斯不像莎士比亚那样善于假想别人的生活场景，只好运用自己早年在都柏林有限的生活和社会交往经历，在悠长的异国之旅中不断想象自己在过去年代漫步。所幸，乔伊斯的每一次迁徙都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环境来做这样的回忆，同时，他还和斯威夫特一样是一位讽刺大师，这帮助他不断调整自己的风格，使之与新的主题相适应并给读者带来新鲜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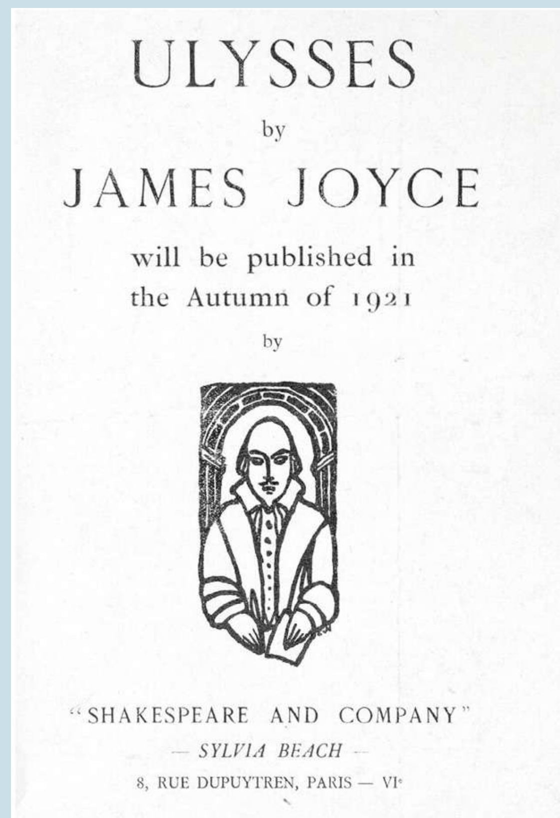
多年以前，我看过一部叫《诺拉》的电影，讲的是从乔伊斯和诺拉相识直到《都柏林人》出版这12年的时光，这部书在出版商手里存放了9年终于出版了。电影里有许多水边码头和火车沿亚得里亚海边飞驰的镜头，使我想起不停地迁移的乔伊斯似乎从未乘坐过飞机。影片中的青年乔伊斯腼腆、胆小、多疑，但是性感、机智、勇往直前的诺



乔伊斯的终生伴侣诺拉

拉给了他力量，经济的拮据和现实的曲折（乔伊斯屡遭退稿）有几次使她失去信心。他们之间的肉体关系和争吵是这部影片的主题之一，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发生在他们最后一次返回都柏林的时候，有一位乔伊斯的昔日好友竟然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曾与诺拉有染（这一点让我明白他们当年出走并非完全是为了写作）。乔伊斯坚决遵守对诺拉许下的诺言，他们在1931年带着已有精神病预兆的女儿前往伦敦，在他父亲生日那天完婚，此时距离乔伊斯不顾父亲反对与诺拉私奔已有27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乔伊斯是一位运用神话的专家，这使得他的研究者人数众多，也使得读者对他提供的现实产生了距离，他们通过自己的想象不断缩小这一距离。《尤利西斯》的每一章都参考《荷马史诗》里的故事写成，并十分巧妙地写出了古代与现代的各种相似之处，乔伊斯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时光流逝，但是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在这部巨著中，乔伊斯为了充分表现出他那成熟的、结过婚的和“全面的”男子汉主人公，在流浪者奥德修斯身上找到了这个形象。而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乔



ULYSSES

by

JAMES JOYCE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Autumn of 1921

by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 SYLVIA BEACH —

8, RUE DUPUYTREN, PARIS — VIe

伊斯利用了克里特岛上的神话，岛主米诺斯令巧匠迪达勒斯设计好迷宫以后，想要杀人灭口。迪达勒斯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他用蜂蜡黏合羽毛做成翅膀顺利逃走，但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在第一次试飞时却送了命。乔伊斯认为这样的跌落是一种“向上”的跌落，他用这个故事告诫现代艺术家，必须从家庭、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和宗教的迷宫中逃离出来。

《尤利西斯》初版预告 巴黎莎士比亚书店



乔伊斯做客巴黎莎士比亚书店（1920）

事实上，乔伊斯中学毕业以后就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后来他通过旅行和迁移彻底摈弃了天主教。1922年，乔伊斯40岁生日那天，《尤利西斯》的样书送到了他的手中。T.S.艾略特谈到乔伊斯时，赞叹他是一位“宣告了19世纪末日”的作家。事实上，正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主编约翰·格罗斯所指出的，《尤利西斯》标志着一种社会制度的解体；在这种社会制度解体前，艺术家至少还可以通过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与其认同。乔伊斯推翻了以前小说中那种循规蹈矩的虚构情节，尝试运用混杂的风格和突然的转折，为小说开辟了其他作家一直探求着的多种可能性。可是，与乔伊斯同年出生且同在巴黎生活过的英国画家、小说家、批评家温德姆·刘易斯却把他和柏格森、怀特海这类哲学家混为一谈，并对他那典型的20世纪的关于时间的烦恼大加斥责。

当然，乔伊斯本人也创造了一个神话，即布卢姆日（Bloom’s Day），一部小说催生了一个世界性的节日，这是乔伊斯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尤利西斯》讲的是布卢姆、他的妻子玛莉恩和一名教师迪达勒斯这三个人物在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漫游都柏林街头所发生的事情。如今，这个节日已成为人们讨论文学作品、怀念乔伊斯的日子，



2009年布鲁姆日 游客朗诵《尤利西斯》

每当这一天来临，全世界不计其数的旅行者会涌向都柏林。当地政府和市民也会做好各种准备，让大家充分体验都柏林人一天的生活。在所有赞美之词中，有一个比喻最令乔伊斯兴奋，就是把他的小说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研究相提并论。事实上，这两个不同方向在进展的时间上有着惊人的相似，1905年，乔伊斯把《都柏林人》的手稿交到了编辑手中，爱因斯坦则提出了狭义相对论，而10多年以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乔伊斯也正在埋头写作鸿篇巨制《尤利西斯》。

4

诗歌节结束前的那天中午，猛烈的阳光照射着苏黎世，我独自搭乘公共汽车来到东郊弗伦特恩公墓，找到了乔伊斯之墓。他的墓园仿佛是一座清净的花圃，只有少量的碑石露出地面，颜色鲜艳的花瓣散落在整齐的草地上。无须询问，紧邻山坡的通道上，有一块石牌上刻着两行字，顺着箭头所指，我看到了那尊著名的雕像，比想象中的还要矮小，我顺便记下了那位无名作者的名字D. Hebald和雕刻时间1965年，距离乔伊斯去世已经14个年头。墓的四周被低矮的灌木和草地环绕，乔伊斯与诺拉、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合葬在此。草地边上有一行德文Bitte das Grab nicht betreten，意思是：请勿进入墓园。对比庞德的那幅照片，显然他是有违规则了，不过我可以设想，警示牌是后人放上去的，原因是庞德的追随者众多。

在乔伊斯墓左侧七八米远处，坐落着另一位文学巨匠之墓，即保加利亚出生的英籍犹太裔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白色倾斜的石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卡内蒂年轻时曾在苏黎世求学，他后来获得维也纳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用德语写作。1981年，这位“德语里的客人”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年轻时他是乔伊斯的崇拜者，晚年他从伦敦移居苏黎世，回到德语世界的怀抱。在我看来，埃利亚斯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陪伴着乔伊斯。另一位诺奖得主托马斯·曼也在临近生命的终点，从加利福尼亚移居苏黎世，他被安葬在同属弗伦特恩区的基尔奇伯格乡村墓地，这位《死于威尼斯》和《魔山》的作者被公认为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乔伊斯之墓 作者摄于苏黎世

《尤利西斯》因为晦涩难懂和独特的性爱描写一度被列入禁书名单，后来又被奉为20世纪英语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乔伊斯本人也被誉为意识流小说的鼻祖。

对于乔伊斯这样的作家来说，每一次旅行或迁移都意味着对现实的一种短暂逃避，当他返回或安顿下来，新的现实又复活了。他的小说像一艘艘巨轮，载着他和他的读者驶向大千世界。对诗人们来说，这些巨轮几乎就是一场场灾难。乔



酒吧里的爱尔兰青年 作者摄于科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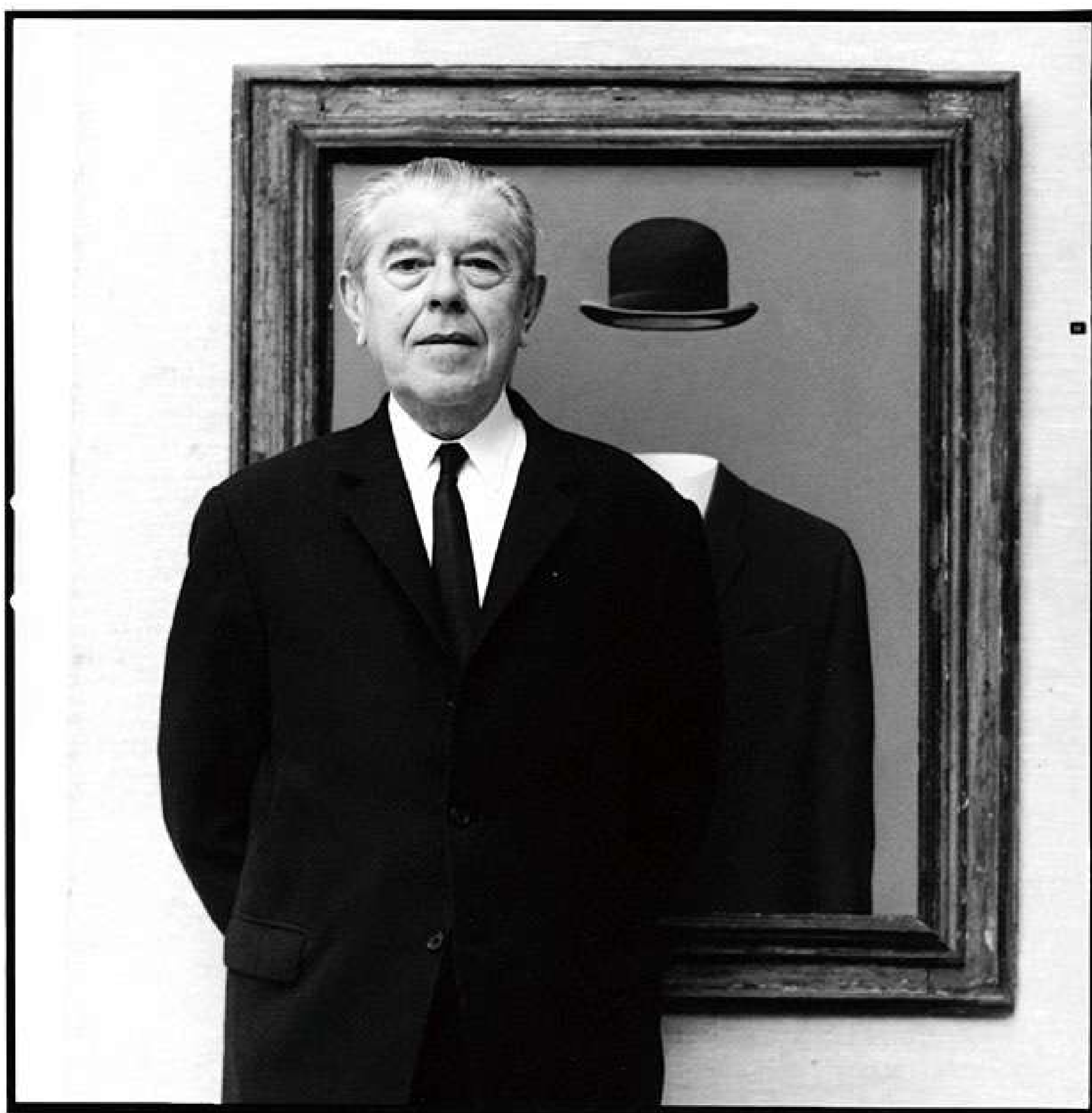
伊斯是人类意识新阶段的伟大诗人，他借用具体事物表现了抽象的概念，把我们带到一个个超越时空的国度，使得原先属于诗人的专有领地被强行侵占。乔伊斯离开爱尔兰以前，曾在都柏林的国家音乐节歌咏比赛中获得了铜奖（他唯一的儿子后来成为一名职业的男低音歌唱家），影片《诺拉》的导演也给了他一展歌喉的机会。正是乔伊斯那忧伤的嗓音最后打动了诺拉，美妙的歌声为她勾勒出如梦如幻的奇异旅程，促使她下决心跟着他走到天涯海角。

2003年12月，杭州西溪

---

1. 希尼已于2013年过世。——编者注

戴圆顶礼帽的大师



勒内·马格里特在他的画前

当我第一次见到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里特（1898—1967）的油画时，便被他的梦幻世界深深地吸引了。与此同时，我隐隐地发现了马格里特的绘画与我的自印诗集《幻美集》（1989）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直到最近读到苏子·嘉贝丽克撰写的一本薄薄的有关马格里特的小册子，我的那种感觉越发强烈，以至于不得不把它写下来。坦率地说，我在本文的写作中部分采用了马格里特的对手——萨尔瓦多·达利喜欢的方式：自我宣传。



马格里特作品《镜子的错误》

与达利相反，勒内·马格里特在超现实主义画家当中，可以算是一个不抛头露面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比较像米罗。他的生日是11月21日，正好处于占星术中的天蝎座。在这段日子里还诞生过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科学家居里夫人以及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据说天蝎座的人既不善于言谈，喜怒哀乐也不溢于言表，这是识别他们的一个可靠标志，尽管毕加索喜欢嘟嘟囔囔，但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自言自语的人，毕加索最讨厌的事是跳舞。据说这些人一般对奇迹、怪诞、神秘、破坏和作恶有着特殊的爱好，他们的内心世界总为幽灵般的幻象所缠绕，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马格里特的童年是在小城市度过的，他的出生地莱西纳是比利时最有法国风味、最具世界性的地方。与几乎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孩提时代的马格里特对人文科学的学习颇感头疼。在他12岁那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马格里特和一个小女孩在一处古老废弃的墓地上玩耍，突然他们在倒塌的石柱和成堆的败叶中看见一个来自城市的艺术家在那里作画。从那天起，绘画对他产生了无法驱散的魔力。后来，他参加了夏特莱的儿童绘画班。1918年，他毕业于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同年随家人迁居首都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在布鲁塞尔植物园散步时，

邂逅了中学时代心仪的女同学乔治特·贝格，马格里特以他惯有的那种恶作剧式的幽默，即兴编了一个故事，说他自己正在看望恋人的路上，这深深打动了乔治特。1922年，他们结为百年之好，至此，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安排就绪。



马格里特作品《单人房间》

1927年，马格里特离开布鲁塞尔，加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活动圈子，他在巴黎的近郊定居，主要与诗人安德烈·布勒东、保尔·艾吕雅等人交往，他喜爱并敬仰的画家是德·契里柯和恩斯特。但是马格里特与超现实主义的关系在最好的时候也是暧昧的，三年以后，他离开巴黎返回布鲁塞尔，据说起因于他与布勒东的一次口角。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马格里特怒气冲冲，焚烧了所有使他想起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包括信函和小册子，甚至还烧了一件上衣。照乔治特的说法，如果不是她的阻拦，马格里特或许会把自己也给烧了。可是，马格里特自始至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超现实主义者，他对超现实主义的理解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超现实主义思想必须是构想的，但又不是虚构杜撰的——它的现实性与世界万物的现实性是一样的，但它必须是想象的。

维特根斯坦证明了：作为一种虚构出来的模式，语言无须与现实完全一致。的确，从哲学意义上讲，一个观赏者是能够在同一地点处于两个时间的。马格里特用作品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的帝国》里，他让夜晚的房舍和树林处于白昼的天空下，而为了加强夜晚的效果，马格里特特意安置了一盏倒映在夜晚湖水中的路灯。另一方面，一个观赏者也可以同时处于两个地点。在《田园的中心》里，窗户已经破碎了并正在坠落，但是窗外风景的局部仍呈现在室内的玻璃碎片上。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幻美集》中，比如在《以P.S.的风格》注这首

诗里，“我”在岸上看一个人游泳，在“看”和“游泳”的过程中，“我”和“游泳的人”不知不觉地互换了位置。

禅宗有句开示：你能用手指着月亮，但千万不要把手指误认为月亮。马格里特认为：一个事物的真相恰恰容易被它经常表现出的样子所遮蔽。他采取的方法之一是改变事物的尺度、位置或质地，从而创造出一种不协调感。比如，把一个巨大的餐盘放在一处海边风景中（《大餐盘》）；或者用一个苹果占据整个房间（《收听室》）。《单人房间》则更离奇，他把衣橱、床、头梳、酒杯、铅笔、胡子刷等杂物毫无章法地堆放在一起，而墙壁则是蓝天白云。这种手法同样也出现在《幻美集》中，在《村姑在有篷盖的拖拉机里远去》这首诗里，篷盖、麦田、围巾、脚丫等意象瞬间改变了尺度，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



马格里特作品《欧几里得的漫步处》

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事物讲着一种无声的语言，比如花、天空、日落和家具似乎在做梦，甚至可以说蔬菜与矿物一样，具有一种梦游者的生命。马格里特用来表达物质语言的手段之一是孤立，也就是使对象与其本源脱离。在《比利牛斯的城堡》中，岩石像云彩一样高高地飘浮在海洋之上。《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画的是一个赤身的男人，在他身旁一套西服和一顶圆礼帽凌空悬挂。在《幻美集》里有一首诗叫《绿风》，诗中这样写道：风来自高楼的峡谷/经过有花瓶的窗台/ 将一束花的叶子吹落/而让另一束花只留下叶子……全诗无意识地采用了虚实相间的手法。

与孤立相反，把两个彼此独立的形象融合在一起，也是马格里特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欧几里得的漫步处》描绘的是一幅城市风景，画中有一条剧烈透视的宽大马路，使得马路看上去快变成一个三角形了，从而重复了相邻塔楼的角锥形状。画面唤起了某种巧合，或者说巧合产生了画面。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的，“当人们发现一对雏鸡和两天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数字2）时，数学就产生了”。顺便提一下，巧合的画面似乎与意象诗相近，比如庞德的《地铁站台》，但又有区别，马格里特的绘画无疑更抽象，更具哲学意味。《幻美集》中有一首诗《羽毛》，在那首诗里，羽毛和帆船这两个意象产生了巧合，而诗的主题则与时间有关。黑格尔在晚年发觉星光辉映的天空是阴沉的，他指出：人们能够把并不实在的事物的理念自我感觉成像实在的一样。


马格里特作品《自由决定》

马格里特无疑从德·契里柯开创性的形而上绘画风格和洛特雷阿蒙的长诗《马尔多罗之歌》中获得了灵感，后者的名言“美得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邂逅在手术台上”与前者作品中各意象之间谜一般的联系，一起对他的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1926年创作自认为是第一幅“实现了”的绘画《丢失的骑士》开始，马格里特就开始运用人们熟悉的具体事物，以各种不规则的方式加以组合，创造出令人惊喜交加的效果，给我们以震撼的启示。他提出了作画的对象与真实的事物之间的含义和关系问题，这使他成为超现实主义画家中最具哲学倾向的和最符合现代艺术精神的一个。为了使画面内容的真实程度最大化，马格里特采用了拘泥于细节与故意显得平庸的方法。例如

在《自由决定》这幅画中，一个年轻文雅的女骑手，穿过一片被树木分隔的森林。马被树木拦截成几段，而各部分安排得朦胧模糊，马看上去既像是在树的前面，又像是在树的后面，这把我们引进到现实与幻觉的矛盾之中。

1951年，法国诗人蓬热与瑞士雕塑家贾科梅蒂谈起：我们是这一代中一些不得不推迟出现的人。对马格里特来说，他的姗姗来迟是他个人的选择。与别的艺术家都有意在生活中激起公众的注意相比，马格里特却力图在外表上不引人注目。他最像他画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头戴圆顶礼帽，身穿黑色外套的人。自从1930年离开巴黎之后，马格里特的艺术家生涯可以说是告一段落。在回到布鲁塞尔之后，他越来越生活得像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他讨厌旅行，喜欢稳定，似乎是一个放弃了个性的人。他与世隔绝，冷漠的神情中蕴含着对平凡琐碎的蔑视和反抗。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波普艺术家尊崇马格里特为这一艺术之父，被他坚决拒绝。他的傲慢孤僻，使人想起波德莱尔所说的“优秀的人”，但他的想象力始终活跃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艺术创造力依然旺盛。正如梅利为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电影脚本《马格里特》里所写的：“他是一位秘密代理人，他用外表装束和行为讲话。大概多亏了他的隐姓埋名，他的作品才像冰山浮动般，已经有了逐步的并且是压倒一切的影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格里特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到现在仍然难以被充分地估计。



比利时货币上的马格里特

1990年2月，杭州

绿风

风来自高楼的峡谷

经过有花瓶的窗台

将一束花的叶子吹落

而让另一束花只留下叶子

风吹在她忧愁的脸上

她的眼睛显得迷惘

风轻轻解开她的衣裙

她的乳房多出一只

风倾压在她身上

村姑在有篷盖的拖拉机里远去

我在乡村大路上行走

一辆拖拉机从身后驶过

我悠然回眸的瞬间

和村姑的目光遽然相遇

在迅即逝去的轰鸣声中

矩形的篷盖蓦然变大

它将路边的麦田挤缩到

我无限扩张的视域一隅

而她头上的围巾飘扬如一面旗帜

她那硕大无朋的脚丫

从霍安·米罗的画笔下不断生长

一直到我伸手可触

羽毛

白日是一条宽广的河流

黑夜的村庄坐落在彼岸

我看见鸟翅在天空闪烁

随意飘下一根羽毛

一只帆船由远而近

消失在夜与昼的边缘

以P．S．的风格

一个人在海上游泳

他俯身于水面

双臂依次向前移动

我在岸边的沙滩上

看见他的脸侧转

露出水面或没入水中

便身不由己地摇荡

我好像一块冲浪板

在万顷波涛的海面

时隐时现

而他径直来到了岸上

在我此刻驻足的地方

饶有兴致地观看着

1. P.S.是指作者早年用过的笔名派司。

巴黎，一席流动的飨宴（节选）



初到巴黎时的皮扎尼克

自从在台伯河岸边的小村庄发迹以来，拉丁民族就不断在欧洲蔓延，他们向西迁徙至大西洋边的罗卡角，向东移民至黑海之滨的多瑙河三角洲，衍生出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多种语言。而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他们又迁移到了南美洲。这个载歌载舞的民族，在每个时期都不乏文学巨人和艺术大师，他们与如今那些无时不在绿茵场上闪耀的足球明星一样，在中国拥有不计其数的崇拜者。但是，拉丁民族中的女作家似乎只有“男性化”的法国人乔治·桑有着世界性的影响。而在中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外国女诗人，几乎清一色出自欧美。在21世纪的两次远游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位

极其重要而又有传奇经历的阿根廷女诗人——皮扎尼克，她与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并称“拉美双姝”。

1936年4月29日，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移民家庭，她的父亲来自波兰（今属乌克兰）的一个俄罗斯犹太家庭。在皮扎尼克出生前两年，她的双亲乘坐一艘国籍不明的货船，横渡大西洋来到拉普拉塔河边。虽然皮扎尼克身上并未流淌着拉丁民族的血液，但她却是用纯粹的西班牙语写作的。她在阿根廷长大，直到念完大学以后，才去巴黎的索邦大学留学。



少女时代的皮扎尼克

1. 云中漫步的女生

1954年9月，南半球的又一个春天到了，皮扎尼克上大学了。据一位当年与她一起入学的邻居回忆，皮扎尼克在从家里出发去学校的路上兴奋不已，并不断地和同伴谈论着法国文学，他们谈论普鲁斯特、纪德、克洛岱尔，他们还谈论超现实主义，此外，她也提到了乔伊斯和克尔凯郭尔，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始终让她割舍不下。出于渴望阅读原著的动力，皮扎尼克学习法语特别用功并富有成效，大学二年级时她便亲自动手，翻译了布勒东和艾吕雅的诗歌，依照她的美学趣

味，还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们最让她感到可亲，后来她在巴黎与他们有了更近的接触。这个有着绿色大眼睛的女孩与老师和同学都相处得不错，在无数个星期六的夜晚，伙伴们聚集在皮扎尼克家里，研读那些法国文学大师的作品。由于父母的宽容，他们可以讨论直到深夜的任何时候，全程还有威士忌供应，仿佛他们置身于巴黎。

南美洲的街区分得很细，这是仅比市低一级的行政单位。布宜诺斯艾利斯有40多个街区，因此这个街区的范围比中国城市里的区要小，但比街道居委会管辖的范围要大。皮扎尼克的家在桦树区，通过该街区的“艺术之家”，她认识了住在同一街区的著名作家安东尼奥·波契亚。波契亚比皮扎尼克大整整50岁，他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幼年丧父，15岁时随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移居阿根廷，而他的长兄则永远留在了故乡。为了帮母亲养活全家，他拼命在港口和印刷厂工作，他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中，本能地写下了跳跃的词语，最终形成了一行行文字。他唯一的出版物《遗忘的声音》深受各国诗人和读者的喜爱，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他本人也一直享受着诗人的荣誉。波契亚和皮扎尼克成了忘年交，他们互相交流并分析作品，在皮扎尼克的代表作《工作和夜晚》里收录了一首献给波契亚的诗，题为《伟大的词语》。

在皮扎尼克的大学时代，她还认识了堪称她的文学之母的女诗人奥尔加·奥洛斯科。奥洛斯科出生在潘帕斯草原上的一个叫托艾（Toay）的小镇上，她在大西洋边的布兰卡港附近长大，直到16岁，才随父母迁居首都，那一年正好皮扎尼克出生。因此，后来奥洛斯科喜欢和人开玩笑说，她和皮扎尼克是同一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在奥洛斯科长达50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她出版了20多部个人诗集，并赢得过多项国家级大奖，她的诗有着鲜明的超现实主义烙印，有着一种不安的寂静，这一点与皮扎尼克的诗比较接近。奥洛斯科在我抵达阿根廷的前一年去世，生前她也曾参加过罗萨里奥诗歌节。在我看来，奥洛斯科在20世纪阿根廷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美国女诗人玛丽

安娜·穆尔，而她和皮扎尼克的友谊维持了一生，就如同穆尔小姐和年青一代的诗人毕晓普一样。皮扎尼克22岁时写过一首题献给奥洛斯科的诗《时间》，这首短诗的最后两行写道：

我的童年和您的香水

都喜欢爱抚的小鸟

能与这样两位高水平的诗人交往，皮扎尼克的起点着实不低，她并不是某些人眼里的那种有着青春期骚动的年轻人。事实上，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两个皮扎尼克，一个是好动的，在现实面前无所畏惧甚至有些放肆，常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犀利的观点；另一个却是安静的，当她直接面对文学世界，她的呼吸会变得缓慢，把好奇的发现转变成一首首诗歌。1955年，20岁的三年级大学生皮扎尼克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最后的天真》，她的父亲支付了所有印刷费用。这本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名为《拯救》，末尾一句是这样写的：

少女戴上永恒的面具

进入了如诗的境界

这无疑是皮扎尼克个人的真实写照，她虽然那么年轻，但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不真实性。

2.初到巴黎的美好

自从青春期开始以来，巴黎便是皮扎尼克梦中向往的地方。巴黎不仅有着迷人的风光，也是众多令她心仪的诗人和作家居住的城市。

在皮扎尼克大学毕业时，她已经出版了两本书，除了《最后的天真》以外，还有一本诗集《遗忘的奇遇》（1958），《时间》一诗便收录其中。这两本诗集的反响相当不错，皮扎尼克初步建立起了诗人的声誉。南美诸国的中产阶级向来有送子女到马德里、里斯本以及巴黎留学的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接近所谓的“教育旅行”，只不过现在添加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目的地——美国，这更像是一种“语言旅行”），加上皮扎尼克的双亲本来就来自欧洲，自从26年前移民新大陆之后两人再也没有回去过，她又有一个伯伯居住在巴黎，可以在生活上照顾她。因此，当皮扎尼克提出要去巴黎留学时，她的父母欣然同意了。

196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皮扎尼克乘坐一艘客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出发，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横渡大西洋的旅行，这也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南美知识分子要走的路线。相比之下，皮扎尼克选择的航路与前辈诗人博尔赫斯和聂鲁达有所不同。博尔赫斯和家人一起，首先抵达伦敦（他的祖母是英国人），然后才渡过英吉利海峡到巴黎，而他真正的目的地是日内瓦（他的父亲要在那里治疗眼疾）。聂鲁达是智利人，他首先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从那里坐船去里斯本，之后乘坐火车经由马德里到达巴黎，这一定是他故意绕弯了，因为他最后的目的地是缅甸，他只需要从地中海滨的马赛港出发就可以。

依据聂鲁达的自传记载，他乘坐的德国轮船曾停靠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博尔赫斯写过一首诗《达喀尔》，或许是因为他乘坐的轮船停靠过非洲的塞内加尔。而皮扎尼克的轮船有无停靠站我就毫不知情了，她留下的文字里也未提及这一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抵达的法国港口并非早年中国留学生必经的马赛港。那是在破晓时分，乘客陆续醒来，显得迟缓且疲惫，然后他们开始收拾好行李，早早地来到甲板上。在雾中，皮扎尼克第一次看见了法国（也是欧洲）的海岸线，轮船到达的是塞纳河的入海处——诺曼底的勒阿弗尔港。在第



皮扎尼克画作《双头人像》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勒阿弗尔港是美洲开来的船只抵达的主要港口，就像亚洲和北非的船只会首先抵达马赛港一样。即便在今天，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勒阿弗尔港仍是法国仅次于马赛港的第二大港，有通往英国和爱尔兰的定期航线。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德军入侵安特卫普之后，比利时的部分政府机构曾一度南迁至此。对皮扎尼克来说，勒阿弗尔港不只是巴黎的外港，也正是从这个港口，她的父母（还有母亲腹中的姐姐）匆匆登上了去阿根廷的一艘货船。稍事休息后，皮扎尼克和其他乘客一样，换乘吃水较浅的客船，沿着塞纳河去往巴黎。

最初，巴黎给皮扎尼克的印象非常美好，她时常一个人或与朋友一起在塞纳河边徜徉，或者到卢浮宫和其他美术馆消磨时光。说起艺术，她在大学时就曾师从一位名师学画，并一直坚持创作，她的画作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尤其是瑞士画家保罗·克利的影响，保罗倾向于使用在客观世界中可以被辨识的形体，例如飞鸟、鱼、树木、人体，以及风光。与出版过画册的美国女诗人毕晓普相比，皮扎尼克的绘画无疑更为抽象和现代。在抵达巴黎两年后，皮扎尼克出版的小册子《戴安娜之树》里有一首诗就题为《克利的一幅画》，在另一首献给西班牙画家戈雅的诗中，皮扎尼克这样写道：

黑夜里的一个窟窿

突然间被一位天使闯入

诗中提到的那位天使既可以是戈雅画中的，也可以是皮扎尼克本人。无论如何，诗人当时愉快美好的心情显露无遗。

3.拉丁前辈的呵护

巴黎从来都文人荟萃，聚集了从世界各地来的作家和艺术家，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来说吸引力很大。究其原因，法国与阿根廷、墨西哥这些拉美国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同属罗曼语族。在我看来，在同属罗曼语族的这个大家庭里，位居第二的意大利个性鲜明，才华出众且独往独来；最小的罗马尼亚从小被过继给了斯拉夫民族；西班牙和葡萄牙虽子女众多，却不尽责；唯有“长子”法国享有威望，照顾和影响着其他国家。皮扎尼克在巴黎郊外的伯父家里小住一段时间以后，搬到了市中心靠近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座公寓。她在索邦大学选修了几门课程，同时很快结交到了一批来自拉丁美洲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墨西哥诗人帕斯和阿根廷小说家科萨塔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与皮扎尼克年龄相对接近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刚刚返回南美，他和皮扎尼克一样，不经意间在巴黎逗留了4年。



皮扎尼克画作

1914年，奥克塔维奥·帕斯出生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4岁那年他进入墨西哥大学并开始文学创作，1937年他到马德里

参加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此后来到巴黎，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20世纪40年代他作为外交官出使法国、瑞士、日本和印度等国，20世纪60年代初他再度来到巴黎，直到1962年出任驻印度大使。帕斯当时的太太叫埃莱娜·加罗，并不是北岛见到并在其散文集《失败之书》里展示过玉照的那位法国女人马里耶·若泽。皮扎尼克和帕斯夫妇一见如故，他们经常在饭店或朋友家里举行聚会，这类聚会通常进行到深夜，这逐渐形成了以帕斯为核心的小团体。有时，他们也举办以巴黎为主题的绘画或诗歌展，吸引了各界人士参与，有拉美各国的文人、学者、外交官，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根据一位曾担任驻阿根廷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女士回忆，她是在自己家里举办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皮扎尼克的，陪同她前来的是一位热爱她诗歌的小说作者。这位女士认为皮扎尼克个性活泼，风趣幽默，还有一对让人羡慕的绿眼睛，让人怀疑她有阿拉伯血统。



青年时代的科塔萨尔

帕斯非常欣赏皮扎尼克的诗歌和写作才华，亲自为她的诗集《戴安娜之树》作序，并赞叹她的诗歌是混合了情欲的失眠和冥想的清醒之后的话语的结合体。皮扎尼克也赠送了一首诗给帕斯：“在河流的那一边坐落着紫丁香的花园/如果有人问起你的心何在，答案将是：/不在这里，而在那里，在河流的那一边。”在这里我想进行一个简单的推测，这条河流正是塞纳河，皮扎尼克当时住在左岸，而墨西哥大使馆则在右岸。帕斯在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期间，因为抗议政府镇压学生愤而辞职，他和皮扎尼克在巴黎共处的时间只有两

年。相比之下，另一位与帕斯同年出生的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早在1951年就移居巴黎了，他在写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皮扎尼克有很多帮助。科塔萨尔出生于布鲁塞尔，他的父亲是阿根廷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外交人员，4岁那年，科塔萨尔回到祖国，他在阿根廷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后来担任中学老师并从事文学翻译。作为“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主将之一，他的代表作包括可用两种方式阅读的开放式长篇小说《跳房子》。

值得一提的是，科塔萨尔在20岁出头时便与大文豪博尔赫斯交往甚密，曾被人视为博尔赫斯最得意的弟子，两人曾共同编辑《幻想文学作品选集》。或许为了避免某种不必要的尴尬，科塔萨尔承认在学识方面从博尔赫斯处获益匪浅的同时，也试图澄清，如果说到博尔赫斯的创作和意图的话，他们相去甚远。他同时指出：博尔赫斯给人的伟大教益是他的严谨，而不是他的主题。当然，也有批评家出来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博尔赫斯从根本上说是怀疑论者，不过他相信一切理论的美，而科塔萨尔却满怀希望，把他的怀疑论留给了理论。当博尔赫斯通过不可知论逃往他的美学时，科塔萨尔却在现实的弯道上，在人的心灵的角落里，在意识的疲劳中不屈不挠地寻找。科塔萨尔对皮扎尼克有一种毫无保留的感情，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津津乐道她所使用的奢华的纸和铅笔，而在一首献给皮扎尼克的激情奔放的诗中，又把她的突然出现比喻成令人致幻的宝石。

4. 一席流动的飨宴

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皮扎尼克和科塔萨尔的人来说，是无法了解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的，两人的年龄差距超过20岁，一个写简短的诗歌，另一个写长篇小说，他们却有着内心深处的那种知性的一致。

一位与皮扎尼克一起乘船来巴黎的阿根廷人亲眼看见，科塔萨尔有一次到波士顿参加一个笔会时，特意去文具店为皮扎尼克选购笔记本，那是一种外面用黑封皮、内部是纯白纸张的笔记本。那时，皮扎尼克在索邦大学学习法国宗教和文学史，她还写诗，参与编辑杂志。在与拉丁文人交往的同时，她也结识了一些法国诗人，包括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布勒东。从大学时代开始，皮扎尼克就翻译过布勒东和他的战友艾吕雅的诗歌，皮扎尼克到巴黎时他已处于生命的暮年。来到巴黎后，皮扎尼克又喜欢上阿尔托、米肖、塞泽尔和博纳富瓦的诗作，并开始着手翻译。与布勒东同龄的阿尔托多才多艺，他不仅是诗人和作家，也是演员和剧院创建者。他的见解对后辈剧作家如让·热内、尤内斯库和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影响重大，也是皮扎尼克精神上的父亲之一。



行李传输带上的科塔萨尔作者摄于法兰克福

遗憾的是，阿尔托终生被精神疾病折磨，曾数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在皮扎尼克来巴黎之前的12年便已谢世。需要补充的是，阿尔托也是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在他生命的后期，他把精力投入到戏剧制作和电影表演中，并亲自创建了一所剧院。从皮扎尼克所翻译的诗人名单可以看出，还是超现实主义诗作最让她感到可亲，超现实主义给她带来的新鲜感和影响力在她与那些主要代表诗人的亲身接触中丝毫没有减少。超现实主义的革命性贡献并非自动写作，而是把生活转化成诗歌的激进姿态，是对资产阶级僵化的社会习俗的挑战，并打开了潜意识和梦的大门。这一极度虚幻的自由指引他们抵达了“超现实”

的炽热核心，他们消灭了主体和客体、内部和外部以及生活和诗歌的距离。这种自由既为皮扎尼克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美学图景，同时也导致了她的青春期反世俗的个性。



皮扎尼克自画像

不过，对皮扎尼克来说，更多的时候，巴黎是一艘失控的船只和一块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土地，皮扎尼克在这个孤独的领地里自由生长，她有时一整天不吃饭，也不外出，关在屋子里写作或阅读，直到天明。在那些漫长的周末或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的失眠的夜晚，她是那样地孤独。那段时间，她除了大量地阅读以外，就是写作诗歌、散文和日记。陪伴皮扎尼克后半生的失眠症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幸好那时皮扎尼克住在巴黎的市中心，靠近圣米歇尔广场。附近街道和店铺的名字令人着迷，尤其是一家名为花儿的咖啡店，正是在这家咖啡店里，皮扎尼克被一双美丽的蓝眼睛给迷住了，那双眼睛归一位叫乔治·巴特勒的年轻画家所有。他们时常在塞纳河畔徜徉到黄昏，或到卢浮宫或其他美术馆消磨时光，可惜好景不长。在我看来，孤独和与情侣交往且互相陪伴的生活都是艺术家需要的，也是最富有激情的，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生活。皮扎尼克后来也承认，她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在皮扎尼克的朋友中，流传着她的一句口头禅：un joven bellísimo，意思是：一个绚烂的年轻人。她通常用这句话指代那些对她来说有吸引力的男孩。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出，她当时的心态是

比较开放的。另外，从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来看，皮扎尼克并不属于美女这个范畴，从她的朋友的评价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可是当你一旦开始与她接触和交流，领略到她的才智之后，你就会被她深深地吸引住。关于皮扎尼克巴黎时期的爱情生活，我们无法细致地了解。在这里我想抄录她在巴黎期间写的一首小诗《情人》：

一枚鲜艳的花朵

离黑夜不远

我无言的躯体

急切地打开

朝向露水的娇嫩

在20世纪50年代，旅居巴黎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如果你够幸运，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它将永远跟随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飨宴。

5. 重返阿根廷

1964年，皮扎尼克返回了阔别4年之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巴黎活跃的先锋派艺术气氛相比，她的故乡更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当时英国甲壳虫乐队的歌声正飘扬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姑娘们变得大胆放肆了，超短裙在街头忽隐忽现，时髦女郎和模特骄傲地把大腿展露无遗。可是，在文学、戏剧和绘画领域，新精神只是露了个脸，尚无法与巴黎相比。三年前，博尔赫斯因为获得福门托奖蜚声欧美文坛，不断地接受邀请出访，那年春天他在从前一位女学生的陪同下，先是去联邦德国参加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同行的有危地马拉小说家阿斯图

里亚斯。接着，他来到巴黎，和翁加雷蒂一起出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纪念会。即使如此，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艺术氛围也与巴黎大不相同。皮扎尼克回到故乡时，只是一个28岁的大学生，要是若干年以前，她大概还属于博尔赫斯喜欢追逐的那类有几分姿色的文学女青年。当然，皮扎尼克也绝不是那种愿意为了一点儿名利和虚荣心就会奉献自己的女人，她把诗歌和写作看作一项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

皮扎尼克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因为父母的再三要求，在她母亲看来，皮扎尼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原先，皮扎尼克的妈妈一直把小女儿当成一个男孩子来看待，没想到文科教育和巴黎并没有将她改造成淑女，如今已经到了非“变性”不可的时候了。从皮扎尼克回家那天，催婚的压力就使她喘不过气来。而她父亲的眼光更为敏锐，他发现女儿不仅没有拿到新的文凭，神态里却已经有了为诗歌献身的迹象，这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愤怒，早些年的宽容大度逐渐变成了严厉和斥责。皮扎尼克的内心突然平添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因为经过了巴黎4年的生活，她已经属于那种完全把写作置于生活之上的人，尤其是在那些虚幻的夜晚，为了探索知觉的前沿，她从事波德莱尔所说的“天堂的艺术实验”。毫无疑问，皮扎尼克认为诗歌要求绝对的自由，1962年冬天，她在一则日记里这样写道：“诗歌与任何事情、任何地点都有关系，尤其可能与爱情、幽默、自杀或其他颠覆性的行为发生联系。”

幸好，在自己的家乡，皮扎尼克有像奥洛斯科那样真正关心她的前辈诗人和朋友，在她旅居法国期间，这位文学上的教母也曾来到巴黎。我见过两人在卢浮宫广场长椅上的一张合影，那种几乎一致的姿态和神韵表明两个人之间真诚的友谊和亲密。与此同时，皮扎尼克的诗歌也获得了圈内同行的认可和赞扬，许多文学杂志开始频频发表她的诗歌和散文作品。皮扎尼克的声望迅速攀升，尤其在年青一代文学青年中，她就像早年从欧洲归来并出版了处女诗集后的博尔赫斯一

样。尽管皮扎尼克遇到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和种种不愉快，但她的写作状态依然很好。同时，她也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包括在咖啡馆和画廊里的沙龙，乡间别墅里的聚会，她尤其喜欢去佛罗里达酒吧街，那里云集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色面孔，从显贵人物到或单纯或堕落的少女，每个人都在那里摘下了自己的面具。每逢周末，狂欢的年轻人把街道挤得满满的，令皮扎尼克不由得想起了巴黎的圣米歇尔广场。

皮扎尼克的内心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多面体，虽然失眠和爱情的不如意让她度过了无数个不眠或疯狂的夜晚，但她的精力并没有被那些冷嘲热讽的激情和酒精耗尽。为了写作和独立生活的需要，皮扎尼克离开父母，独自搬到蒙得维的亚街980号，那是离港口不远的圣尼古拉斯街区的一座出租公寓，她在那里继续不懈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方面，她难以拒绝周围事物的诱惑，另一方面，她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栽种到荒凉的土地——那些无处可以依托的语言之上。她像牧师一样默默地奉献自己的智慧，绝不像某些丑陋的诗人通过非法手段谋取名利。一般来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现今的世界里，往往只受到很少的关注，其作品被批评家们偶然提及，或放置在教科书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幸好，还不断有年轻的一代诗歌读者出现，诗人才能获得尊重。也就是说，诗人通过消耗生命来树立声誉，但这必须建立在有价值的作品的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同辈诗人会消失不见。

6.《工作与夜晚》

1965年6月，南美洲出版社推出了皮扎尼克的新诗集《工作与夜晚》。这部堪称力作的诗集一如既往地构建了灵巧的诗意空间，明亮

可触的词语获得了意味深长的效果，只是写作手法更加圆润了，如下面这首《遗忘》，这是拉丁人无法回避的一个诗歌主题：

在黑夜的另一头

爱情是可能的

——带我去吧——

带我到甜甜的蜜汁中

在那里你的记忆会逐渐消退

又如另一首献给女友爱娃·杜雷的小诗《从前》，诗人只用了短短20来个字（在西班牙语里只有10个词），便把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在阅读以后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温馨，一颗烦躁的心顿时沉静了下来，且让我若有所思。

歌唱的树林

鸟雀隐约可见

我的眼睛是那

小小的笼子

诗中最后一行里的“笼子”和《遗忘》里的“蜜汁”一样，是皮扎尼克诗歌中的亮点和必要的张力，这也是她的艺术特色。她经常通过使用一个分量重一些的词，使一首小诗获得一种平衡。

从题材上看，皮扎尼克的这部诗集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情诗，以上引用的两首诗便属于此列，这方面她可谓是一个高手。



《工作与夜晚》初版封面（1965）

第二部分表现的是逝去的世界，或者说是死亡，因此书名中的“工作与夜晚”，其含义实际是指“爱情与死亡”。这让我想起威尔士诗人狄兰·托马斯，这位与帕斯和科塔萨尔同龄的坚定不移的酗酒者有一部力作名为《死亡与出场》。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写：任何想法，不论它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都可以形象地加以描绘，并且可以用身体的动作表现出来。在我看来，皮扎尼克也有类似的自信，只不过她没有用身体的动作，而是用心灵去感应。例如，皮扎尼克有一首别出心裁的诗《寂静》这样写道：

死神依然没有走远。

我在倾听他的说话。

只有我听见了。

这首诗仿佛是婴儿王国里传来的天籁之声，或幼童在白纸上描出的美丽画卷。

在一首名为《遗弃》的诗中，皮扎尼克写到一片人迹罕至的土地，最后三行是这样写的：

只有鲜红的音乐

敢于定居下来

在一个如此空旷的地方

正是“鲜红的音乐”这个突如其来同时又让人想入非非的短语，赋予了整首诗歌以生命的活力。这是皮扎尼克给人带来惊喜的地方，可以说，皮扎尼克有些诗的主题产生于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地方，却被其他人忽视或遗弃了。

7.失眠的女人

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皮扎尼克始终保持着童年的视角，她内心深处充满活力和敏感的那一小部分一直没有长大，她明显属于有着“迟缓的童年”（infancia proiongada）的那一类人。正是这个因素，使皮扎尼克的诗歌蕴含了一种神奇诡秘的想象力，并充满了幻觉、冒险和死亡的诱惑。在写作文本上，皮扎尼克致力于表现对忧愁的调节和对死亡的谋划，而形式则是次要的，如同她在一首诗中所写的：“不知是鸟还是笼子/是行凶的手还是年轻的死者”，“而张口如喷泉的女骑手/或许是街头艺人/或许就是站在高塔上的公主”（《形式》）。这些有着“迟缓的童年”的人，如同安东尼奥·阿尔托在评论凡·高时所说的：他们既是堕落的天使，又是有洞见力的人，既是疯狂的人，又是孩子，既是智慧的人，又是杀手。

在很多诗人身上都出现了“迟缓的童年”这一现象，中国诗人顾城就是一个例子。直到年近不惑，他仍生活在童话王国里，最后因为他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他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用斧头砍死妻子后自尽，成了阿尔托所分析的那类杀手。曾到访阿根廷的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夫妇也有类似的结局，但那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且

两人是双双服药自杀。不仅如此，在皮扎尼克身上还有一种孤儿的宿命感，这也许是她孤独的真正源泉。1961年，她在巴黎的一则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充其量是一个安静、耳聋的孤儿，下跪和摔倒的女儿”。也就是说，从她的婴儿时代起，她作品中死亡和个人化的主题就得以确立了。还是在《工作与夜晚》这部诗集里，有一首诗《节日》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被忧郁症困扰的皮扎尼克

我把孤儿身份打开来

在桌子上，像一幅地图

自从青春期以来，皮扎尼克就患上了一种让她无法摆脱的周期性抑郁症。据说在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就带她去见过心理医生。可是，我想这类有着艺术家倾向的精神异常是无法通过正常手段治疗的，唯有创造性的写作才能让她避免变得疯狂或者崩溃。不过，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可以通过灵性的交流让他（她）的病人获得某种安慰。成年以后，皮扎尼克也感到自己有这种需要，不过在巴黎期间她的治疗暂时中止了。当她回到故乡以后，人们又偶尔看到她和心理医生在文人墨客云集的火绒草饭店里共进午餐或晚餐。在抑郁症发作期间，皮扎尼克通过写作或与朋友聊天来缓解病情。她羞于在公共场所露面，但却喜欢出席小型的朋友聚会。她经常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袍，手持一朵红玫瑰，发表一些让人捧腹大笑的夸张谬论，制造出一种轻松神秘的氛围，她的“表演”或即兴或有“预谋”。除了文人圈子里的交往以外，她还与一位画家朋友在一座叫“工厂”的画廊举行了联合画展。



皮扎尼克画作及散文全集封面

在皮扎尼克的心理医生里，有一位是她的朋友马塞罗的父亲，马塞罗也是一位诗人，看起来他就像是皮扎尼克亲密无间的小弟弟（她身边这样的男孩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不仅在于直觉和阅读，更是他们对超现实主义的爱。在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世界里，语言与现实世界是分离的，事物表面的真实部分被谋杀或剥离了。在符号化的想象和词语的世界面前，语言和使用语言的人都容易患上失眠症。与此同时，爱、痛苦、过失、怨恨与感情的冲突，也在蔓延。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认为，诗人在挑选词语的组合时，容易产生两种错乱，即“相似性错乱”和“邻近性错乱”。这两种错乱正是失语症现象的典型表现，而失语症与长期失眠密切相关。作为“语言的炼金术士”和“为赋新词强说愁者”的诗人，最容易被失眠所困扰。事实上，皮扎尼克与博尔赫斯一样，患有多年的失眠症。只不过，皮扎尼克的自制力差一些，药物对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可能还有减肥药），以至于有朋友戏称她的公寓是一个药铺。

8. 奢华的一族

博尔赫斯年轻的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好几家并驾齐驱的先锋派杂志，如《马丁·菲耶罗》《船头》等，而当皮扎尼克“出道”时，就只有《南方》一枝独秀了。皮扎尼克除了通过为《南方》杂志和某些报纸的文学副刊写稿或翻译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稿费以外，她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她父母的赞助。通过《南方》杂志，皮扎尼克与阿根廷的知识界和文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一些来访的国外著名作家，如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和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尔。皮扎尼克在巴黎时，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当人们初次看见她时，觉得皮扎尼克长相平平，但当她开始说话时，她就显得迷人了，变得容光焕发，魅力无穷。她的声音、眼神和从那里面发出的光芒，会在她的周围营造出魔术般的光环，仿佛洛特雷阿蒙笔下穿越梦幻风景的少女。这个有着迷人魅力的黎明般的女子，懂得巴黎的时尚和社交礼节，被叶夫图申科盛赞为“奢华的一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位接近皮扎尼克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都会被她吸引。

在《南方》杂志社举办的叶夫图申科欢迎会上，阿根廷各界知识名流云集，英俊年轻的诗人被众人环绕着，但皮扎尼克还是获得机会，和叶夫图申科单独聊了半个钟头。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父辈都来自乌克兰，虽然叶夫图申科不是犹太人，但也一直为这个民族遭受的苦难感到愤愤不平并大声呐喊，他的长诗《娘子谷》（1961）便是为了追悼被纳粹屠杀的3.4万犹太人，据说其中包括皮扎尼克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因此，叶夫图申科与小他三岁的皮扎尼克的共同语言就不只是诗歌了。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叶夫图申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

失踪了。既好奇又嫉妒的人们普遍猜测，这两位诗人之间有过亲密关系。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德国诗人汉斯·马格努尔·恩岑斯贝格尔来访之时，恩岑斯贝格尔既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又是一位颇有争议的随笔作家和政治思想家。有一天晚上，他也突然人间蒸发了。后来人们发现，在皮扎尼克的书房里，摆放着一本汉斯献给她的著作，和一期刊登他作品的《南方》杂志，目录的名字被画上了着重号。



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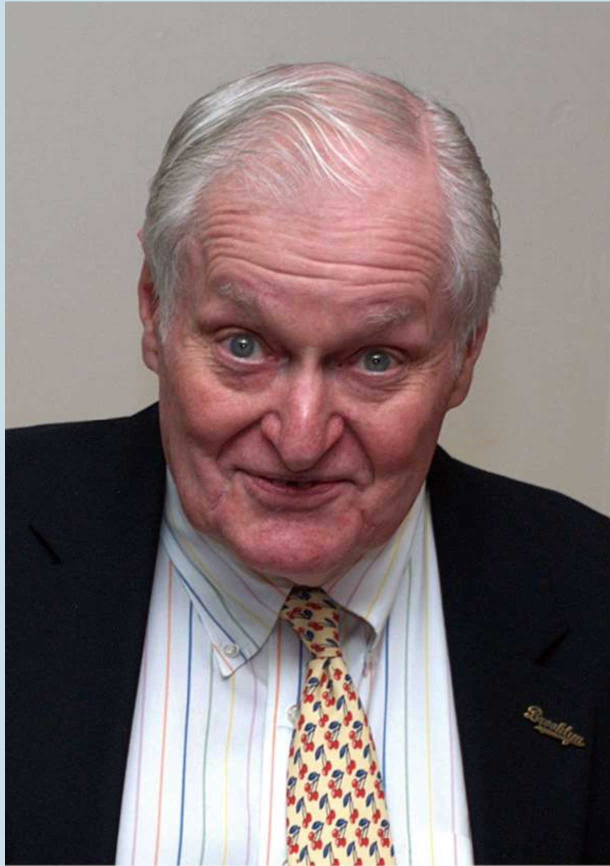
1933年，叶夫图申科出生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靠近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小镇济马镇，双亲是乌克兰流放者，他写成的第一首叙事诗就叫《济马车站》，那也是他的自传体长诗。叶夫图申科就读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在斯大林死后成名。他一方面秉承前辈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豪放、粗野的语言，另一方面又恢复了早期俄国抒情诗和爱情诗的传统。叶夫图申科是苏联新一代诗人公认的领袖，他有很多机会到欧美旅行和朗诵诗歌。但当他于1963年在巴黎（那时皮扎尼克也在）出版《早熟的自传》以后，出访的特权被取消了。直到他为一座水电站的建设写下一首赞美诗，才被获准再次离开他的祖国，他来到阿根廷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叶夫图申科既保持了对自己独立思考的态度，又不愿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这正是他内心矛盾和引发争议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恩岑斯贝格尔虽然比叶夫图申科年长4岁，但却更具现代感。他出生在德国南部的考夫博伊伦。他的一句话曾被多位中国诗人和学者引用：诗歌不再是民族主义的，现代诗中的大师，从智利到日本，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远远超过那些炫耀民族精神的作家（引自《现代诗的世界语言里》）。我认为这番话明显是冲着德语文学的权

威——歌德。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德国文坛分成了两个阵营，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站在美国这边的援战派主将竟然是“左派”作家的领袖恩岑斯贝格尔。值得一提的是，恩岑斯贝格尔还是一位实验诗人，他曾为激光可视图像写作了两首诗《全息图》。第一首的德文开头是“Dieser Satz hier liegt in der Luft（这一句话躺在空中的此处）”，第二首的英文开头是“It is easy to build a poem in sky（在天空建立一首诗是容易的）”。这是一种试图让词语离开书页进入到空间的新尝试。

2003年春天，杭州

“你将是杜甫，我是白居易”



纽约的阿什贝利（2010）

2017年9月3日清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纽约派诗人领袖约翰·劳伦斯·阿什贝利在纽约州哈德逊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按照英国《卫报》的报道以及他家人透露，诗人并未患上某种不治之症，而是自然死亡。生前，阿什贝利几乎赢得了美国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也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76年，他的诗集《凸镜里的自画像》注囊括了美国三大诗歌奖——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1927年7月28日，阿什贝利出生在纽约州的大学城罗彻斯特，在安大略湖畔他父亲的农庄里长大，他的外公是罗切斯特大学教授，母亲是生物老师，他唯一的弟弟小时候因患白血病去世。阿什贝利在迪尔费尔德中学上学，并开始了诗歌创作。在哈佛求学期间他读到英国诗人奥登和狄兰·托马斯的作品。他的处女作是两首发表在《诗刊》上的诗作，由一位同学投寄给这家名刊，因为没写明作者，发表时署了这位同学的名字，而作者阿什贝利并不知情。

最初，阿什贝利想成为画家，他在少年时期每周去罗彻斯特城的艺术馆上美术课。这一点，也许帮助他日后成为纽约派的中坚力量。1949年，阿什贝利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毕业论文的主题是奥登，大学期间他与弗兰克·奥哈拉、罗伯特·勃莱、罗伯特·克里莱、肯尼斯·柯克等诗人多有交往，其中阿什贝利、奥哈拉和柯克后来成了纽约派诗人三巨头。毕业后，阿什贝利先是在纽约大学短暂就学，后在195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比他大两岁的柯克则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40多年，他和阿什贝利都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

毕业以后，阿什贝利在纽约一家出版社做了几年广告文案。1955年，他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开始崭露头角。他随后成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巴黎工作、生活了约10年，柯克则分别在巴黎和罗马居住过。阿什贝利在从事艺术批评、编辑艺术杂志等工作之余，创作了多部诗集。回纽约以后，一如既往地写作、交游、生活。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纽约派诗人的名头已经叫响。除了奥哈拉、阿什贝利和柯克，还有詹姆斯·斯凯勒、芭芭拉·格斯特等10多位诗人。其中斯凯勒出生于芝加哥，曾获得1981年普利策诗歌奖，格斯特1999年获得弗罗斯特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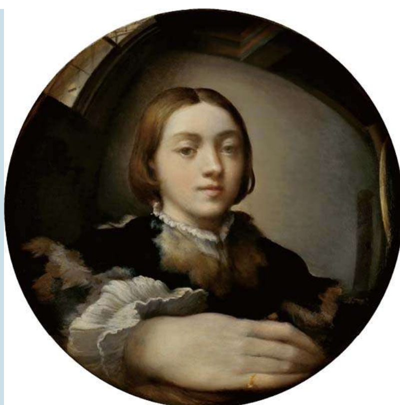
说到纽约派，它与旧金山的垮掉派、波士顿的自白派、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派，以及新超现实主义、黑人诗歌等流派组成美国当代诗

歌的万花筒，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诗人。最大的不同是，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中心之一，纽约派有它的气度，这一流派不仅有诗歌，还包括绘画（行动绘画和抽象表现主义）、音乐（爵士和实验音乐）、戏剧（即兴剧，目前开始在中国流行）等。

在纽约派内部，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艺术家、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借鉴，这一点很值得中国的“海派文人”学习。例如，斯凯勒与柯克合写过诗歌，与阿什贝利合写过小说，与奥哈拉合作过歌曲，而画家拉里·里弗斯为他们都画过肖像。阿什贝利对约翰·凯奇的“机遇”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他还把画家波洛克的行动绘画与德·库宁的抽象表现主义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常来参加纽约派的诗歌朗诵会，而纽约派的代表人物奥哈拉本人生前曾担任赫赫有名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阿什贝利诗集《凸镜里的自画像》封面



帕米贾尼诺绘画作品《凸镜里的自画像》（1524）

奥哈拉比阿什贝利年长一岁，他出生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在马萨诸塞州长大，曾在波士顿学习钢琴。“二战”期间，他在南太平洋和日本服役，在驱逐舰上当声呐兵。复员后他进了哈佛大学，并结识阿什贝利、柯克这批诗友。他成了纽约派的领袖，把诗人、艺术家团结在身边，却不幸于1966年死于车祸，年仅40岁。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初访美国时曾想编译一本美国当代诗选，为此给柯克写过信，他回复说可以无偿授权，并告之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有他的中文译者。后来，我曾去长岛奥哈拉遇难的地方凭吊，但不记得我有没有给阿什贝利去过信了。

阿什贝利的诗风往往被批评家认为过于晦涩，几乎是“文字的抽象画”。这是他的独特之处，但也是他的知名度难于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原因，相比文风口语化、直抒胸臆的“垮掉的一代”，阿什贝利的影响力更多是在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诚如《纽约时报》的悼文所指出的，与其他诗人不同，“阿什贝利只因一件事出名：写诗”，“最重要的是，阿什贝利的诗歌有他的标识度。他自创了一个传统。赞扬某个人，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无人能出其右；但是，说到阿什贝利，确实无人敢望其项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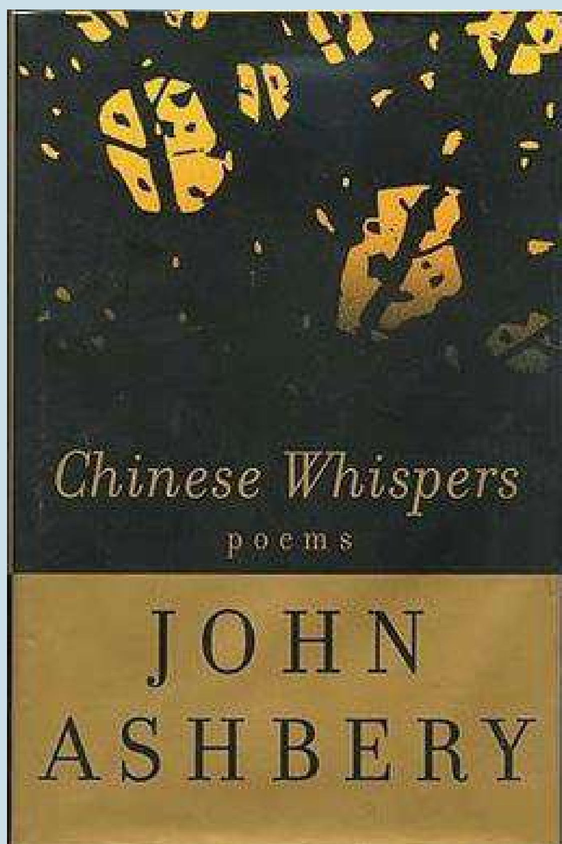
2013年，我曾在纽约参加过“嚎叫诗歌节”，发现“垮掉的一代”在东部的影响力正在扩张，或许他们更接地气。事实上，即便是

同属纽约派的奥哈拉、柯克等人的诗风也与阿什贝利相去甚远。奥哈拉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纽约的街景和下层人物的遭遇，有时采用爵士乐的节奏，开创了反高贵、反文雅的诗风。例如，他有一首名为《诗》的短诗，写他在去看朋友的路上，下起了雪和雨，突然传来消息，著名影星拉娜·托纳精神崩溃了："……突然 /开始下雨和雪 /你说是下冰雹 /冰雹应当打头 /所以还是下雪 /和下雨……"


年轻时的阿什贝利和奥哈拉

其实，阿什贝利的诗歌偶尔也有奥登式的机智，"议论的发辫 /松散了……"，"爱情在短时间里 /将一切来去的事物变得模糊"，"时光是一贴乳剂，也许不想长大 /对我们来说是最聪明的成熟"。只是，这样的诗句并不多见，一如他内向性格里罕见的冲动。2005年，诗人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被问及他的诗歌语言是否容易解读，他回答："哦，有人告诉我它们实在是不知所云。"之后他又说："这些诗歌要表达的，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隐私，以及我们思维的某些困境。"尽管如此，至少在美国诗坛，"阿什贝利却是迄今为止被模仿得最多的一位诗人"。

在拙编《现代诗110首》蓝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里，收有阿什贝利的名诗《一些树》，由赵毅衡翻译、张曙光评注；拙著《漫游之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里，收有杨小滨译注的阿什贝利的5首诗歌；在拙著《与伊丽莎白同行》（花城出版社，2007）里我曾写到年轻时奥哈拉和阿什贝利的逸事，并引用了前者写给后者的一首诗，"我们将在/风吹拂的高山之上/相对而坐，互诵新作。/你将是杜甫，我是白居易"。而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代诗歌的赏识，原本以美国西海岸诗人最甚。但愿他们在天国，能够再次相遇成为诗友。



阿什贝利诗集《中国私语》封面

“当今英语诗坛，没有人能够像阿什贝利那样，以诗歌超越时间的沉重审判。”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姆·哈罗德如此评述道。2008年，耶鲁大学英语系主任朗登·哈默教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过去50年里，没有人像阿什贝利那样对美国诗歌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我认为当代中国恰好缺少这样的诗人），也没有一位美国诗人拥有阿什贝利那样丰富的词汇，他的诗歌不受语言学的束缚。而哈佛大学斯蒂文·伯特教授则把阿什贝利与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相提并论，称他是最后一位让一半英语诗人顶礼膜拜，另一半诗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诗人。

2017年9月，杭州

---

1. 《凸镜里的自画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帕米贾尼诺（1503—1540）21岁那年的自画像和代表作，艺术史家瓦萨里见到后惊呼拉斐尔再世！帕米贾尼诺是最早尝试数学主题的画家之一。

罗马，一次不经意的探访



罗马火车站 作者摄

第一天·星期六

1.最后的旅行

子夜时分，“空中客车”飞机在虹桥机场升空时，上海西郊笼罩在一片淡雾之中，离开地面的那一瞬间，我想到这一定是我在20世纪

最后一次远行了。在相隔4年以后重访欧洲，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袭上心头。巴黎虽然在布鲁塞尔以南300千米处，这架班机的航线却更为偏北，这超越了我以往的经验和想象力。飞机斜穿了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的西部，两次越过注入北冰洋水系的鄂毕河，这条欧亚大陆上最长的国际河流发源于阿尔泰山脉，上源是中国境内的额尔齐斯河，新疆人因这条河经过而有幸能品尝到原产于北冰洋的大红鱼。俄罗斯的地名和人名一般比较长，可鄂毕河在英语里仅有两个字母（Ob）。大约7.5个小时以后，我们飞抵了沙皇时代曾是俄罗斯政治中心的圣彼得堡上空，这样就错过了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取而代之的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前者的本意是水边的居住者，后者的首都里加素有“欧洲美人”之誉。

2.波罗的海

又是一个漫漫长夜，飞机到达里加湾时，机窗外面才初露曙光，随后我们便见到了暗绿色的波罗的海和隶属瑞典的两个狭长的岛屿，其中的厄兰岛比起纽约的长岛来更像一把匕首。哥得兰岛是波罗的海的克里特岛，这里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罗马人的遗迹，绵延不绝的石灰岩峭壁，以及北欧海盗遗留下来的埠头和据点。现在，这两座岛已成为瑞典人的度假胜地，甚至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他们的邻居挪威人出国度假的比例更高。与南方的地中海相比，波罗的海不仅面积小，名声也小了许多，这里面固然有历史的原因，它的名字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波罗的海在北欧古文里的意思是腰带，而在德语里干脆就叫东海。这个名字缺乏“地中海”那样的诗意，倒是在汉语里的发音更动听些。同时，这也使我想起北京的颐和园，它在英语里被译成“夏天的宫殿”，与圣彼得堡的冬宫相映成趣，难怪其知名度远超过国人所钟爱的西湖。

3. 康拉德世界

我望着窗外的景色出神，邻座的法国海员亨利却对这一切视若无睹，他正在捧读约瑟夫·康拉德的一部小说。亨利受雇于一家跨国公司，年初开始在黄海和东海上作业，铺设连接中日韩三国的海底电缆，此番回国是为了休假。康拉德是波兰人，出生在波兰，以法语为第二语言，最后加入了英国籍。他是一位能干的水手，获得过英国政府商务部颁发的船长证书，并在刚果河上付诸实践。在汽船出现之前，康拉德乘坐带有浪漫色彩的帆船，四处航行，不过，“康拉德世界”指的是围绕着爪哇、英属马来亚、苏门答腊及菲律宾在内的东印度群岛，这个地区至少为他的三部小说提供了写作背景。当然，我们也谈到了赫里曼·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甚至查尔斯·达尔文，可亨利坚持认为，康拉德是最受全世界水手们追捧的作家。考虑到康拉德对后世的影响，安东尼·伯吉斯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把他看作一个爱写冒险故事的作家。

4. 曙光重现

让人意外的是，飞机在越过丹麦之后，径直向南飞，在易北河下游的汉堡进入了德国，与此同时，曙光逐渐变暗，直至完全消失，我们又回到了黑暗之中。我在一个小时里经历了两次黑夜，那一刻我想到的不仅有一个月后将要上演的日全食，还有挪威北极圈内个别永无黑夜的村落，这两桩奇事也只能发生在夏天。在穿过不来梅和汉诺威之间的下萨克森州后，我们抵达了鲁尔工业区的三大重镇：多特蒙德、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上空，东方再次出现了曙光。莱茵河畔的波恩城隐约可见，这个月德国政府将东迁至柏林，原来的首都波恩会恢复成为一座小镇吗？那正是波恩的名字在凯尔特语里的原意，据说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为之命名。在最后的航行中，小国比利时

迅速到来又立即逝去，黎明终于又出现在窗外，凌晨5点15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巴黎北郊的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

5. 日内瓦湖

今天是周末，巴黎的市民和游客仍在酣睡，我电话叫醒了其中的一位单身汉——张亮，巴黎大学建筑学博士候选人。那情形颇有点儿残酷，谁让我们分别已有8年多了呢，至于我们的见面，还要再等上两个星期。1小时以后，我乘上法航的一架早班飞机，又过了1个小时，我已经到达日内瓦的上空，飞机从瑞士西南的一个小角落穿过，从空中往下看这座名城和以它命名的湖泊清晰可辨，这次会面颇让我感到意外。瑞士是这样一个国家，它让你忘却每一位王公和权贵，却可以无私地为各国处境危难的人士提供可靠的庇护。例如，因针砭时弊被迫流亡的伏尔泰，出版了小说《爱弥尔》后被通缉的卢梭，因私生活屡遭攻击愤而出走的拜伦，为了爱情与女友私奔的雪莱。在20世纪，也有两位大文豪钟情于此，乔伊斯在辞世前一个月迁居苏黎世，博尔赫斯临终时请求把遗骨埋在日内瓦湖畔。可是，也正是由于瑞士的中立国身份，它当时还没有加入申根国家组织，这使我在当时无法造访它。

6. 到达罗马

离开日内瓦才10分钟，飞机已掠过一片白茫茫的雪山之上，想必这便是著名的阿尔卑斯山脉了，从尼斯到维也纳，它蜿蜒经过了5个美丽的国度，与蓝色的多瑙河相汇合。播音员用三种语言广播说，右侧可见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勃朗峰，可是很少有人把头探过去。我们飞越的第一座意大利城市是热那亚：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马可

·波罗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游记，出生于这座城市里的最重要的人物则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4年前的那个夏天，我曾在离热那亚不远的一座边境小镇逗留过10分钟。瑞士画家保尔·克利在这个世纪初游历了意大利，那时他刚20岁出头，正侨居慕尼黑习画，完全一副学生模样和装束。保尔·克利是从热那亚坐火车去罗马的，在他潦草无序的日记里，有一句话让我不得不记住：火车驶往罗马，太动人了。而今天，我却从空中逼近罗马，虽然也是沿着地中海滨，所见的除了岛屿就是沙滩了。

第二天·星期天

7.牙买加旅店

昨日从罗马的达·芬奇国际机场乘快速火车抵达市中心，在跨越台伯河的瞬间眼睛一亮。我在火车站附近的格莱纳街找到一家小旅店，毋庸讳言，旅店的名字牙买加帮助我做出了选择，这倒并非是短跑女皇奥蒂的缘故。这是因为我在美国佐治亚大学访问期间，每逢放春假，学生们首选的旅行目的地就是牙买加，其次才是百慕大群岛和佛罗里达州。在洗过热水澡以后，我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已是深夜。我打开电视，共有几十个频道，但我就是见不到女足世界杯决赛的镜头，看来足球王国也有性别歧视。我无意中看完了美洲杯的一场淘汰赛：秘鲁对墨西哥，另有一个频道专播自行车比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则电视广告是关于按摩油的：一只毛茸茸的手翻来覆去抚摸一位少女裸露的胸部，那位美女一脸幸福的表情。今晨再次醒来，一桌丰盛的早餐已摆放好，还有水果和咖啡，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时差反应。

8. 泰米利火车站

虽然我不懂意大利语，却也能猜出泰米利的意思是终点。罗马位于亚平宁半岛的中央，很自然地成了全国的交通枢纽。泰米利车站地处首都的中心，当时罗马仅有的两条地铁线在这里交汇，其形状犹如儿童描绘的罗马字母X，发往海滨机场的专列也从这里出发。不过，泰米利车站的客流量仍不及巴黎北站，而巴黎北站只是巴黎6个始发车站之一。我本想利用今天难得的空闲去那不勒斯一游，可是想到那附近还有古城庞贝和迷人的卡布里岛（有一首探戈舞曲以它命名），一天时间远远不够，只得放弃了这个念头。在车站广场逛了一圈，我发现这座城市的一个秘密，大多数街道由圆锥形的黑石块铺成，中间辅以沙子，这大概是意大利人懒散的一个佐证。虽说易于施工，却使过往车辆饱受颠簸之苦，尤其是罗马人爱骑摩托，又不愿意戴头盔，以致该城车祸的发生率在世界各大城市中名列前茅。

9. 数学家的盛会

两年一度的欧洲数论会议第一次在意大利举行，同时也是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首都举行，罗马风雅的名声吸引了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数论学家。我在午时到来之际离开了牙买加旅店，乘B线（蓝线）地铁来到城南台伯河畔的圣保罗旅店，会议的报到处设在这里，这也是组委会为部分代表提供免费食宿的地方。我在程序册上只发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展涛，他是我的同门师弟，目前担任我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副校长。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西西里岛对岸的突尼斯也来了5位同行，这个历史上被称作迦太基的小国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宿敌。它们的民族英雄汉尼拔在公元前三世纪率领一支军队，沿着后来阿拉伯数字传播的路线，从陆路长驱直入意大利，并且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所向披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的意大利人还不够大度，没有为

汉尼拔竖立一块纪念碑，倒是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有一座小镇以他的名字命名，那正是马克·吐温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10. 西班牙广场

一切安排就绪后，我独自乘坐地铁抵达西班牙广场。17世纪以来，这里就是罗马著名的文化区，它得名于南侧的西班牙总督府旧址。不仅各国王公贵族在此下榻，更有历代文化名流云集于此。英国诗人丁尼生、拜伦，法国画家普桑，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德国诗人歌德，丹麦作家安徒生，均在附近居住过。但对普通游客来说，西班牙广场最引人瞩目的是气势非凡的100多级台阶，中间栽满了鲜花，分成上中下三级，与山顶的圣三一教堂相对应。这些台阶建成已近三个世纪，如今它作为时装表演的舞台，频频出现在电视镜头里，我想这对于模特们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确实，我刚走到一半就止步了，回到广场中央的船形喷泉边静坐，蓝色的池水容易引发人的遐想。这个喷泉由著名的建筑师兼雕塑家贝尼尼设计，贝尼尼的父亲也是一位雕塑家，这对父子为罗马所做的贡献，比起音乐家施特劳斯父子为维也纳所做的贡献来有过之无不及。

11. 名字写在水上

紧挨着西班牙广场的台阶，离船形喷泉10多米远的地方便是英国诗人济慈的故居，他因为照看生病的弟弟被传染上了肺结核，在雪莱的盛情邀请和医生的嘱托下，于1820年离开潮湿的伦敦到罗马疗养，一年后病逝于罗马。后来，济慈葬在罗马西南郊的新教徒墓地，墓碑上刻着他的诗句：此地长眠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注意到诗人谢世之处的门牌号码：西班牙广场26号，恰好是他去世时的年龄。

在济慈死后不到15个月，比济慈年长三岁的雪莱也在地中海的一场风暴中丧生。雪莱的骨灰和济慈葬在同一座墓地里，两人的坟茔相距不远，唯有雪莱的心脏运回了祖国。在世界性的诗人行列里，没有人比济慈死得更早，他的创作生涯仅有5年，真是个动人的奇迹。和雪莱相比，济慈更追求完美，他是个纯粹的诗人，其诗歌的品质在很久以后才被认识，他对唯美主义的奥斯卡·王尔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2. 马耳他骑士团



西班牙广场

在交汇于西班牙广场的诸多小巷里，有一条街叫孔多蒂街，意思是引水道，船形喷泉的水源流经其地下。街道两侧布满了商店和咖啡馆，其中就有著名的希腊咖啡馆。或许是我来得不是时候，店里的顾客寥寥可数，不过从墙上的玻璃镜框内，仍可以感觉到这个咖啡馆昔日的风光。就像后来巴黎蒙马尔特的某些咖啡馆一样，这里曾经名流云集，除了前文提到的那些人物和本国的艺术家以外，还有肖邦、果戈理、易卜生等匆匆过客。更有意思的是，离希腊咖啡馆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楼，那可是世界上唯一的“楼中之国”——马耳他骑士团的所在地。这个“国家”于1099年始建于耶路撒冷，后迁至爱琴海的罗得岛，再辗转来到地中海的马耳他，18世纪被拿破仑赶到罗马。骑士团拥有元首和首相，使用自己的护照、邮票和汽车牌照，与几十个国

家互派大使，总之，享有国际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如果再加上梵蒂冈，罗马曾是欧洲三个国家的首都。

第三天·星期一

13. 学术报告

上午9点，代表们聚集到位于梵蒂冈的一所教会大学，就在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隔壁。简短的开幕式之后，正式报告开始了。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胡莱，他的题目是“指数与丢番图方程”，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成果是，他和合作者英国同胞沃恩一起把著名的华林问题做了重大改进。华林问题和哥德巴赫猜想同属堆垒素数论中的两大难题，当年华罗庚就因为这方面的出色工作享誉西方，现在他们把一大堆人名从文献中删掉了，只剩下意大利人拉格朗日和俄国人立尼克。拉格朗日出生在都灵，30岁受聘于柏林科学院，腓特烈大帝在邀请信中写道：“欧洲最伟大的国王希望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在他的宫里。”20年以后，拉格朗日来到巴黎，又成了年轻的执政官波拿巴将军的座上客，曾经远征埃及、对几何学十分入迷的欧洲新霸主由衷地赞叹“拉格朗日是数学领域高耸的金字塔”。

14. 桌边的谈话

在圣保罗旅店住宿和就餐的大多是东欧、北非、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同行，中午和我同桌的有一位波兰人阿列夫。阿列夫任教于格但斯克大学物理系，业余钻研数论。他把混沌理论和素数相联系，利用计算机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规律，并提出了一些大胆的猜想，可是没有专

业杂志愿意接收。我们没聊多久，他就把随身携带的几篇论文给了我，希望能在中国找到知音。我问起波兰的近况，阿列夫说大学教师的平均月薪为300~500美元，而10年前只有20美元。现在的波兰虽然说不上是东欧的领头羊，但是波兰人去欧洲任何地方却无须签证了。在欧盟国家里，意大利率先向波兰人敞开国门，原因非常简单，教皇保罗二世是他们的同胞（据说这位教皇写诗已有40多年了）。阿列夫原准备搭乘私营长途汽车来到罗马，临上车时才发现座位已经满员，显然客运公司多售了几张票，结果老板在表达歉意以后，亲自驾驶汽车送他到罗马。

15. 万神之殿



万神殿

晚餐以后，我独自来到了市中心。首先，我找到了著名的圆形广场，这个面积只有几千平方米的小广场其实并不圆，它得名于一侧万神殿后部的大圆顶。万神殿是罗马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原先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远征埃及的伟业，由于那时的罗马盛行多神教，因此殿中供奉着朱庇特、阿波罗诸神，故取名万神殿。可惜我来迟了一步，殿门已经关闭，这是罗马少数几处可以免费参观的名胜。殿内有许多大人物的陵墓，包括埃玛努埃尔二世和王后。不过，游客最感兴趣的要数画家拉斐尔之墓，他死于公元1520年的耶稣受难日，年仅37岁。这位文艺复兴时期最受宠爱的艺术家开创了一种“秀美”的风格，成为后来古典主义者不可企及的典范。拉斐尔显然是秘密下葬，他的墓直到1883年

才被人认出。我缓步绕殿一圈，猜想离画家最近的距离应在10米以内。

16.那不勒斯少女

拉斐尔虽然少年得志，身边总有美女环绕，却对爱情忠贞不渝。拉斐尔的未婚妻玛丽亚是他的保护人的侄女，两人相爱多年未能成婚。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先拉斐尔离开了人间，画家悲痛欲绝，临终时念念不忘，要求把玛丽亚的名字刻在他的墓碑上。或许是受这个爱情故事的影响，圆形广场的水池边挤满了少男少女，尤其到了傍晚时分，这里更成了谈情说爱的理想场所。我注意到三位相依而坐的那不勒斯少女，中间的那位少女一身黑衣，不仅脸蛋长得俊俏，还有一种古典的神韵。一会儿，来了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他做过一番自我介绍后，便上前亲吻少女的脸颊，继而顺着两腮凑近她的红唇。少女口中含着一根木片，巧克力味道的冰激凌已经消化在她的胃里，接下来的一幕令人难忘，少女利用木片巧妙地应付男子，只让他吻到唇角。经过10多分钟的周旋，男子知趣地离开，在整个过程中，少女没有中断与两侧同伴的聊天，而她们显然已对此司空见惯。

17.纳沃纳广场

从万神殿向西步行5分钟，就到了罗马的心脏——纳沃纳广场。对于巴黎，一般中国人都能说出七八处风景名胜，可是对于罗马，除了古罗马斗兽场遗址和梵蒂冈以外，其他的名胜就鲜有人知了。而实际上，罗马的名胜远多于巴黎，纳沃纳广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个长方形的广场面积不足一万平方米，处于一片古老、低矮民宅的包围之中。广场上，各种商贩、画家、歌手、魔术师混杂其中，其中最具标

志性的是中央的埃及方尖碑和三座喷泉，尤其是贝尼尼的雕刻杰作四河喷泉，4个强壮的男子雕像分别代表非洲的尼罗河、亚洲的恒河、欧洲的多瑙河和美洲的拉普拉塔河。由于当时还未探明源头，所以“尼罗河”半掩着脸。我在“拉普拉塔河”前伫立良久，他合掌把手举过头顶，这条短促的河流哺育了两座神秘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博尔赫斯曾在一首九行诗里同时提到它们。



四河喷泉和方尖碑

18.柯罗的花园

从纳沃纳广场向南再走上10分钟，就到了法尔奈斯花园。此时，夜幕已经笼罩整个罗马，可是法国风景画家柯罗的名作《从法尔奈斯花园遥望竞技场》仍浮现在我眼前。在这幅结构复杂的画里，画家用大手笔表现意大利的阳光，由于将自然光和几何图形巧妙地融合，画面明晰、质朴，丝毫不显呆滞，充分体现了柯罗早期艺术的精髓。柯罗曾长期旅居罗马，对19世纪的意大利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柯罗的父亲原是理发师，当柯罗出世时，他已改行协助妻子做服装生意，并且取得了成功。因而柯罗得以安心地绘画和旅行，父母每年提供给他2 000法郎。不过，世人熟知的“柯罗风格”却是指他回到法国以后，他的作品偏重幽静温柔的意境，其代表作《孟特芳丹的回忆》曾给学生时代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当我沉迷于对柯罗的怀想时，一名醉酒的妇人在路上撒野，引

得好几辆警车同时赶来，年轻的警员显得对此无能为力。一阵喧闹的音乐声响起，一群衣着花哨的男女老少载歌载舞游行至此。



罗马的云和教堂

第四天·星期二

19. 延长签证

意大利驻上海领事馆只给我20天的签证，而我希望能在欧洲多待些日子。当我把这个愿望告诉组委会主席帕帕拉迪先生时，他立即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裘迪，让她来帮助我办理此事。裘迪是几何学博士，毕业于蒙特利尔的大学，这次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来为大会服务的。裘迪事先打过几个电话，显得胸有成竹。上午我做完报告，她便



罗马修鞋铺

领着我坐地铁来到曼佐尼车站，就在但丁广场的一角，而在另一边，分别以彼得拉克和塔索命名的两条街道相互交汇，看来这一带是诗人们的聚集地。我和裘迪聊起意大利的文学，当我谈到蒙塔莱时，她的眼神显得异常兴奋，这是她最喜欢的现代诗人。经过几番周折，我们来到热那亚大道上的外国人办公室，仍然没有使签证得以延长，看来意大利人害怕承担责任，他们不断地把我们推到别的地方。裘迪对意大利的官僚作风早有领教，有一次她从维也纳寄一张明信片回家，居然花了整整一个月。

20. 桌边的谈话

午餐时，我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吉尔伯特·加西亚·普尔加林教授同桌，他留着络腮胡子，神态庄重而自然。我们从咖啡、毒品、黄金、游击队，一直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看得出来，吉尔伯特为拥有这位同胞而感到自豪，虽然他们的名字其中一处相同，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小说家加西亚出生在哥伦比亚北部小镇阿拉卡塔卡，后来定居在港口城市巴兰基亚，而数学家加西亚执教于麦德林的安第基奥大学，巴兰基亚和麦德林相距600多千米。据吉尔伯特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个弟弟原来也写作，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后来见哥哥的名声大了，便放弃了文学，一心一意地做学问，现在是巴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吉尔伯特下学期就要出任系主任，他们正在招

聘一位访问教授，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我告诉他一些我的情况，他估计了一下，以我的资历在他们学校当访问教授的薪水颇为可观。我心想真有这样优渥的条件吗？哥伦比亚可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始料未及的是，那顿午餐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21. 威尼斯宫

下午的报告结束后，我步行来到市中心的威尼斯广场，老远就见到象征着意大利统一的祖国祭坛，外形酷似一台打字机。广场的西侧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建筑——威尼斯宫，它最初的主人是威尼托共和国驻罗马的大使，而威尼斯正是威尼托区的首府。面对这座古老颓败的宫殿，我感兴趣的是位于我正前方的一个阳台，据说墨索里尼的办公室就在里面。大半个世纪以前，他经常站在这个阳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不难想象，那时的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会跟着他歇斯底里地摇旗呐喊。与威尼斯宫相对的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大楼，大楼的旁边立着一座纪念碑，那正是米开朗琪罗谢世之处，不过他的故居早已荡然无存。与墨索里尼一样，米开朗琪罗对广场也情有独钟，他的一句名言是：敢于拿到广场上去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他的雕刻杰作《大卫》最初就立在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前。

22. 图拉真纪功柱

在威尼斯广场的东北方向，坐落着一根约40米高的圆柱，那应该是著名的图拉真纪功柱了，我曾在深圳的“世界之窗”里见识过。图拉真出生在西班牙的伊大利卡近郊，即现在的塞尔维亚地区。后来因为战功卓著成为第一位在意大利以外出生的罗马皇帝。图拉真在位期间最大的功劳是，他统帅的军队于一世纪初征服了达基亚王国，即今

天的罗马尼亚。图拉真征服达基亚后，一部分罗马人在那里居住下来，并和达基亚人通婚。罗马尼亚在拉丁语中的本意就是罗马人的国家。石柱周围呈螺旋状展开200米长的浮雕，记录了罗马人征战达基亚的故事，据说是根据图拉真的日记做成的，底部的画面清晰可辨，表现了军队强渡多瑙河的壮观景象。

23.罗马假日



真理之口 作者摄

意大利是一个电影王国，罗马东南的“电影城”被誉为欧洲的“好莱坞”，涌现过许多世界级的导演，他们大多拍摄以罗马或其他城市为场景的影片，例如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安东尼奥尼的《波河上的人》、费里尼的《费里尼的罗马》。然而，最时髦的意大利题材影片却是由美国人一手制作的《罗马假日》，女主角扮演者奥黛丽·赫本因此成为银幕史上最清纯可爱的女演员，她的装扮、发型、神韵风靡一时。商人们看中了这一点，于2005年夏天推出赫本的服饰回顾展，在意大利各地轮流举办，她当年的黑白照片随处可见。我没有被这个展览吸引，却找到了因电影出名的那尊海神雕像，看上去像一头狮子，它镶嵌在河边一家小教堂门外的墙壁上，这就是“真理之口”。传闻说谎的人，如果把手放进口中，手就会被咬断。在中世纪，它曾被用来对付说谎

的人。在远处我就见到许多游人在“真理之口”前面排队，等候把手伸进那张嘴巴里去，我是否也要表现出惊恐的模样拍照留念呢？

24. 小偷和乞丐



罗马的乞丐 作者摄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里，小偷和乞丐是没有区别的。我至今对这位理想主义作家满怀敬意，尤其是不久前又一次看了《远大前程》这部电影，里面传达出的那种温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次打动了我。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作家总是对现实怀有天生的敌意呢？在今天的罗马街头，乔装打扮的小偷让我难以辨认，而乞丐却大方真实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曾经把相机镜头对准过一位身怀六甲的女子，但她慌张的神态表明她肚子里塞的是报纸。后来，我用两枚硬币拍摄到了两个真实的画面。一个衣着整齐的美女席地坐在人行道上，前面放着一个饭碗，一个幼孩在那里玩耍，这无疑是那年夏天罗马最漂亮的乞丐了。另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知识分子，端坐在地铁车站电梯入口的一张方凳上，目不转睛地捧读手中的书籍，其间不时有人往他前面的纸盒里扔钞票，看来这一定是今年夏天罗马最有学问的乞丐了。

第五天·星期三

25. 梵蒂冈城国

今天下午休会，我约展涛父女直接乘公共汽车到梵蒂冈。展涛的女儿，上小学五年级的梦舒要去德国探望母亲才拿到签证，她已经是第三次来欧洲了。过了台伯河，很快就看到了椭圆形的圣彼得广场，周围环绕着四重列柱，形成足以让四轮马车通过的环形长廊，广场中央是尼禄方尖碑。我在梵蒂冈邮局寄走两张明信片，每一张邮票都异常精美，使我相信旅游业是这个国家的重要收入。眼前就是天主教世界最大的教堂了，从内部看它像一艘航空母舰，而梵蒂冈的面积不足0.5平方千米，正是由于这座教堂耗资巨大，促使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表了抗议书，从而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据说从教堂的圆顶到卫兵的制服，均由米开朗琪罗设计，而所有的卫兵必须是中立的瑞士人。本来，教皇每星期三接见游客，可现在是盛夏，他老人家度假去了。我走出教堂，看见高处的一个阳台，想起裘迪曾经说起，罗马每隔12年下一次雪。上一次下雪时，保罗是否站在那个阳台上，看着他的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耍呢？



米开朗琪罗所绘制的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

26. 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

走出圣彼得广场，向右沿城墙步行，不一会儿就到了举世闻名的梵蒂冈博物院，这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可谓院中有馆，馆中有室，它们都是梵蒂冈宫殿的一部分。自从14世纪教皇从法兰西迁回后就定居于此，历代教皇又有不同程度的修复和扩建。进了院门后，我们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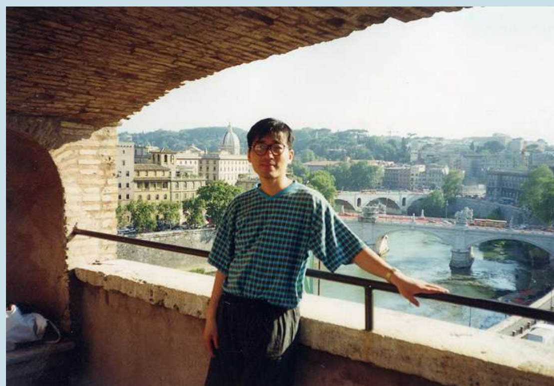
暇顾及其他，直奔以教皇西斯廷命名的礼拜堂，路上经过了十多处指示牌，方才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只见地上坐满了参观者，却听不到喧闹的声音。我抬头仰望天顶，见到了流光溢彩的壁画，其中《创世记》犹如夜晚的北斗星一样格外耀眼。在18米高的画架上作画，没有雇用任何助手，又无照明的灯光，米开朗琪罗一定耗尽了心血，据说4年后此画完成，米开朗琪罗已无法正常阅读，需要把书举过头顶。难怪300年后歌德评论说："没有到过西斯廷礼拜堂的人，无法了解一个人所能做的事。"

27. 雅典学派

在西斯廷礼拜堂的隔壁，有一间教皇专用的大书房，当米开朗琪罗的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年轻的拉斐尔奉命开始在那里创作《雅典学院》。两位大师性格有别，生前的荣耀和受器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可这不妨碍他们暗中互相取长补短。拉斐尔以画圣母像著称，尤其以一幅《西斯廷圣母》倍受后人称颂，这幅圣母画的下方趴着的一对小天使也被大量复制成各种纪念品出售。遗憾的是，拉斐尔的几幅著名的圣母像大多流落他乡，以德国的德累斯顿画廊收藏最丰，这在无形中减少了他在罗马的影响力。《雅典学院》占据了整面墙壁，几乎集中了古希腊所有的哲学家，中央站立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一手捧着自己的著作，一手分别指向天空和大地，旁边有苏格拉底、色诺芬、赫拉克利特、狄奥克尼斯（坐在台阶上）和毕达哥拉斯（正拿着书写板计算）。拉斐尔把自己安排在右边的角落里，以表示对前辈的尊敬和向往。此画气势恢宏，多少受到了老对手米开朗琪罗的影响。

28. 天使古堡

离开梵蒂冈宫殿后，我们来到台伯河北岸的天使古堡，这座圆形建筑本是图拉真的继承人哈德良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后来围上堡垒变成了贵族私宅甚至成了教皇宫殿，其间它还有别的用途，例如监狱、博物馆。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城堡的地下室一直是一个臭名远扬的监狱，包括科学家布鲁诺在内的知识分子曾被囚禁在这里。布鲁诺出生的时候，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已经辞世5年。但后来布鲁诺仍因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迫害，长期流亡国外。布鲁诺最后被骗回威尼斯，处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据说这并非是因为他的科学观点，而是由于他的哲学思想，他是一位热忱的无神论者，攻击一切在当时被认为“正统”的信仰，这为教会所不容。我们在城堡的顶层俯瞰台伯河两岸，正逢黄昏时分，日薄西山，风光美不胜收。可是，城堡内豪华的套房却禁止参观，城堡开放的空间与不菲的门票相比，仍让我感觉有点儿不值。



作者初访罗马 从天使古堡眺望台伯河

29. 鸡尾酒会

晚上7点，我和展涛父女准时到达位于圣普里斯卡街的一个小教堂，这条街沿山坡修建，周围绿荫环绕，两侧全是低层的楼房。组委会安排的鸡尾酒会设在教堂的后花园里，花园的地面由石子铺成。鲜花、美酒和各色点心已经摆放在长桌子上了。数学家们济济一堂，孩子们穿梭往来，圣普里斯卡街附近的地图早已印在会议的程序册上，距最近的地铁车站大约500米，不需要任何向导或交通工具就能从地铁站走到这里。我遇上一位从巴黎来的大教授瓦尔德斯密特，他没有带论文，却携着全家老幼。我问起缘由，他的回答非常坦率：罗马的天

气这么热，又没有装空调，谁愿意在这里做报告呢？而波兰人伊万尼齐却没有这样潇洒，他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著名教授，也是这次会议的特邀报告人，他的谦逊留给我美好的印象。可当我把阿列夫介绍给他时，这两位波兰同胞无话可说。

30. 维瓦尔第



街边的咖啡屋

暮色降临，一支管弦乐队开始演奏雷斯庇基的作品，我猜大概是他的罗马三部曲之一，这位意大利作曲家曾远赴圣彼得堡师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作品风格绚丽华美，非常抒情。可是此刻，我更希望听到维瓦尔第的《四季》，生于1678年的维瓦尔第是一位意大利作曲家，比“音乐之父”巴赫还年长7岁。《四季》发表于1725年，当时他正在罗马，这个协奏曲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巴赫曾多次改编他的作品，可后来维瓦尔第却被音乐史家冷落，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重新认识。有人告诉我意大利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我想至少它最受作曲家们的宠爱，以意大利命名的曲子数量非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卡塞拉的《意大利狂想曲》，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李斯特的《意大利游记》，施特劳斯的《意大利之旅》，沃尔夫的《意大利小夜曲》和《意大利歌曲集》，我列出的这个名单还没有把意大利本国作曲家的作品包含在内。

第六天・星期四

31. 帕格尼尼

上午有位教授的报告提到亲和数，使我想起了一位数学神童。亲和数的发现归功于毕达哥拉斯，亲和数是这样一对自然数，其中任意一个数等于另一个数的真因子之和，最小的一对亲和数（220，284）是由毕达哥拉斯本人找到的。亲和数一度被人们赋予了神秘的色彩，并在算卦和占星术中发挥了作用。人们相信：分别写有这两个数字的两块咒符可以确保其佩戴者亲密无间。遗憾的是，接下来的2 000多年里亲和数的发现没有任何进展。直到1636年，才由法国人费尔马找到了一对（17 296，18 416），两年后，笛卡儿发现了第三对。18世纪时，瑞士人欧拉对亲和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一共找到了60对。有趣的是，第二小的一对亲和数（1 184，1 210）长期被人们忽略，直到1867年才由一位年仅16岁的意大利少年发现，他的名字叫尼古拉·帕格尼尼，他的姓与那位意大利音乐神童、历史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一模一样。

32. 桌边的谈话

午餐时，我与土耳其人卡拉同桌，他来自地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那个古称拜占庭的地方是最令我向往的城市之一，它经常出现在充满神秘色彩的西方电影中，叶芝写诗颂扬过它，博尔赫斯也在小说里频频提及它。面孔白净的卡拉神韵里蕴藏着阿拉伯人的温厚，尽管欧洲的足球联盟和欧洲的导游手册都把土耳其纳入其中，但他朴实的举止使我首先感到，眼前的人是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人。作为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东迁，以避开被多神教控制了的罗马。这位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性人物一定无法想象，他的徒子徒孙们早已背叛他的信仰。而他的出生地内索斯（今塞尔维亚的尼什）曾遭受了“北约”组织的猛烈轰炸。当时土耳其的货币也

叫里拉，这大概是“东西罗马”难得的一个相同之处。席间，卡拉流露出对地震的忧虑和恐惧，比起定居在加利福尼亚黄金海岸的居民，他可以选择居住的地方的确很少。

33. 大斗兽场

我在罗马的时间已经不多，下午我去了古罗马斗兽场，这座标志性建筑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它就在从我的住处到会场的路上，因此每天都能看到，今天终于进入了它的内部。斗兽场又名竞技场，意大利人称为高乐赛奥（Coliseum），意思是“体育馆”，因其4层的看台可以容纳近9万名观众，即使在今天，这里仍算得上是高规格的场馆。在这个露天场馆里，曾经战死的奴隶和动物不计其数，斗兽场就像罗马一样，由于战争和地震不断被破坏和被修复，以至于有人预言：斗兽场存，罗马则在；斗兽场垮，罗马则亡；罗马亡，世界末日将临。罗马因此有了“永恒之城”的美名。我所见到的斗兽场顶层大部分已毁，地面则掘土三尺，十足一个考古现场的工地，中央莫名其妙地躺着一只红色的大气球。总的来看，斗兽场的内部像一具巨大无比的骷髅。走出门外，几个强壮的男人穿着盔甲，装扮成古代勇士模样，热情地招呼游客合影留念。

34. 西西里少女

我在前往斗兽场的路上，碰见一位巴勒莫少女苏西，我曾为她指路，原以为她只是想看一下斗兽场的外观，没想到她从北边又绕了回来，和我在售票处再次相遇。苏西是来罗马找工作的，她的职业是文秘，明天有一次面试。我和苏西结伴游览了斗兽场，彼此为对方拍摄了几张照片，她灿烂的笑容把肃穆的气氛冲淡了许多。苏西已买好明

天回家的车票，她邀请我去她的故乡。坐快车从罗马到巴勒莫只需10个小时，这趟旅途还包括穿过墨西拿海峡的轮渡。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因其多重文化的融合受游客青睐。在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都曾在西西里岛生活过。先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西西里几乎受到过地中海沿岸所有文明的“入侵”。提到西西里，不能不使人想到黑手党。在圣保罗旅店的餐桌上我听到过一个说法：假如两个男人在岛上开车相撞，谁都不敢指责对方，因为说不定其中一个是黑手党，会当场拔出手枪把另一个干掉。

35. 古罗马市场

在大斗兽场和威尼斯宫之间，有一大片石头组成的废墟，这就是所谓的古罗马城市广场。随着罗马势力和城市的不断扩张，这里一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到了20世纪，古罗马城市广场又成了古罗马的露天博物馆，主要遗迹有爱米利安宫、元老院、罗慕洛墓和恺撒神庙，如果不看导游图，我是分辨不出这几个是非之地的。爱米利安宫曾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大建筑之一，据说它建在几家肉铺店的地基上。有一个残忍的故事流传至今，政客维尔季尼奥为了不让美貌的女儿被自己的上司占有，在此地用刀亲手将她劈死。传说中罗慕路斯和他的孪生兄弟是罗马城的建立者，一只母狼用乳汁喂养了他们，后来他杀死了弟弟，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罗马。而威风八面的恺撒则在政敌庞培的塑像前倒下，传说中他被元老院雇用的杀手谋杀死去。恺撒墓原先只是一个土堆，等到他的养子屋大维做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才建起一座宏伟的庙宇。



古罗马市场

36. 台伯河畔

台伯河或许是世界著名河流中最短促细小的，台伯河因流经罗马一举成名，在东方的日本也有许多类似的河流，例如367千米长的信侬川，自南向北注入日本海，与东京和其他大城市失之交臂，故知名度仅限于本国。傍晚时分，我从古罗马市场向西走近台伯河，那里有一座叫蒂贝里纳的小岛，平缓的水流在经过这个小岛时突然变得湍急，形成一米多高的落差。此刻的河边华灯初上，灯水相映，这里的确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岛上有两座桥连接两岸，东边的那座俗称四头桥，建于公元前62年，是罗马现存最古老的桥梁。桥上立着4座头像，据说是造桥的4位建造师，他们因为相互拆台，完工后被教皇下令斩首。岛的南端还有另一座桥，是名副其实的“断桥”，近500年来只有桥墩，也算是台伯河上一道特殊的景致。

第七天·星期五

37. 桌边的谈话

早餐时，我和印度室友库尔卡尼同桌，他来自金奈市的一所大学，今年刚刚取得博士学位。我向他展示了刚刚出版的一份中文报纸，其中有个版面刊登了两年前我在印度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把我们的关系迅速拉近。库尔卡尼快30岁了，但仍然是一个处男。他甚至没见识过图片上的女性身体，不过他有一个未婚妻，是双方父母和媒人选定的。库尔卡尼说自己婚前可以见她一面，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退婚，但送出去的彩礼是要不回来的，且下一个未婚妻即使形象更差，也不能不娶了。库尔卡尼天生一副好脾气，见面的第一句话总

是：How is life？（最近过得还好吧？）第二天一早，他就要飞回印度，晚上看电视时他把频道调到一部阿根廷准色情片，类似马龙·白兰度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库尔卡尼彻夜难眠，凌晨时分他独自动身，却不慎碰到了火灾警报器，整个旅馆警笛大作，直到消防队员们赶来才止住。这是他的告别方式，令人难忘。

38. 博尔盖塞公园

罗马的公园很多，其中最大、最漂亮的要数城北的博尔盖塞了。午餐后我没有去开会，径自乘地铁来到威尼托大街，穿过这条繁华的商业街就到了那座闻名全欧洲的公园。博尔盖塞本人是一位大主教，又是教皇保罗五世的侄子，这个公园原是博尔盖塞的私人别墅，里面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后来建起了博物馆，除了梵蒂冈博物馆以外，这里的藏品也是罗马比较丰富的。博尔盖塞本人有着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他首先发现了贝尼尼的雕刻才华，这位巴洛克时代最杰出的雕刻家，虽然在雄伟和深刻方面不如米开朗琪罗，但在生动和神似方面，却是无人可比的。贝尼尼最得意的两件作品《圣苔列莎幻觉》和《阿波罗与达芙妮》分别占据了一个展厅的中央位置，前者表现了西班牙圣女被丘比特的神箭刺中前的那种甜蜜的苦痛，后者重现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描述的日神阿波罗追逐河神女儿达芙妮的动人一幕。

39. 里拉上的画家

我到博尔盖塞博物馆来全凭感觉，事实说明不虚此行。在博物馆的近三个小时里，一位从纽约来罗马学建筑的大学生詹姆斯始终陪伴着我，并不时为我朗诵手中书籍的片段，在《阿波罗和达芙妮》前，

詹姆斯念起奥维德的诗句：眼看就追到她的身后，他的气息吹着了飘在她脑后的头发。达芙妮在奔跑中呼喊所显示出的惊恐和温柔惹人怜爱，艺术家巧妙地塑造了达芙妮从少女变成树木的微妙过程。虽然博尔盖塞博物馆里不乏拉斐尔、提香、波提切利的画作，但给我印象最深的画家却是卡拉瓦乔，他直接把苦工和小贩拉来充当画布上的基督和圣母，在这方面他比荷兰人伦勃朗早了30多年。卡拉瓦乔的自画像刚毅有力，出现在10万里拉的纸币上，与法郎上的德拉克罗瓦颇为相像，后者显然受其影响。据说卡拉瓦乔放任天性，曾在马耳他岛坐过牢，他在乘船去罗马的途中，病死在一处偏僻的海滩上，享年39岁。

40. 奥古斯都墓

离开博尔盖塞公园以后，我向西找到了奥古斯都墓，它位于台伯河的东岸，是奥古斯都从埃及班师回朝后下令所建，因而可能受到了亚历山大陵寝的影响（后者已无法查找）。墓的外表是圆形，走进向南的大门，里面有一环形的走廊，包围着三个壁龛，分别葬着奥古斯都和他的母亲、侄子。墓上方和周围栽着柏树，这里没有一位参观者，只有一只短尾巴的小狗，孤单地在外面的空地上徘徊。作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或许是欧洲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统治的时期被称为“罗马盛世”，更重要的是，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和希腊文化都在这一时期传入了西欧。虽然，一些史学家们认为，比起他的养父恺撒来，奥古斯都（他35岁以前的名字叫屋大维）缺少个人魅力，但从梵蒂冈收藏的同名雕像看来，奥古斯都比恺撒显得更为沉稳成熟，他的护胸甲刻满了象征性的人物。《奥古斯都》是古罗马的雕刻杰作，正如《拉奥孔》



罗马名菜：干酪香肠空心面

是古希腊人的雕刻杰作一样，这两件稀世珍品保存在同一座大厅里，真有点儿让人不可思议了。

41. 特莱维喷泉



特莱维喷泉

令人惊讶的还有，米开朗琪罗最出色的两件雕刻作品之一——《摩西》竟坐落在默默无闻的一家小教堂内，而且是敞开大门任人参观。其收费方式非常独特，由于室内灯光幽暗，所以需要游客投入一枚硬币方会亮灯，每次亮灯持续一分钟的时间。当然，你若是想多看几眼，完全没有问题，自有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率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的摩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受崇拜的人，他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们共同拥戴。除了博物馆和教堂，罗马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众多的喷泉，而其中的佼佼者要数特莱维喷泉了，它因为费里尼导演的《甜蜜的生活》闻名于世，这部影片通过一个目光偏狭的记者的所见所闻，描写了罗马的奢华，充满了放纵的肉欲和空虚的道德。其中有一个特写镜头是女主角在此喷泉里嬉戏。特莱维喷泉的水质甜美，池底散落着游客扔下的各国硬币，它的另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少女喷泉，据说是因为一名少女指点罗马军人找到了这处洁净的水源，喷泉上方的浮雕描绘了这个故事。

42. 残缺之美

一轮弯月照耀在我的床前，清风徐徐从地中海袭来，仿佛特莱维喷泉的水柱。明天，我就要动身去希腊了，那将是一次轻松随意的旅行。罗马仍有许多名胜尚未探寻，可它已教会我懂得残缺之美。拜伦在一首诗中写道："古老的台伯河，你流过的是一片大理石的废墟。"在这次旅行中我学会了放弃，有许多杰出的人物我连影子都没有遇上：西塞罗、卢克莱修、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贺拉斯、提图斯·李维、普林尼、普鲁塔克、塔西陀、阿庇安、玛克斯·奥勒留、奥古斯丁。这些人物的智慧光照千秋，更适合我们在书中见面、"交谈"。电视里正在转播西班牙广场的一场时装表演，前排的贵宾席上有全世界熟悉的面孔：索菲亚·罗兰和阿兰·德龙，两位名声显赫的演员年纪相仿，此时都已经过了花甲，他们分别和现任的丈夫和妻子亲密无间，手拉手在旁边聊天。多么有趣的演出啊，罗马就这样拉上了帷幕。

1999年夏天，罗马—佛罗伦萨

罗马古道

从前我曾走过这条路
风景依旧历历在目
隧道、小溪、葡萄园

铁道线绕来又弯去
同样是上上下下的乘客
只不过会说英语的人多了

亚平宁的雨斜落在玻璃上
时光犹如暮色中的炊烟

飘走了又被风吹回来

但那只是偶然的相聚

如果你遇见旧时的恋人

最好把她当成一次回忆

四城记：从雅典到罗马



米兰时装周（2009）

第一天・米兰

1. 巴尔干半岛

在现代汉语里，欧洲各国的主要城市名字大多采用音译，雅典是仅有的少数几个例外之一，雅典与它在希腊语或英语里的发音有着较

大的差异，可以说中国人把最高贵的译名留给了雅典，而把最美丽的名字留给了太平洋彼岸的新世界。上午10点，我搭乘奥林匹克航空的机场巴士前往爱琴海滨的雅典国际机场，这座白得像天使一样的城市即将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可它仍会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就像那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古希腊神话。科林斯湾在机翼下方一闪而过，接下来是光秃秃的品都斯山脉，干燥炎热的天气使得巴尔干半岛的内陆荒芜。我原以为巴尔干半岛的右侧是爱琴海，一看地图着实吓了一跳，它一直延伸到黑海之滨，也就是说除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以外，还触及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等地区的海岸线。巴尔干半岛的人民英勇不屈，当年成吉思汗的远征就止步于此。在飞临沿海的平原以前，一个小小的湖泊隐约可见，临湖的城市爱奥尼亚曾是7世纪伊斯兰教第四代哈里发的国都。据说在经历了无数炮火的洗礼之后，这里的城墙、宫殿和清真寺仍比较完好地保留着。

2.阿尔巴尼亚

离开爱奥尼亚以后，飞机几分钟就到了国境线，接着如我所愿，飞机掠过了一小片阿尔巴尼亚的领土。15世纪末，正当西欧诸强为争夺海外领地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土耳其帝国征服了这片位于它们家门口的土地，出生在土耳其的统治者苏莱曼帕夏命名了一座几千人的小镇地拉那（Tirana），后来变成了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这或许是东方人在欧洲留下的最难抹掉的痕迹。在中国，“文革”后期有几部反映“二战”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成为人们争相观看和谈论的对象。其中的一部《第八个是铜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记忆，而在另一部我想不起名字的影片中，一位船长抱着自己的新娘转圈的镜头让许多年轻人情窦初开。我长大以后，见到一幅拜伦勋爵身着阿尔巴尼亚传统服装的油画，红色的头巾一直围到他的长辫子上。在拜伦的处女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里，主人公游历了阿尔巴尼亚，到达了“既有

豺狼出没，也有觅食的鹰盘旋，同时又栖息着凶猛的禽兽和更残忍的人的山村”，此书的出版使诗人一夜成名。20世纪80年代末，我又有幸读到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长诗《英雄挽歌——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诗中写道：“在太阳最早居留的地方/在时间像个处女的眼睛那样张开的地方”，“岛屿像一些头发冰凉的僧侣/在无声地切着荒野的面包”。

3.亚得里亚海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那几部影片的故事都发生在亚得里亚海滨，且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暴风雨的场景，似乎暗示着德国纳粹分子的凶残。而今天的亚得里亚海风平浪静，在地中海的各大海域里，它的地理位置最北，也是最为封闭的。一个奇特的地理现象是，几乎所有的小岛都靠近右岸，即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地区。亚得里亚原是古罗马的一个港口，这座城市如今已经消亡，它的大概位置又在何处呢？环顾四周，我不禁暗自发笑，可能没有一位乘客像我这样想入非非。两个小时以后，飞机从一座叫里米尼的小镇切入亚平宁半岛，这座小镇是电影大师费里尼的出生地，也是通往袖珍小国圣马力诺的必经之地。费里尼深受弗洛伊德和荣格学说的影响。他所制作的电影的基本主题是：精神的纯洁与物质的腐败之间的对照。其中一部影片里有这么一个镜头：一个胖得出奇的女人在海边跳起忧伤的色情舞蹈，据说这个场景是导演本人小时候在里米尼亲眼所见。圣马力诺建在一座叫蒂塔诺的山上，方圆只有约60平方千米，每年接纳的游客是居民总数的150倍。传说在公元三世纪，有一位叫马力诺的达尔马提亚石匠，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渡过亚得里亚海到圣马力诺隐居，后来他接纳了其他逃难的人，逐渐形成了“石匠公社”。1 000年以后，这个石匠公社演变成了欧洲第一个共和国，取名圣马力诺。几年前，巴西人的骄傲——一级方程式车手塞纳命丧于此。

4. 伦巴第首府

下午3点15分，飞机抵达了米兰的利纳特机场，米兰有两个机场均始发国际航班，这一点罗马不及米兰。值得骄傲的还有，米兰有三条半地铁，而罗马只有两条。当然了，最让米兰人自豪的要数足球和时装了，以实用但不失优雅著称的米兰成衣享誉全球，米兰与巴黎、纽约、东京并列为世界四大时装之都。从机场到中心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一刻钟一班，5 000里拉(注)的票价不算便宜，因为只有10多千米的路程。我们很快就见到了整洁有序的街道，看得出来这座城市的效率比较高，毕竟它是亚平宁半岛最现代化的城市。火车站问讯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米兰只有一家青年旅店，铺位有的是，根本不需要预订和咨询，她给了我一张地图，用铅笔在上面画了几个圈，就把头转向下一位旅行者。我以前听说过米兰人比较冷漠，这次得到了初步印证。我买了一张地铁日票，登上一列西去的火车，当我走出地铁口，发现仅有一位男孩同行，他很快就猜出我也要去他住的旅店，便开始用蹩脚的英语和我交谈起来。当我们走到旅店的登记处，他已经把他会的英语全说了一遍，于是我们只好握手告别，我只记得他家在东海岸的巴里，这是他第一次到米兰游玩。半个小时以后，我洗完澡，躺在自己的床位上睡着了，意大利的青年旅店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位旅客都有一个免费的保险柜，可以安心地放置行李。

5. 最后的晚餐

一觉醒来，天色已经暗下来，我搭车来到市中心的圣玛丽亚感恩教堂，我看到一座古旧破败的建筑，原来是多明我修道院的餐厅，倘若不是外面悬挂着大条幅，恐怕不会有路人驻足。15世纪末，达·芬奇应米兰大公的邀请，来这个修道院作壁画，题材确定为基督与他的12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结果这幅画使整个米兰生辉。与罗马、佛罗

伦萨、威尼斯相比，米兰缺少古代的遗迹和迷人的风景，这座教堂自然成了最吸引游客的地方。教堂门口排着长队，为了看这一幅壁画，每位参观者要付出人民币100多元，比参观整座巴黎卢浮宫还昂贵，卢浮宫收藏了达·芬奇的另一幅名画《蒙娜丽莎》。米兰人真会做生意。参观者每20人编成一组，每组只能在里面停留15分钟，我非常幸运，在下班前正好轮到我这一组，排在后面的人只好改天再来了。这是一座长方形的餐厅，《最后的晚餐》差不多完全占据了较窄的那面墙，12个门徒也被分成三组，每组4人。据说，此画描绘了基督刚说完“你们中间有人出卖了我”这句话时众门徒的表情，我忽然想起西方人把13视作不吉祥的数字，是否与这件事有关呢？我注意到对面的墙壁上还有一幅画，那是同时代的一位无名小卒所作，观众往往会不经意地瞄上几眼，作为眼睛和思想的一种休息，那情景使我想到美女的身边常常有一位长相平平的女友相伴。

6.斯卡拉歌剧院



米兰 斯卡拉歌剧院

离开圣玛丽亚感恩教堂后，我感到肚子有些饿了，从刊满广告的地图上发现，米兰大教堂边上有一家麦当劳。我跳上一辆有轨电车，在欧洲我可是头一次乘坐有轨电车，上一回是在旧金山。没想到米兰大教堂正在整修，自上而下被脚手架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这座以尖顶拱券和垂直线为主，高耸、轻盈、华丽、精致的建筑是哥特式艺术的精华，它开始建造的时候，达·芬奇的父亲还没有出世。那家麦当劳就在教堂的对面，我在靠窗的位子上坐下来，忽然发现那人人熟知的麦当劳标志“M”与地铁车站的

标志“M”隔得不远，我灵机一动用相机拍了下来。既然看不到教堂辉煌的内部，我就想去米兰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方，那就是斯卡拉歌剧院，一打听原来是在大教堂的后面。当我再次向当地人问路时，我已经站在了歌剧院的门口，那人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说，别看它名气大，就这副模样。我立刻联想到北京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闹得沸沸扬扬，米兰人知道了是否会笑话呢。巧得很，今晚是夏季演出的最后一天，剧院里正在上演法国作曲家马斯内的五幕歌剧《曼侬》。无论是否还有余票，身穿晚礼服的看门人告诉我现在已经谢绝入场。他看我迟迟不肯离去，又生出怜悯之心，建议我从门外的楼梯走上顶楼，那里有工作人员对剧场进行监控，我必须快速通过一个空房间，才能一饱眼福。结果，我在推开那扇小门的一瞬间放慢了脚步，被一名保安拦下了。

第二天·威尼斯

7.西西里老头

上午9点，我在米兰车站乘上一列东去的火车，300千米的路途均是在平原上。同包厢的5位乘客都是意大利人，其中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士会说英语，这大概正好表明了这一语言在亚平宁半岛的普及程度，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快，我便成为包厢里谈话的中心，一位老太太和我聊起了足球，她对AC米兰情有独钟，却从不光顾国际米兰的主场。我提起那两位身价昂贵的球星，她的脸上随即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还有残缺不齐的牙齿。最年长也最有趣的乘客是一位西西里老头，虽然他话不多，偶然冒出一句却非常精彩，他说，“可惜我只有儿子，如果有一个女儿一定把她嫁给你。”我回答：“您的女儿配我是否老了一点儿？”他答道：“不用担心，我是一个

富人，太太还很年轻呢！”我反问一句：“富人？怎么还坐普通车厢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双胞胎上，那位年轻的女士告诉我，在意大利先出生的孩子被叫作弟弟或妹妹，后出生的才是哥哥或姐姐。虽然她说得很笃定，我还是有点儿半信半疑。接着，加尔达湖出现在列车左侧，此湖与我们仅仅相伴了两分钟，却是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不久以前，轰炸南斯拉夫的北约飞机因机械故障在湖上投下两颗美制炸弹，引得欧洲舆论一片哗然。西西里老头告诉我说，他为自己的国家给“北约”组织提供空军基地感到耻辱。

8. 爱情的故乡

所有乘客的目的地都比我要近，他们下车后我对新上来的乘客又缺乏兴趣，因此后半程我都在默默注视着窗外。从加尔达湖向东走上一刻钟，就到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英国人对希腊和罗马的仰慕蔚然成风，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题材和故事都发生在地中海一带？有意思的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莎士比亚曾离开过他的祖国，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如今家喻户晓。这是莎士比亚写作的一部悲剧，也是他在16世纪完成的作品。维罗纳正好处在米兰和威尼斯中间，这座美丽宁静的城市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经崭露头角，成为罗马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物资贸易的地点。即便在今天，维罗纳居民的收入在意大利仍属于较高的，在这里你会真正感觉到街上走着的大多都是本地人。当然，我并不是说维罗纳没有游客，事实上，有不少去加尔达湖度假的人在此中转，还有一些年轻的异国情侣，冲着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故事而来。此城仍保留着他们的墓地。从维罗纳向东，经过又一个意甲主赛场维琴察，就到了威尼斯的近邻帕多瓦，有许多到水城游览的人为了节省费用，选择在这里下榻。帕多瓦大学如今鲜为人知，在历史上它却曾经辉煌

一时。物理学家伽利略在这里度过了学术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他的主要成就都是任教该校期间完成的；这座大学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则是波兰出生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但他在此主修的却是医学。火车继续前进，快到终点时我忽然发现，威尼斯和米兰恰好处在同一纬度上。

9.初到威尼斯

穿过一条宽阔的大堤，火车就进入了威尼斯岛，我们到了圣露西亚车站。走在广场上，我随即被扑面而来的欢乐气氛感染，大运河上船只穿梭往来，人们习惯把它们叫作水上公共汽车。游客们个个兴高采烈的，仿佛是在欢度重大的节日，威尼斯真是一个人间天堂，即便巴黎的塞纳河畔也无法与之相比，那儿堤岸和水面的差距造成一种疏离感。我在米兰遇见的那位巴里男孩说得没错，威尼斯的船票不菲，可是根本没有人查票，码头上虽有警察，其职责却是搀扶游客。我乘坐往逆时针方向行驶的船只，20分钟后到达了科德卡岛，全城唯一的青年旅店坐落在此，我幸运地获得一张靠窗的铺位，躺在床上就能眺望对岸的圣马可广场。岛的外侧是亚得里亚海，不远处还有一座利多岛，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电影节在那里举行，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拜伦勋爵称赞该岛的沙滩是全世界最迷人的。需要一提的是，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年轻时曾旅居此岛，并完成了小说《死于威尼斯》，这部作品代表了他早年的主题：想象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不同。主人公阿森巴赫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在他前往威尼斯的旅途中，遇到了一位非常俊美的波兰男孩，起初他的美貌似乎证实了阿森巴赫的古典理想，后来威尼斯爆发了瘟疫，主人公死在了海滩上。这部小说让托马斯·曼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改编成的电影只得了个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奖。

10.欧洲的客厅

冲过淋浴后，我便和同室的丹麦小伙子马丁一起乘船来到对岸的圣马可广场，从表面上看，这个广场及其同名的教堂在意大利算不了什么，它原是威尼斯公爵府的后院，但法兰西人拿破仑却赞誉它为“欧洲的客厅”。倒是那座公爵府显得不同凡响，其雕花窗格造成一种独特的壮丽效果，或许这是我在此行中见到的非宗教建筑中最有特色的宅第。如今，圣马可广场已成为全世界的客厅，每天都吸引着不计其数的参观者。就像我们常在电视里见到的，鸽子在游人的手掌上飞来飞去。马丁是从哥本哈根独自坐火车来威尼斯的，他的一位好友将于当晚在此举行婚礼，于是亲朋好友相约来此。丹麦和意大利虽说在地理上分属北欧和南欧，但是两国的距离不过1 000千米，他们出国又不需要任何签证，就像从北京到杭州那么容易。随着黄昏的临近，马丁消失在广场东北的一个小巷里，而在南侧的码头边，渐渐增高的海浪冲上了堤岸，贡多拉游船的主人纷纷收工了，他们把小船停泊在离岸几米远的地方，以避免船与石头撞击。附近的餐馆开始招揽生意，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家餐馆的一支弦乐四重奏，第一小提琴手是一位富有古典神韵的少女，颇像波提切利画中的人物。在今日的意大利这样的美女已十分罕见，我相信许多食客就是冲着这张脸来的，这也是精明的威尼斯商人做营销的传统。一边是波浪起伏的亚得里亚海，一边是有着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建筑，这是多么美妙的一顿晚餐啊！


威尼斯 贡多拉船夫的草帽

11. 画家的乐队

在巴黎的卢浮宫里，收藏着一幅16世纪的油画《威尼斯画家管弦乐队》，作者是保罗·委罗内塞，他或许是一连串名叫保罗的画家中最早的一位。约300年以后在法国，当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决心以绘画为生时，据说他的母亲是这样劝说愤怒的丈夫的：“让他去试试吧，谁让你给儿子取名保罗呢？委罗内塞的名字也叫保罗。”委罗内塞的绘画题材大多是圣经故事，他因为在神圣的题材中，画进了小丑、醉汉和侏儒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在《威尼斯画家管弦乐队》这幅画中，年迈的提香手持低音提琴，中年的丁托列托拿着中音提琴，而年轻的作者本人演奏的是大提琴。这三位画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威尼斯总督府里见到，我承认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丁托列托，虽然他的名字十分拗口。丁托列托是第一个厌烦提香形色之美的人，他在大师在世时就感觉到，不论多么无与伦比地表现美，提香的画总倾向于媚人而不是动人，换句话说，并不十分激动人心。在绘画实践中丁托列托也身体力行，他一反常规的不平衡构图法使同时代的传记作家瓦萨里大惑不解，瓦萨里在《艺苑名人传》里扼腕叹息：“如果丁托列托不是打破常规，而是遵循前辈们的美好风格，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威尼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遗憾的是，丁托列托只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对稍后更为另类的古典大师埃尔·格列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2. 火鸟歌剧院

从圣马可广场西行几百米，就到了大运河，此河弯弯曲曲地把威尼斯岛分成两部分。河的南端有一座桥，桥的一边是音乐学院，另一边是美术学院。我没有过河，想着附近应该有一家叫火鸟的歌剧院，却没能找到。火鸟歌剧院的名声虽不及斯卡拉歌剧院，但也首演过威尔第的两部名作：《弄臣》和《茶花女》，它们分别改编自两位法国作家的小说，剧作家却是同一位意大利人。威尔第出生在帕尔马的一

座小镇，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小客栈。他自幼随乡村风琴师学习，后得镇上一位杂货店老板资助，在7岁时投考米兰音乐学院，因演奏水平不高未被录取。威尔第跟随斯卡拉歌剧院的乐师学习，后来他与资助人的女儿结婚，不幸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三年内相继去世。威尔第初到威尼斯献艺时，已是闻名全欧的歌剧作曲家了，他的首演地点包括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开罗和圣彼得堡。与威尔第同年出生的德国人瓦格纳却命运不济，虽然他多才多艺，几乎所有的脚本都亲自创作，其演出范围却局限于本国：德累斯顿、马尔堡、拜罗伊特、魏玛、慕尼黑等。瓦格纳年轻时曾经去巴黎闯荡，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晚年访问意大利，仍没有机会在火鸟歌剧院上演，反而因为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威尼斯。那一年是1883年，而威尔第则活到了20世纪。

第三天·比萨

13. 马可·波罗

早晨起床后，我首先想到了马可·波罗，尽管地图上没有标出，在离开威尼斯前，我一定要找到这位旅行家的故居。我首先乘船来到圣马可广场，依次向几家商店的店员打听，但他们都只能说出大概的方向。不知不觉间，我走到全岛的地理中心里瓦尔多桥，这座桥有450年的历史，桥上挤满了卖纪念品的小摊。附近的民宅最能体现威尼斯的建筑风格，红砖黄瓦，临水而建。据说威尼斯有2 000多条河道和水巷，桥梁之多可以想象，而里瓦尔多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在莎士比亚时代，这里是欧洲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座桥两端。从此桥往前走，不远处有一座小教堂，从那里拐弯向东步行大约三分钟就应该是马可·波罗故居。可小巷深处静悄悄的，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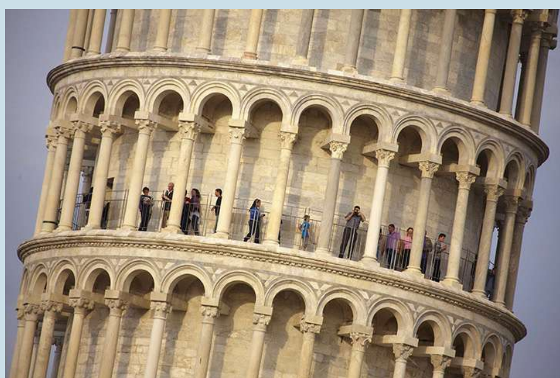
容易碰到的路人全是游客，我在一座四五米长的小桥上伫立，终于等到了一条过路的贡多拉。身强体健的船主不断向乘客们介绍沿途的风光，如果我不问起，看来他是不会提及马可·波罗的。原来旅行家的故居就是那座离小桥不远的房子，没有任何标记，只有几丛红花开在窗台上，门扉紧闭，很显然主人外出度假了。令人奇怪的是，那条船上的女乘客也对马可·波罗毫无兴趣，看来她们对那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兴趣并不大。我呆呆地望着桥边的埠头，那上面长满了青苔。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那条小巷，它从故居所在的三层建筑底下穿行而过，这与中国南方一些城镇的旧建筑十分相似。

14. 法国高中生

上午10点，我到达圣露西亚车站，准备告别这座遍布游客的城市。我的心情相当平静，说实话，威尼斯之旅中最难忘怀的仍是初次印象。火车开过帕多瓦以后，径直向正南方向驶去。快到博洛尼亚时，我借用一位乘客的手机，给两年前印度之旅认识的一位朋友马基雅维利打电话。结果如我所料，他的母亲说儿子去海滨度假了。我想起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可尼，他也出生在博洛尼亚，20出头便离家远行，一生中的主要成就都是在伦敦取得的。再往前，群山起伏，是无穷无尽的隧道。火车横穿了亚平宁山脉，经过佛罗伦萨时，上来一群法国少年，他们相互嬉闹。我在旁边观看了许久，才开始和他们聊天，原来是里昂来的中学生，到里窝那参加一个夏令营。里窝那是第勒尼安海的一个港口，也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比我的目的地比萨略远一点点。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首富美第奇家族在里窝那修筑码头，使之成为一个外港，如今它已成为意大利西海岸第三大港。里窝那历来在文化艺术方面毫无建树，但是100多年前，这座城市意外地诞生了一位现代主义大师，就是以画忧郁长脸的女性肖像著称的莫迪利亚尼。小莫迪利亚尼的出世给濒临破产的家庭带来希望，因为当

时意大利有一条法律：禁止没收一个即将分娩的妇女的家产。我一度萌发一个念头，就是当晚改变行程住宿里窝那，顺便再看一下地中海。

15.比萨斜塔



比萨斜塔

经过5.5个小时的行驶，火车抵达比萨车站，广场上有公共汽车通往城西北的比萨大教堂。我们穿过阿尔洛河上的一座大桥，只见河水浅浅的，河道出乎意料地狭窄，这让我费解，因为比萨靠近地中海，它在古意大利语的原意就是河口。老远我就看见那座从孩提时代起就熟知的斜塔，耸立在几百米远的地方，仿佛是一位神交已久的长辈，突然真切地出现在你面前，而你却已经长大成人。我一边回忆着心目中的比萨斜塔，一边缓慢地穿过卖纪念品的小摊，甚至遇到两位说上海话的女游客我也视而不见，任凭她们和我擦肩而过。后来我猜这两位女游客是从比利时来的，因为她们的T恤衫上印着布鲁塞尔那个撒尿的小男孩。当我走近斜塔，却发现它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精巧，颜色也比照片上显得灰暗得多，一根粗大的钢丝牢固地围住它的底部，一直拉到数百米外的地方。除了底层和顶楼以外，中间的6层完全一样，两只大小不一的钟挂在上面，可是现在不再有敲钟人了，斜塔已关闭近10年。这座塔始建于12世纪，建造过程中人们就发现地基下的土壤松软。以后的100多年间许多建筑师曾试图纠正，但都没有成功，现在斜塔上下的偏差已达4米。再回过头来看看旁边的比萨大教堂，这座罗马式建筑的杰出代表，它的历史比比萨斜塔更为悠久，现在几乎成了斜塔的陪衬。可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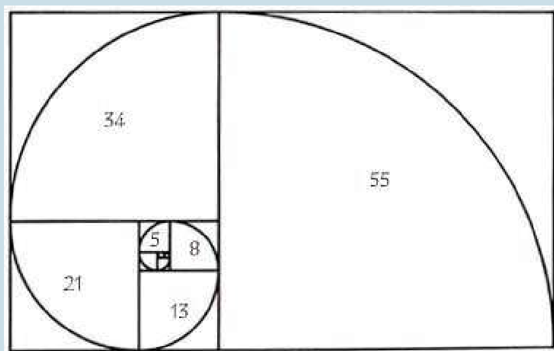
建筑家来说并非如此，整座教堂被水平线和半圆形拱顶主宰，宽阔平稳却未免有沉闷笨重之感，与前天看到的米兰大教堂适成对照。

16. 兔子逸事



比萨大教堂全景 远处为斜塔

我相信到比萨来的游客大多数会想起物理学家伽利略，400多年前，他就出生在这座小镇里，他的故居位于和大教堂相连的圣玛丽亚街。伽利略曾就读比萨大学，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后来短暂地获得过该校的教职。至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演示自由落体定律的实验，则多半是误传，因为当时的教会并没有那么开明，他后来被宗教裁判所判决就是一个明证。可是，我和每一位游客一样，希望这个传说是真的。实际上，发明这个传说的人已完成使命，他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质问这一点，就像有人怀疑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一样毫无意义。而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费米在比萨大学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这是确凿无疑的，他以设计出第一座核反应堆闻名。与物理学家们相比，另一位比萨的天才斐波那契的名声小许多，可他却是欧洲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斐波那契出生在1175年，正好是比萨斜塔开始修筑的第三年，早年他跟随做商务代理的父亲周游列国，到过西西里、希腊、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对印度和阿拉伯的计算方法产生浓厚的兴趣；回国以后，他发表了著名的《算盘全书》。这部书的初版已经失传，在第二版中有几个问题流传至今，其中兔子的计数问题最为引人瞩目，由此产生了如今被称作斐波那契数列的概念。这一数列不仅在许多数学分支里都能遇见，还可以用来帮助解决诸如蜜蜂的繁殖、雏菊的花瓣数量和数学与艺术的难题。



斐波那契级数图

17. 匈牙利情侣

斐波那契流传下来的画像很像拉斐尔，他常常以旅行者自居，人们喜欢称他为“比萨的莱昂纳多”，而把《蒙娜丽莎》的作者达·芬奇称为“佛罗伦萨的莱昂纳多”。应该说我与斐波那契颇有缘分，在我出世那年，一群热衷于研究“兔子问题”的人成立了国际性的斐波那契协会，并在美国出版《斐波那契季刊》。1997年年前，我也有幸在《斐波那契季刊》上露了两次面。我试图在地图上寻找斐波那契的故居，但却没有成功，我知道打听的努力会是徒劳的。随着黄昏的临近，迟来的游客已开始撤退，他们中的大部分今晚离开这座城市，我住宿的地方有三个选择，里窝那、佛罗伦萨和比萨。这时候，斜塔旁边的一对匈牙利青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分别是美丽的海伦和她的男友霍华德。我们交谈不多会儿之后，就成了朋友，这可能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历程有关，但并非全部原因。以往在北美遇见的匈牙利人给我的印象不深，他们说英语时总带有浓郁的口音。而霍华德和海伦还没有开口，我们就有了一种默契。这对年轻人在布达佩斯从事信息方面的工作，他们刚刚在撒丁岛度完两个星期的假，来比萨换乘火车顺便看一下斜塔。看来，他们游览名胜古迹的方式和我的一样，就是找一块石头静坐下来。将近傍晚6点时，我发现周围只有我们三个人了，如果斜塔是一个沉睡的老人，他或许会被我们的笑声感染。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我们一起合影、拥抱，并且互换了地址。

18. 乡村客栈

在前往大教堂的公共汽车上，我认识了一对新西兰母女，她们告诉我在北郊乡间有一座教堂兼旅馆，富有田园情调。这个情报使我最后决定在比萨逗留一夜。当我搭乘3路汽车，到达10千米以外的教堂时，那对母女已经先抵达了，原来她们家还有一位成员要来，两个月前她们出发时约定今晚在此会合。其他的旅客都是年轻人：麻脸的英国人，叫聂鲁达的智利人，原籍波兰的加拿大人（长得像高尔基）以及前克罗地亚球星马列维奇，他曾是帕潘和苏克的搭档，先后在巴黎圣日耳曼队、莫斯科迪纳摩队和西班牙塞维利亚队效力。在旅店登记完毕后，我步行到附近的村落，那里有一个挺不错的超市，我买了一些水果、啤酒、矿泉水和糕点。还在那里遇到了几位温州老乡，他们是5年前移民到这里的，意大利政府每隔一段时间有一次“特赦”，在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取得绿卡。我们在旅馆的葡萄藤架下共进晚餐，分享食物和美妙的故事，不一会儿，新来的那位新西兰女郎赶到，母女三人得以团聚。大家猜测哪个是姐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竟然真的答对了。一般来说，妹妹更富有冒险的精神。然后妹妹开始献歌，没想到正在兴头上，却停电了，整个乡野陷入一片漆黑，多亏主人很快就拿来几支蜡烛，紧接着一轮圆月升起，恍如梦幻中的场景一般。最后赶来的是两个澳大利亚女孩，开着一辆红色的尼桑轿车，她们的身高相差一个脑袋，个子较小的那个女孩说话像鸟的鸣唱一样。更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她们居然带来了烧烤用的餐具。到此时为止，这个晚上的故事简直像一部侦探小说。

第四天·佛罗伦萨

19. 布鲁内莱斯基



佛罗伦萨大教堂内景

今晨我乘坐早班火车离开比萨，沿着阿尔诺河向上游的佛罗伦萨进发，这条河流长度为240千米，在意大利仅次于波河和台伯河，却孕育了两座伟大的城市。我在火车上远眺了达·芬奇的出生地恩波利，那本是一个不该进入地图的小村庄。1个小时后我到达了目的地，与比萨相反，佛罗伦萨的火车站设在城市的北面，很快我就发现，这里的服务人员态度散漫，大概是因为众多游客们不请自来吧，附近大教堂门前排队的人数之众也证实了这一点。虽说佛罗伦萨旅店的房间紧张，但我来得正是时候。放下行李以后，我向南步行来到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建筑以巨大的圆顶闻名于世，顶上的尖塔终日被游客环绕，站在那里可以俯瞰全城。这座教堂在古典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教堂的设计者布鲁内莱斯基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建筑师，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立柱、壁柱和拱形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轻快、优雅的效果，在以后的500年间，欧洲和美洲的建筑师们亦步亦趋，直到20世纪来临。在绘画领域，布鲁内莱斯基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发明了透视法。希腊人通晓短缩法，画家们擅长营造景深感，但不知道远处的物体在体积上如何缩小，布鲁内莱斯基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数学方法，这被他的画友们广为采纳。布鲁内莱斯基去世的前一年，波提切利降生了，6年以后达·芬奇也出世了。达·芬奇后来精通几何学，想必是受到这位前辈的启发。

20. 但丁故居

从大教堂再向南走不远，一条小巷深处有一个小教堂，以大诗人但丁的名字命名。我缓步行走并察看四周，都是清一色的木质房子。房子里面的光线比较幽暗，两侧墙壁上各挂着一幅油画，左边的那幅画作尺寸较小，描绘了诗人和新娘迈出教堂的情景，右边的那幅画布尺寸较大，捕捉到诗人在阿尔诺河畔初见贝雅特里齐的瞬间，就是那位引导他游历天国的女人。画中的诗人身披一件红袍，头戴一顶红帽。据说，但丁全家都是这个教堂的成员，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葬在附近的同一座墓地里。但丁的出生地在小巷的拐角处，离教堂仅有几十米远。我的心突然缩紧，担忧故居每周有一天不对外开放，而今天恰好是那该死的星期二。始料未及的事还在后面，我在一条比较开阔的大道上再次邂逅了之前遇到过的4位香港姑娘，她们原定于今天返回罗马。这是我们在10天之内第三次相遇，前两次分别在爱琴海边的比雷埃夫斯和从雅典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火车上。但丁在37岁的时候，以贪污公款和颠覆国家的罪名，遭到了永久流放，他离开了佛罗伦萨。他“几乎是乞讨着，走遍了说意大利语的每一个地方”。尽管如此，但丁认为“遭到放逐是一种光荣”，正是在流放期间，诗人完成了不朽的杰作《神曲》。与此同时，佛罗伦萨乘机又降生了一位大作家薄伽丘，他以一部《十日谈》流传后世。私生子出身的薄伽丘晚年潜心研究诗人但丁的著作，写成了一部《但丁传》。

21. 乌菲齐美术馆

就在但丁出世的第二年，佛罗伦萨还诞生了那个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乔托。意大利人一般认为，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就是从乔托开始的。按照贡布里奇爵士的说法，乔托的绘画里有一种雕塑感，他重新定义了古希腊人的短缩法，捡回了在平面上造成景深错觉的艺

术，为后来的透视法奠定了基础。在乔托以前，人们看待艺术家就像看待一个出色的木匠和裁缝一样，艺术家们甚至经常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而在乔托以后，艺术史就成了艺术家的历史。地处内陆的佛罗伦萨之所以能够扬名世界，当然应该归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诸位大师，同时还要感谢伟大的艺术赞助商——美第奇家族，他们是市民阶层出身，因经商致富，靠资产和权力而进入政坛的新贵族，历史上没有一个家族与一座城市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第奇家族的府第在阿尔诺河畔，佛罗伦萨的面积并不大，从但丁故居向南走一刻钟就到了。最吸引人的是旁边的一幢三层建筑，那正是著名的乌菲齐美术馆，原来是美第奇家族的办公厅，这也是“乌菲齐”在意大利语里的原意。喜欢收藏艺术品的主人最初把顶楼用作陈列馆，后来藏品越来越多，就把办公室搬到别的地方，此楼便成了美术馆。藏画中最著名的要数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站在贝壳上面的女神脖子长得不合比例，却有着惊人的美艳。更为有趣的是，这幅画的主题不是基督教的传说，而是古典的神话。在隔壁的房间，还有一幅规模同样宏大的作品《春》，作者也是波提切利，画中每一个次要人物都比前一幅的出色，唯独维纳斯略为逊色，这几乎毁了整幅作品。



佛罗伦萨 乌菲齐美术馆

22.痛苦与狂喜

《维纳斯的诞生》的资助人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位成员，他同时还资助了另一位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亚美利哥以航海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他不仅发现并命名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自己的名字也被用来为

新大陆命名。在波提切利生命的最后岁月，亚美利哥率领一支船队继哥伦布以后抵达美洲，他在给主人的信中断定自己发现了新大陆，而哥伦布至死都以为自己抵达的是印度。乌菲齐美术馆里还有几幅提香的杰作，米开朗琪罗仅有的一幅布上油画以及拉斐尔的自画像。自画像摆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那副宁静自得的表情，让我明白了天才究竟是什么样的。乌菲齐美术馆的门票价格不菲，可参观者络绎不绝，如果我不是来得太晚，恐怕要像其他人一样排上两个小时的队。广场上竖立着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看上去比真人略大，尤其是那双手和脑袋，这当然是一件复制品，原件藏在城东北的美术学院陈列馆。在中国，达·芬奇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无疑弄错了，或者说被他科学上的所作所为蒙蔽了。在艺术上米开朗琪罗才是更伟大的天才，他出生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小镇卡普拉斯，自幼被美第奇带入宫中。米开朗琪罗不仅在绘画和雕刻方面的成就无与伦比，同时又是极富天才的诗人和建筑师。在欧文·斯通的传记小说《痛苦与狂喜》中，他被描绘成一个与美第奇家族的小姐建立了精神恋爱关系的工作狂。

23. 圣十字教堂

从乌菲齐向东走上10分钟，就到了圣十字教堂，这座教堂的外表不引人注意，里面却沉睡着多位巨人。走进教堂的大门，才发现所有的墓都是倚墙而建，就像浮雕那样。右侧第一座是米开朗琪罗的，他的半身胸像放在中央，一副愁苦的面容，旁边的三位少女也不开心。接下来是但丁，他坐在顶端低头沉思，右手托着腮部，两边各有一位少女，左边的那位手持鲜花，右边的那位读书小憩。再往前是戏剧家阿尔菲爱里，一度侨居巴黎，受到启蒙思想影响，对悲剧进行了革新，近年来名望大跌。然后是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他的半身胸像上方是一位少女。最后是作曲家罗西尼，他在巴黎度过晚年，原葬于

拉雪兹神父公墓，20世纪末才移葬于此。马基雅维利快到而立之年的时候，美第奇家族被推翻，他在新成立的共和国里任职，并出使过法国和德国。没想到10多年后，美第奇家族又卷土重来，马基雅维利被捕入狱，获释后他移居佛罗伦萨郊外，得以写成哲学名著《君主论》。这部著作给一国之主提供了统治手段，其中最有名的格言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点从书中有意讨好美第奇家族也可以获得证实。此书被称作“独裁者的手册”，拿破仑将它放在枕头底下，墨索里尼公开予以赞扬，希特勒对它爱不释手。的确，将近5个世纪以来，这部因官场失意而产生的书的影响力一直不减。而在教堂的另一面，依次竖立着伽利略、达·芬奇和拉斐尔等人的纪念碑，从外形看和墓并无任何区别，圣十字教堂不愧是佛罗伦萨的先贤祠。

24.阿尔诺河畔

夜幕降临，我来到阿尔诺河畔，漫步走向美第奇宫附近的老桥。此桥因为桥面上建有房子闻名，除了中央有10多米宽的空地以外，两端各有两层楼房，和普通民宅没有两样。桥面被小贩、艺人和游客占据着，人们只能步行穿过，桥下的水流缓慢而浅显，唯有轻舟方能通过。佛罗伦萨远没有米兰那么现代化，显然这座城市被古老灿烂的艺术束缚住了。综观如火如荼的现代主义运动，意大利贡献的艺术家屈指可数，莫迪利亚尼20岁出头便移居巴黎，契里柯干脆降生在希腊。唯一有影响的未来主义流派，基本上都是米兰人。到了桥南，我沿着河岸向东，一直走到一座小山顶上，那正是米开朗琪罗广场。广场上到处是游人，山坡上有座露天看台，一场摇滚音乐会即将开始。我站在石头的扶栏旁，久久地眺望灯火阑珊的北岸，这座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城市曾经令我心驰神往。明天我就要重返罗马，然后搭乘法航的班机去巴黎，我将会在那里见到一些久违的友人。晚上10点整，我登上一辆横穿广场的公共汽车，在绕过大半个市区后，抵达了车站附近

的一条大街，却弄不清旅店的方向。正好街角有一家温州人开的京都饭店，我在那儿吃上了一顿可口的中国菜，还和两位女同胞进行了一番交谈。起初，她们为自己顺利拿到意大利移民的身份而得意，随后又羡慕起我的天马行空。对我来说，故乡好比一张徘徊的嘴，而这张嘴此刻正向着我微笑。就这样，我在不断消化着的中国食物的陪伴下，度过了意大利之夏的最后一个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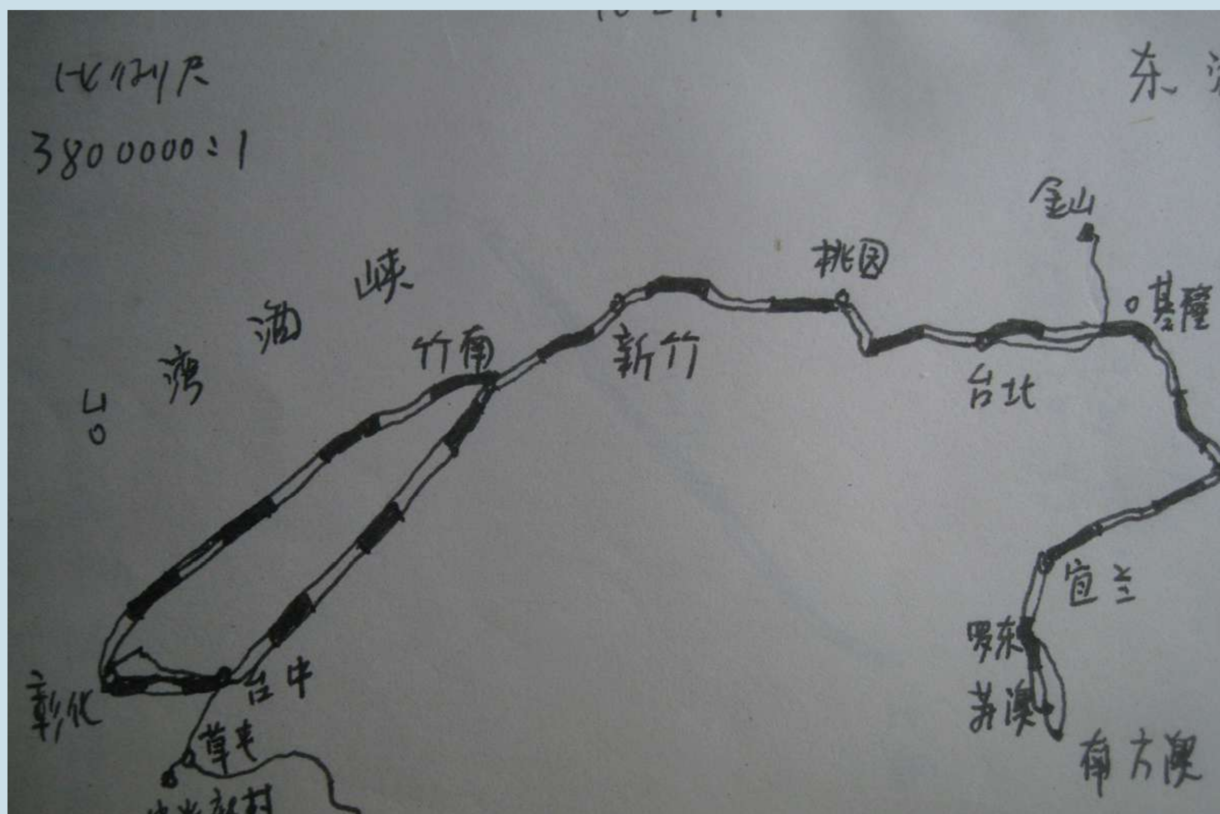
2000年2月，杭州

---

1. 里拉，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力诺等国的货币单位，现已被欧元取代。1960年，意大利规定，625里拉=1美元。——编者注

浸淫在地图的世界里

——从文字到图像的历程



作者手绘台湾之旅行迹图（1996）

对大多数人来说，查阅地图的机会并不多。人们使用地图的场所仅限于旅途和书斋，但是制作地图的工艺流程却高深莫测。《地图的力量》一书的作者丹尼斯·伍德却声称，“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地图”，这一格言式的标题鼓舞人心，至少它把地图与大众的距离拉近了。更为诱人的是“地图构建世界，而非复制世界”，这句话让一部分与地图打交道的人心领神会。地图，尤其是地图册，因为易于保存，所以比别的日常用品经久耐用，但质量低劣、缺乏个性的地图却

会被抛弃。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地图看作镜子，当作是真实世界某个层面的图像再现，伍德先生对此深怀不满，他提出了质疑：“这种态度成就了什么？”“地图使过去和未来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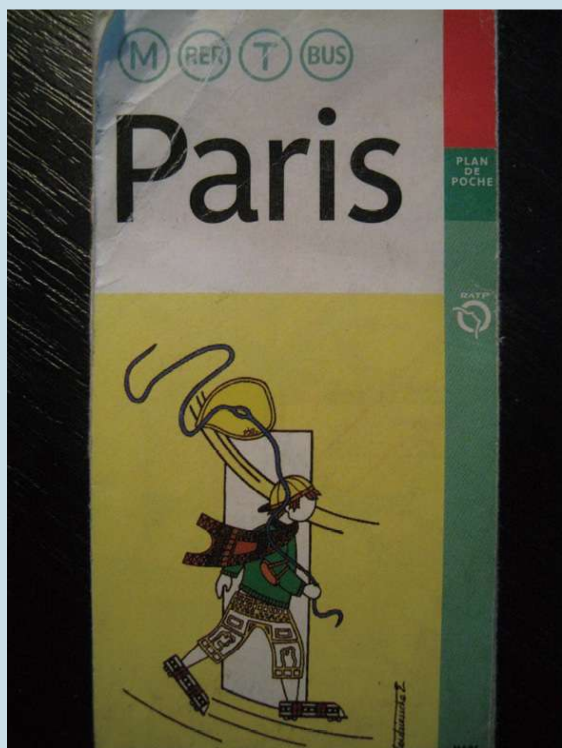


作者49天环游世界路线图

对于自幼酷爱旅行的人来说，地图很容易成为启蒙老师和求知欲望的源泉。我大约从10岁开始每次旅行之后，都要按比例制作一幅旅行图，10岁以前的旅行则依据母亲的回忆绘成，算起来已有20多年了，这也是我旅行归来最乐意去做的一件事，甚至成为我喜欢旅行的一个原因。我的过去就这样被保存起来了，我甚至相信将来有一天，会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旅行地图集问世。这宛如一个孩子的梦想，“地图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除此以外，伍德先生还让我明白，地图的历史和制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浪漫，它的功能和用途也比我所知道的更广泛。

第一个较为准确地绘制出世界地图的人，大概是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他出生在地中海南岸的昔兰尼加（今利比亚的拜尔盖），他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三世纪。埃拉托色尼生前就有“柏拉图第二”的美誉，但他无疑更多才多艺，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和五项全能运动员，并有一部12卷的《古代喜剧史》传世。埃拉托色尼早年留学雅典，后来被托勒密三世聘请到埃及，担任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82岁时因双目失明绝食身亡。埃拉托色尼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创立了筛法，这个方法及其推广至今仍被数论学家采用，尤其是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不可缺少。

作为一名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率先划分出地球的5个温度地带，这种划分一直沿用至今。他测定的地球周长为39 360千米，误差不到800千米，而与他同时代的大数学家阿基米德计算的结果却为60 000千



作者收藏的比名片还小的巴黎折叠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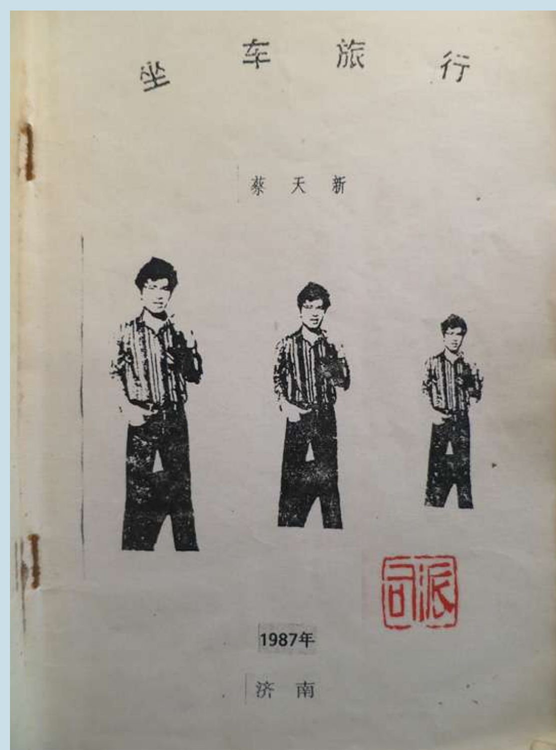
米。这个数据无疑为埃拉托色尼精确地绘制地图提供了必要条件。可是在古典时代，人们对地图始终持怀疑态度，主要因为对未知世界不甚了解。埃拉托色尼最有实用价值的工作是，他在分析比较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涨落的情况后，断定它们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海上绕过非洲到达印度。15世纪末，葡萄牙人达·伽马正是因为坚信这个理论，成功地从水路绕过到达印度，从而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

在埃拉托色尼去世约300年后，还是在那座亚历山大城里，有一位佚名的商人写作了一部奇书《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书中写道："经过印度东海岸之后，如果一直向东行驶，那么右边是大洋，左边可以到达恒河及其附近的一片地区，那是沿途所经各地中最东的地方。恒河是印度所有江河中最大的一条，其潮涨潮落的情况与尼罗河相同，这一地区有金矿以及一种被称作卡尔蒂斯的金币。"厄立特里亚是新近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的小国，在古希腊人眼里，则泛指印度洋及其周围的海域。这是西方记录印度有黄金最早的文献之一，它出现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1 300多年，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不难发现，虽然达·伽马和哥伦布这两位大航海家的国籍和资助人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受到了"文字式地图"的激励，并分享了其他文明的果实。而在遥远的东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却相对孤立地发展着，既缺乏绘制地图的先驱，又没有相应的文字可资借鉴。几位早期的跨国旅行家法显、玄奘和鉴真均是佛门弟子，他们冒

险的动力显然来自另一个精神世界；至于航程比哥伦布远得多的明朝太监郑和，也只能沿着已知的海岸小心翼翼地前进。这些人的勇气固然可嘉，但由于自身的原因，我们不能指望他们留下旅行日记或地图，法显没有给玄奘提供参照的经验，玄奘自己在天竺的路线也不可考证，更谈不上制作一份精确的地图。16世纪后期，随着整个世界面貌的凸现，比利时出生的荷兰地理学家墨卡托发明了相互垂直交汇的经纬线，进而创造了所谓的“墨卡托投影法”应用于地图的绘制，并印制出最早的一本地图册。墨卡托投影法虽说能够大致保持原来的形状，却会扭曲面积的比例，尤其是靠近北极的地方，阿拉斯加的面积只有巴西的1/5，从地图上看却相差无几，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获得圆满的解决。后来，德国历史学家彼得斯又创造了“等积投影法”，这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几何变换，在依此绘制的地图上，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被拉长了，就像放浪不羁的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笔下的那些妇女肖像。

直交经纬线居然在直角坐标系之前出现，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正是凭借着直角坐标系，法国人笛卡儿创立了解析几何学，从而把数学乃至整个科学带入一个新时代。人类对地图的认识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地图的应用使得世界范围的贸易成为可能，文明的进程因此前进了一大步，正如伍德先生的另一句话所暗示的：“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发展得好。”墨卡托还制造出第一批地球模型，其中两个被沉湎于巫术的英国青年迪伊带回伦敦，他当时不满20岁，后来成为有



作者学生时代的油印诗集《坐车旅行》

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迪伊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英文版写过一篇为人称道的序言，他也是哥白尼“日心说”最早的宣传者。

可是，“地图本身不会成长或发展”，我们也许会在地图上做笔记，标出路线、休息处或目的地，以强化它的功能，但这种事不经常发生。文字不可能被图像取代，以《荷马史诗》为例，虽然3 000多年前的故事叙述得有声有色，但当时学者们都觉得，那多半是诗人幻想出来的英雄神话。然而，德国商人施里曼却读《伊利亚特》入了迷，并认为诗中描述的那场为争夺美女海伦爆发的特洛伊战争确有其事。1870年，施里曼开始在爱琴海两岸挖掘珠宝，结果找到了“阿伽门农的面具”，由此进入了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这个故事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地图，绘制者可以在其中暗示其意图，阅读者也可以取其所需。在地图中，文字和图像达成了共识。



飞越格陵兰岛 屏幕上的地图（2011）

正当我陶醉于书中所写的那些有关地图的神话和符号时，伍德先生又发出了警告：“利益的气味在人们鼻孔前挥之不去。”意大利都灵市的一座图书馆收藏着一幅中世纪的地图，制作者把自己内心的偏见、隐私、欲望、好奇、聪明和学识呈现其中；而在另一幅由超现实主义者绘制的地图里，美国被隐去了，太平洋中用西班牙语标示的复活节岛被夸张到与整个欧洲一般大（结果这张地图的绘制者抵达新大陆后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控）；即便是根据人造卫星拍摄的照片所合成的世界地图（表面上像点彩派画家修拉的作品），也存在把某个国家或地区放在中央同时把一些国家和地区边缘化的选择可能性。

墨卡托的地球模型以赤道为中心，北极几乎变成了一条线，但确保等角航线不会弯曲，因而受到了航海家们的青睐。从外观上看，墨

卡托模型与今天的地球仪颇为接近，这使我联想到智利诗人聂鲁达。这位火车司机的儿子从小就渴望着能够周游世界，23岁那年的一天，他径自拜访外交部部长申请一份领事职务，并获得了成功。当他决定任命的去所时，聂鲁达转动桌上的地球仪，选择了智利圣地亚哥背面的小洞——仰光，而在此之前，他既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又不懂缅甸的语言。这似乎可以看作“地图的力量”的一种表现，然而丹尼斯·伍德却认为，“地图所服务的利益隐而不显”。

回到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话，“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地图”，伍德先生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描绘了自己家里的生活场景。有一次，他12岁的小儿子应老师的要求，在家制作两幅法国地图，一幅是行政区、首府及主要河流的地图，另一幅是塞纳河沿岸的风景名胜图。伍德夫妇为了引导孩子，亲自参与玩猜图游戏，全家一共画了9幅地图，不仅如此，他还趁热打铁让孩子们在阅读报纸杂志、准备行囊或玩冒险游戏时也打开地图。相较于国内，家长们喜欢把孩子送去学习绘画、弹琴、跳舞、游泳等课外班，却从不鼓励他们动手制作地图。其实这是一件足不出户也能办到的事情，对开发孩子们的智商和想象力大有益处。

ECONOMY 019

Bordkarte/Boarding Pass

Name of passenger

CAI/TIANXIN MR

From FRA

To BOG

LUFTHANSA

Carrier	Flight No./Class		Date
LH	530	H	29JAN

Gate	Boarding Time	Seat
A62	0930	ZZKXXXXX NONSMOKERXXX 26C
ZONE 2	5	NONSMOKER

Pcs. Ck. Wt. Unck. Wt. Pcs. Ck. Wt. Unck. Wt.

波兰克福—波岛大



赫尔辛基—塔林

20世纪初，福特公司在推销T型汽车的同时，提出了“让每个人都拥有汽车”的口号，这个目标已经在美国实现。在中国，如果我是地图出版社的编辑，会不遗余力地倡导“让每个人都拥有地图册”这一理念。要做到这一点，伍德先生的下列言论对读者或许富有煽动力：

“一种地图用途，多种生活方式”，“每幅地图都有作者、主体和主题”。1999年夏天，我在罗马的纳沃那广场被贝尼尼的雕刻《拉普拉塔河》吸引，此河哺育了两座神秘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博尔赫斯曾在一首九行诗里同时提及它们。我毫不怀疑，这首诗有一天会把我带到他的故乡，正如一幅北非地图把我带到了突尼西亚。

2000年春节，杭州

诗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
——答《东方时空》记者

DANS L'OCÉAN DU MONDE

我们在世界的海洋上游泳



à une lecture bilingue
et une rencontre avec l'auteur

Cai Tianxin

Les éditions L'Oreille du Loup
et Le Centre Culturel Chinois

Le vendredi 21 novembre 2008 à 19h30

Au Centre Culturel Chinois
1, boulevard de la Tour Maubourg
75008 PARIS 01 53 59 59 20

Métro :Invalides ou La Tourg Maubourg

作者法文版诗集巴黎首发式海报（2009）

D（《东方时空》记者）：你15岁就考上大学，24岁获得了博士学位，一定接受了很好的启蒙教育？

C （蔡天新）：不完全如此。小学和中学我是在远离县城的5个小村子里读完的，我记得最初（5岁）的学校只有一位老师，5个年级的同学挤在一间小教室里。可以说我是看露天电影长大的，直到高中毕业才听说过“电视”这个词，也没有使用过电话。我在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看见了火车，到了大学以后才学会了汉语拼音和英语。

D：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C：在1984年元旦。当时我已提前一年半完成了硕士论文，那时不像现在可以直接读博，因此多少有些无所事事。我写作第一首诗纯属偶然，除夕晚上我在一位同乡老师家看完电视，回寝室的路上在一棵梧桐树下，一位少女非常急切地奔向我，显然，她把我当成等候已久的男友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辗转反侧，嘴里念念有词。第二天早上把这些语言记下来，有位文艺青年同学看了以后说像诗，这就是我的第一首作品——《路灯下的少女》。

D：一个诗人的生涯就这么开始了，你很快就投稿了吗?

C：我只是记在笔记本上，间或与中文系“红烛”诗社的成员有来往，我们中间坚持写作到现在的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的“孤陋寡闻”，1986年，美国“垮掉的一代”诗人领袖艾伦·金斯伯格访问了山东大学，对此我居然一无所知。

D：可能当时你正忙于做博士论文吧。1987年冬天，你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杭州，这座城市里罕有你的数论同行，这种孤独感对你的诗歌是否有益?

C：我想是的，正是这种孤独感促使我不停地写作，并成为一名诗人。当然了，孤独感人皆有之，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能够利用的。而对数学研究者来说，孤独感并不是件好事，因此我努力寻找机会参加学术交流。

D：在一般人眼里，数学和诗歌属于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你却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相信这两者之间一定有相通之处吧？

C：数学需要灵感，与诗歌一样，数学也是想象力的产物。对一位纯粹数学研究者（相对于应用数学家）来说，他面临的材料好像是花边，是一棵树的叶子，是一片青草地，或是一个人脸上的明暗变化。

D：数学在科学技术中扮演的角色和诗歌在艺术领域里所处的地位，是否有相似之处?

C：一门真正的科学必须要运用数学概念和公式来表达、推导。与此相应，诗是一切艺术的共同要素，可以说每一件艺术品都需要有“诗意”，因此莫扎特才有“音乐家诗人”的美誉，而肖邦也被称作“钢琴诗人”。可以想象，如果在一篇科学论文中出现一个优美的数学公式和在一篇文章或谈话中间摘录几行漂亮的诗句，这两者就有一种惊人的对称。

D：你有一个说法，数学家之于物理学家，正如诗人之于小说家，能解释一下吗?

C：物理学家和小说家都擅长于详细地描绘三维空间的运动和变化，只不过物理学是有关物质的，而小说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数学家和诗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忽视具体的细节，而更关心本质的东西。

D：诗歌是否改变了你的生活？你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那么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C：诗歌打开了我心灵深处一扇封闭已久的窗户，我一下子看见了五彩缤纷的奇妙世界，正所谓世界出现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突然。英国诗人奥登在一首十四行诗《门》中写道：“由于偶然打开一次，使得艾丽丝看见了奇景。”在我写诗之前，有1/3的头发是白的，而现在我的头发又重新变黑了。如果说数学给了我安全感的话，那么诗歌无疑是我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

D：诗人和艺术家都喜欢美妙的旅行，谈谈你的旅行和写作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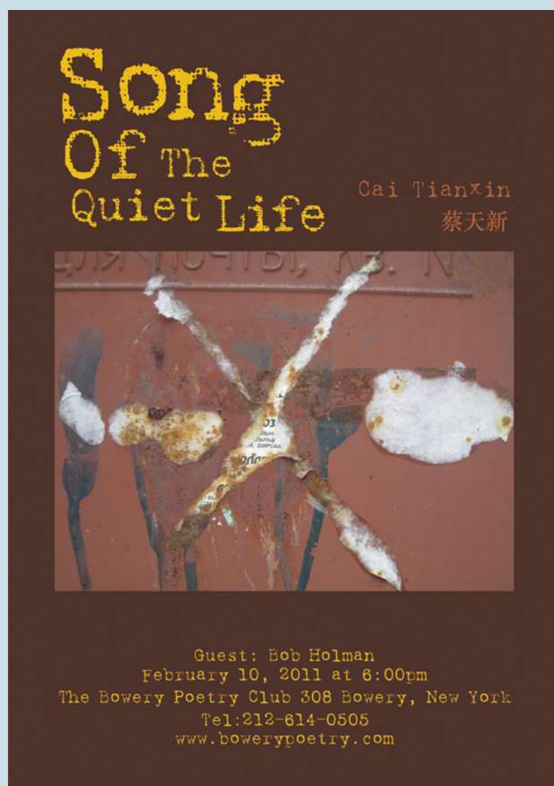
C：我自小就喜欢旅行，这可能与我爱看有关战争的电影有关，我那时特别羡慕站在地图前手握指挥棒的军官。我不仅喜欢旅行，而且每次旅行归来都要认认真真地按比例画一张旅行图，把出生以来的所有旅行都记录下来。我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做了，10岁以前的旅行则依据母亲或自己的回忆绘成。这是我旅行归来最乐意做的一件事，这甚至成为我喜欢旅行的一个原因。我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坐车旅行》（1986），而在一篇游记中我曾写道：“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我们绚丽多姿的生命是由一次又一次奇妙的旅行组成的。”

D：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你画下第一幅地图？

C：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接着，他飞抵杭州（笕桥机场为此扩建）、上海。我被这件事触动，在笔记本上画下他的飞行路线，当时我用的是一亿分之一的比例。那时，我还不满9岁，当报上登出他在花港观鱼的照片时，我正在离杭州200多千米的一所乡村小学里念书。20多年以后，尼克松的葬礼在他位于南加利福尼亚的故乡小镇隆重举行，我碰巧又在160千米以外的另一座城市收看电视转播。我忽然想到，死去的那个人正是20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在尼克松之后，出现在我的笔记本

上的还有法国前总统蓬皮杜、日本前总理田中角荣、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斯里兰卡前总统班达拉奈克夫人、英国前首相希斯和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等。但是很快，我就玩腻了这个游戏，也不再满足于为政客们画旅行地图了。

D：读你的游记会使人产生飞翔的感觉，你的游记充满了激情，又是那么朴素、精确，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作者纽约诗歌朗诵会海报（2011）

C：很高兴你喜欢它们，做一个诗人首先意味着心灵的自由。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回忆录《走向世界之路》里这样写：在我们青春岁月里最任性的时刻，我们总是在黎明时分，总是毫无睡意，总是囊中分文不名，便突然登上一节三等车厢。我也钟情于火车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交通工具，记得20来岁的一个夏天，我曾在日记本上写道："在车门两侧相对而立，这是火车上最富诗意的地方。"在国外，每次出门我总要带上地图和时刻表。除了诗歌以外，我在旅行时从未想到要写点儿其他的什么。

D：你在北美火车的硬座车厢里度过了20多个昼夜？

C：火车把我带到了美国的40个州和加拿大的5个省，这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时我几乎没住旅店就能游遍大半个中国。我愿意把火车看作酒吧或咖啡馆，你尽可以在里面自由遐想或谈天说地。而汽车好比生意兴隆的快餐店，只要吃饱了，也就到了目的地。而轮

船虽然舒适，却要把行李藏严实，和住宾馆差不多。至于飞机则更像是危险刺激的游乐场，到头来会变得单调乏味。

D：你曾谈到激情有时比诗歌本身更具魅力，请说明一下?

C：我说的激情当然不仅指写作，它同样表现在生活上，比如（就我个人而言）对旅行和音乐的迷恋，对运动和跳舞的酷爱。不过，文字的魅力可以与更多的人分享，写作使得激情得以长久留存。如果激情过多却在生活中没有机会发挥或表现，有可能会引发疾病。

D：你是怎样看待生活与写作的关系的?

C：“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晚年的歌德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比较容易从生活中制造出许多书，而从书里则引不出多少生活。”中年的卡夫卡也警告我们。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人从故纸堆里寻觅诗意，他们是些危险的人物。这里有着双重的误会，青年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写道：“敏锐而明快的作家的不幸是读者以为他们肤浅，因此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晦涩的作家的幸运是读者费力地读他们，并把自己勤奋的快乐也归功于他们。”

D：音乐在你心目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C：我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音乐犹如新婚的妻子，每时每刻，无微不至，出现在你的枕边、耳旁，而诗则犹如过去的一位情人，仅仅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中与你不期而遇。

D：请告诉我，哪10座城市最使你流连忘返?

C：我想我更愿意列举我从未去过却为之向往的10座城市，它们是：罗马、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孟买、伊斯坦布尔、开罗、约翰内斯堡、帕皮提和伦敦。注

D：听说你在美国访问结束时，校方主动延长了你的签证时间，你却按时回国了，这与你的诗歌写作有关系吗？



作者诗句印在法国书店的玻璃橱窗上（2009）

C：这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的数学研究条件比我们优越，我也一直使用英文写作数学论文。这是因为一门数学分支的词汇比较少，数学论文的语法结构也很简单，一律用现在时态。诗歌就不一样了，事实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用两种文字写出优秀的诗歌，曾经尝试过法语写作的英国诗人T. S.艾略特感叹：数学现在是唯一具有普遍性的语言了。毫无疑问，长久远离母语的环境对写作是一个伤害，诗人因为热爱母语更加热爱祖国，还有谁比诗人更爱自己的祖国呢？

D：诗歌和数学尽管有许多相似点，终究还是相反的两样东西，你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C：它们在思维形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举一个例子，1994年夏天，我游历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一切都虚无缥缈，除了

爱情，那最虚无缥缈的

这里用了两个极端的词“一切”和“最”，我本人也许并不持这种观点，这只是瞬间的感受，而且诗句里还有矛盾。可是在诗歌里，极端就是美，诗人和艺术家都喜欢极端和矛盾。但对数学家来说，自始至终的准确无误和一致性是必要的。

D：这两行诗很有味道，能再举些别的例子吗？比如说，关于“死亡”。

C：这是每一位诗人都要思考的命题，1992年秋天，我在《午后的生命》中写道：

> 而死亡犹如深厚的土地
>
> 承受了人类所有的过错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当然也不算太少），我对死亡的感受除了文艺作品以外，主要来源于几次水上历险，从故乡的水井、池塘到渤海、鸭绿江，都差点儿送命。

D：谈谈你对幸福的理解?

C：幸福是由源源不断的快乐组成的，而快乐则意味着创造或发现，因此对艺术家来说，我认为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应该倒过来说：“不幸的生活彼此相似，幸福的生活各不相同。”

D：在我的印象里，数学家兼哲学家的比较多，而像古代波斯人欧玛尔·海亚姆这样的并不多见，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

C：的确如此，从古希腊的智者到17世纪的笛卡儿、帕斯卡尔和莱布尼茨都是大数学家兼大哲学家。而欧玛尔·海亚姆只有一个，不过毕达哥拉斯精通音律，正如艺术家阿尔贝蒂、达·芬奇和丢勒通晓几何学。

D：你认为哪一门艺术与诗歌的关系最为密切?

C：绘画。我一直认为，浪漫主义的诗歌接近于音乐，而现代主义的诗歌接近于绘画。贺拉斯在《诗艺》里曾经说：心灵受耳朵的激励慢于受眼睛的激励。我不想断言，听觉到象征为止。但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人类的听觉在智慧方面的接受能力不及视觉。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在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疏远了。事实上，借用符号学家的语言来说，诗歌除了以听觉方式发布与内容有关的象征信息外，还借助印刷术等手段发布有关它本质的图像信息。也就是说，诗歌兼有绘画和音乐的双重特性。大概正因为如此，20世纪诗歌的发展几乎与绘画方面取得的成就等量齐观。

D：那么数学呢，它与哪一门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C：在古代是天文学，在近代是力学，在现代是理论物理学。

D：我注意到你有很强的空间感，几乎每一首诗都有画面，这与几何学有关系吗?

C：我的专业是数论，与几何学很少发生联系，我的空间感或许得益于现代绘画和雕塑。但不可否认，数学引导我如何把诗歌写得简洁，正像诗歌引导我如何把数学做得漂亮。

D：这就是你为什么喜欢短诗了，是否长诗比短诗难写呢?

C：我认为短诗是诗歌的精华，一位优秀的诗人必须要有漂亮的短诗。一首好的短诗应该有所发现，这也是写作短诗的困难所在。而长诗主要由虚构组成（当然仅有虚构是不够的），虚构比发现容易。正如百米冠军是田径之王，卡尔·刘易斯是不愿意去跑一万米或马拉松的。到目前为止，我主要写短诗。我也尝试过创作由短诗组成的长诗，我觉得这有点儿像接力赛跑。不过我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诗歌也许会变长，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是歌德。过早写作长诗的人，生命可

能不会太长，比如海子，而写作《马尔多罗之歌》的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仅24岁就去世了。

D：你的空间感可能与你对旅行的热爱是一致的。英国诗人安·奥斯汀认为你的诗歌是继后现代主义的洪水猛兽之后出现的，令人耳目一新。他用了4个词，即空间、发现、幻想和激情来评价你的诗歌，你觉得他的评价准确吗?

C：天空是我们现实的一个部分，而发现或者机智是现代艺术的基本特征。我相信安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只读过我的几首稚嫩的译诗。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物质的诗歌”，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物质讲着一种无声的语言，例如花、天空、日落和家具似乎在做梦，可以说蔬菜与矿物一样，它们具有一种梦游者的生命。而我的诗歌里频繁出现的“物质”是人体的各个部位或器官，它们几乎进入到我的每一首作品。

D：你在诗集《梦想活在世上》的后记中说，你的所有诗歌都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完成的，这种状况是否已经改变?

C：我的第一次美国之行使我享受到即兴写作的快乐，从那以后，情况似乎颠倒了过来，我更多的是在旅途中写诗。这也迫使我开始关注现实，并把它置于想象力的作用范围之内。

D：我还注意到你的诗经常采用双行体，是这样吗?

C：有段时间里我比较喜欢用双行体，这不仅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共同之处，还有点代数中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味道，它体现了一种均衡的美。

D：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相对来说，几何与绘画，代数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C：几何和绘画与空间有关，而代数和音乐与时间有关。更有趣的是，在空间艺术（绘画）和时间艺术（音乐）之外还有所谓的综合艺术，例如电影。而在数学中也有一个重要分支——分析，它是在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之后慢慢形成的。分析混合了几何和代数，它们共同构成了高等数学的三个基础。这是一种横向的比较，而从纵深的角度来看，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系，正如古典数学与现代数学的关系，例如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关系。

D：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对属于业余的东西有所偏爱，你是否也如此?

C：我想是的，任何喜好一旦成为职业其魅力必减。不过，有时也有意外。写诗是我不断完善自己并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数学家的工作是发现，而诗人的工作是创造。数学发现的是必然存在的定理，早晚有人来完成这项工作，而诗歌创作则属于个人的感受和想象，旁人是无法代替的。

D：在诗歌和艺术领域，你喜欢超现实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而你研究的数论却是有关自然数的性质——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你是否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补偿？

C：实际上，它们一点儿都不矛盾。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认为：“数是各类艺术最终的抽象表现。”而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则告诫我们：“最古典的才是最现代的。”

D：你现在作为诗人有很高的知名度了，应该说这与你作为数学博士和教授的地位有关系。难道你的学者身份没有给你的诗人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吗？我的意思是说，这有没有阻碍人们对你的诗歌的认识和关注？

C：在旁人眼里我是一个学者，写诗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就像集邮者和球迷一样。在商品社会初期，诗人不是被遗忘了就是被认为是古里古怪的。在诗人圈子里，你说的这种现象同样屡见不鲜，不是有一句古话叫“先入为主”吗？但这只能使我对写作更持之以恒。

D：说说你对传统的看法和认识？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C：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过：“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正是由于诗歌的这种特殊性，我认为用母语写作就是继承了最大的传统。优秀的诗人必须要有独特的个性，比起歌德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认为另一种说法在当代或许更有意义，那就是——“越是个人的，越是人类的”。

D：诗歌和数学离现实越来越远了，你是否认为有一天它们会消亡？

C：恰恰相反，越是离我们近的东西，越容易消亡，比如煤油灯、电报，甚至石油。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反而使我们难以判断。谁知道蜡烛和灯泡哪个更早消失呢？但是，无论诗歌还是数学都已经存在几千年了。

D：可是，现代诗歌变得更抽象了，这让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是什么原因呢？

C：我想是因为容易被理解的东西增多了，比如电视、电影、报纸、流行音乐、大众小说等。人们的生活越发忙碌，他们把幻想留在学校里。结果使得诗人和艺术家品尝到了千百年来一直由自然科学家独享的寂寥和孤独。

D：那么说你也同意诗歌的读者减少了？



作者做客法兰克福书展（2010）

C：诗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在有幸接受你们采访的各界人士中纯粹的诗人几乎没有。诗人似乎是生活在边远地带的一个部落，他们的灵魂像几行孤雁飞过天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喜爱诗歌，诗歌是一种迷人的东西，由于它从未被完全把握而需要永远追求。我有时候甚至认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人文领域取得的各项成就尚不及诗歌丰硕。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

D：那你认为诗歌的美妙之处究竟在哪里?

C：拜占庭哲学家普罗克洛斯认为数学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提醒你有无形的灵魂；它赋予它所发现的真理以生命；它唤起心神，澄净智慧；它给我们的内心思想添辉；它涤尽我们有生以来的蒙昧与无知。我想诗的语言也有同样的功能。”

D：诗人通过语言来影响世界，除此以外还能做些什么?

C：在当代，诗人更应该用他自身的言谈、行为尤其是精神状态来影响身边的人，让人们感觉在现实世界以外还有美好的存在。有一次，我在一位可敬的女士面前称赞她丈夫事业上的成功，她的回答让我吃惊：“你那儿有更好的东西。”

D：你对写诗的人有什么忠告吗?

C：谈不上忠告。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不能奢望过高，诗歌给予我们的已经够多了。想一想安德烈·马尔罗的预言就是一桩美妙的事情，他说：有一天，世界会变得与我写的书相似起来。

D：你可否用你的诗句对诗歌进行简洁的描述?

C：我写过几首谈论诗歌的诗歌，例如《诗》《受伤的乳房》《两个裸体 》 《最高乐趣》。1993年冬天，我在太平洋彼岸写了一首三节诗《序曲》，其中有这样两行：

诗是掺和了记忆的一个个圈套，

等待为之怦然心动的人和事物。

D：杭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临水而居对你的写作是否有益?

C：西湖美丽的景色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扼杀才华的手段和工具，当年鲁迅就曾写诗劝阻郁达夫把家迁往杭州。我在北方生活了将近10年以后来此定居，对这样的看法非常理解，但至今仍然没有移居的打算。相反，我觉得应该多写一些有关杭州的诗歌，不然怎么对得起白居易和苏东坡两位大诗人。我认为坚持在杭州写作是既危险又富于挑战性的。

D：你是如何面对这个越来越纷繁的世界的?

C：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世界在我的眼里变小了。或许讲求实效和追求完美的个性有助于让我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少量现实，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观察和描绘这个世界。当然，写作就意味着放弃，这些年来，我也失去了许多在旁人眼里比较重要的东西。

D：你是否也存在一种毁灭性的危机，像许多诗人面临的那样?

C：你指的是写作生命的终结？我当然不能例外，不过我的这种危机主要源于诗歌与数学精神的本质冲突，10多年来它们在表面上相安无事，有时甚至能够相得益彰，其实是被一种罕见的魄力和意志所掩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冲突可能会逐步升级，它的后果我无法预计。



以色列明信片上的蔡天新诗歌

D：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在哪一方面更有才华，数学还是诗歌？你能预见未来吗？

C：一个人要发现自己的才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我来说也一样。20世纪法国伟大的画家亨利·卢梭是在退休以后才开始艺术生涯的，此前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税务员。至于将来，这是一个不可测的东西，但正是因为不可测，才更具诱惑力。无论如何，我祝愿自己和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

1. 到2003年，这10座城市中只剩下帕皮提未曾游历。

初版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本随笔集。虽然在过去的10年间，我的大部分诗歌是在旅途中写下的，但完成这些不分行的文字却总是要回到自己的书房，而数学无疑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或寓所。也正因为如此，我把有关数理科学的文章放在前面，书名也直接来源于我写的一首献给毕达哥拉斯的诗歌。

由于篇幅和时间的关系，我没有为本书编制出一个索引，不过可以推想，书中出现的不同行业的人物总数可能超过500位，地点则遍及100多个国家。在我看来，地图上的每一个小圆点下面都居住着一个种族，它们以迥然不同的方式生活着，能够得以亲近自然是一桩美妙的事情。

如同读者所发现的，本集子收入的随笔分别涉及数学、科学，诗歌、艺术，地图、旅行。最初，它是在李韧先生的建议下勾勒出来的。张琳女士为此倾注了热情和心血，她的耐心、细致表明，她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项工作中。

本书付印时，绝大多数文章已经发表于《读书》《书城》《万象》《书屋》《山花》《天涯》《江南》《今天》《一行》《阿波利奈尔》《现代汉诗》《文学自由谈》《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哥伦比亚人》等海内外报刊，在此谨向这些报刊及其编辑致意。

蔡天新

2002年9月，杭州

第二版后记

这是《数字与玫瑰》第4个中文版，海峡两岸各出版了两版。

简体旧版的内容是数字在先、玫瑰在后，而新版恰好反了过来，与韩文版不谋而合。承蒙刘雁女士厚爱，拙作《数学与人类文明》和《数字与玫瑰》先后得以修订，我和商务印书馆（与浙江大学恰好同年诞生）开始了合作。

新版有一篇文章谈及法国人笛卡儿，巧合的是，此刻我正做客他的第二故乡——荷兰的笛卡儿中心。这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邻近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晚年的隐居地多伦庄园。

蔡天新

2012年9月，乌特勒支

新版后记

这是中信出版社继《数学简史》后出版的我的又一本“数”系列著作，也是我们的第三次合作。近年来，承蒙读者厚爱，拙作《数学简史》和《数学传奇》频频获奖，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年度作者奖、年度经典再版图书奖，并入选国家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举办的中华优秀科学图书榜、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优出版物。但本书却没有这么幸运，我想这与它跨界的内容和难以归类有关，而这也是本书的特色，它是我迄今为止中文版本最多的书籍，也是遣词最为用心的书籍之一。

蔡天新

2018年5月，杭州